



馬克思
哲學的貧困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馬克思

哲学的贫困

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二年·北京

一九六四年一月 卅 日

К. МАРКС
НИЦЕТА ФИЛОСОФИИ

馬 克 思
哲 学 的 貧 困

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門大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1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5 $\frac{7}{8}$ · 插页 2 · 字数 136,000

1949 年 9 月第 1 版 1961 年 11 月第 3 版

1962 年 5 月北京第 9 次印刷

印数 72,001—80,050 定价 (四) 0.54 元

统一书号 1001·I

本书編排順序，系以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 1956 年版为据。书中正文“哲学的貧困”和附录“关于自由貿易的演說”及书末“注釋”，譯文均采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四卷。恩格斯写的“序言”和“第二版序言”，系据德文版新譯出的，譯者徐堅。附录中的“政治經濟学批判”(摘录)，譯文采自我社 1959 年版徐堅譯本；“論蒲魯东”和“致巴·瓦·安年科夫”，譯文分別采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第一卷和第二卷。

目 录

恩格斯 德文版序言	1
恩格斯 德文第二版序言	16
馬克思 哲学的貧困 答蒲魯东先生的“貧困的哲学”	17
序言	21
第一章 科学的发现	23
第一节 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	23
第二节 构成价值或綜合价值	33
第三节 价值比例規律的应用	61
甲、货币	61
乙、劳动的剩余	70
第二章 政治經濟学的形而上学	80
第一节 方法	80
第一个說明	81
第二个說明	85
第三个說明	86
第四个說明	86
第五个說明	88
第六个說明	90
第七个即最后一个說明	94
第二节 分工和机器	99
第三节 竞争和壟断	112

第四节	土地所有权或地租	119
第五节	罢工和工人同盟	129

附 录

馬克思	致巴·瓦·安年科夫	139
馬克思	关于自由貿易的演說	151
馬克思	政治經济学批判(摘录) 柏林, 1859年	166
馬克思	論蒲魯东 (給施韦澤尔的信)	170
注釋	179

德文版序言

面前这本书，是1846年底到1847年初那个冬天产生的，那时候，馬克思对他的新的历史观点和經濟观点的基本特点，自己已經彻底了解了。剛剛出版的蒲魯东“經濟矛盾的体系或貧困的哲学”一书，給予他把这些基本特点同这个人的見解对立起来加以發揮的机会，从那时起这个人在当代法国社会主义者中間就居于最重要的地位。自从他們两人在巴黎常常为經濟問題作終夜談以来，他們的路是越离越远了；蒲魯东的著作证明两人之間現在已經横着一条无法架渡的深沟；置諸不理在当时是不可能的；所以，馬克思就在他的这一个答复里确认了这个不可救治的裂口。

馬克思对蒲魯东的总评价，可以在附在这篇序文后面的那篇文章里^①看到，那是1865年在柏林“社会民主主义者”第十六、十七、十八期上发表的。这是馬克思为那个刊物写的唯一的一篇文章；不久，施韦澤尔先生要使那个刊物轉上封建的、政府的軌道的企图暴露了，这就迫着我們在几星期后就公开声明不再投稿。

对于德国，面前这本书恰恰在現在这个时刻具有馬克思本人从未料到的意义。他怎么能知道，当他痛击蒲魯东的时候，剛好命中了他当时連姓名都不知的今日之野心神洛貝尔图呢？

这里不是深究馬克思同洛貝尔图的关系的地方；这件事，我不

^① 指馬克思1865年1月24日給施韦澤尔的信，見本书第170—178頁。——譯者注

久就会有机会来作^①。这里只想指出，当洛貝尔图控告馬克思“剽窃”他、“在‘資本論’中大量地利用了”他的“認識”一书“而沒有提到”他的时候，他是在肆意誹謗。这种誹謗要找解釋，只能是这位无人賞識的才子的悒悒寡欢和他对普魯士以外发生的事情、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和經济学文献的非常无知。馬克思既沒有看到这个控告，也沒有看到上述洛貝尔图的著作；关于洛貝尔图，他所知道的，根本只有那三封“社会书簡”，連这些也决不是在 1858 或 1859 年以前就知道的。

洛貝尔图有更多的理由认为，在这些信里，他早在蒲魯东之前就已經把“蒲魯东的构成价值”发现了；在这里，他当然又錯誤地自作多情，把自己看成是第一个发现者。不管怎样，他在我們这本书里也就連帶受到了批判，而这就使我必須簡單研究一下他的“关于我国国家經济状况的認識”这本“創业的”小书(1842)，只要这本小书除了(又是不自觉地)包含着威特灵式的共产主义之外还預先披露了蒲魯东的見解。

現代社会主义，不論哪一派，只要是从資产階級政治經济学出发的，几乎沒有例外地都同李嘉图的价值理論联系着。李嘉图在 1817 年他的“原理”^②中，一开头就提出两条原理：第一，任何商品的价值单独决定于生产这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第二，全部社会劳动的产品分配于土地所有者(地租)、資本家(利潤)、工人(工資)这三个階級之間。在英国，自从 1821 年以来，已經从这两条原理中作出了社会主义的結論，并且一部分提得这样尖銳和这样果断，使得那些現在几乎无人記得、大部分靠馬克思才再度发现的文献，在“資本論”出世以前，一直是不可超越的东西。这些情况改次再談

① 几个月以后，在 1855 年 5 月 5 日，恩格斯写完了他給“資本論”第二卷的序，讲了馬克思同洛貝尔图的关系。——譯者注

② 指“政治經济学和租稅原理”。——編者注

罢。所以，如果说洛贝尔图在 1842 年曾从上述原理引出了社会主义的结论，这对于一个德国人来说在当时肯定是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但是，至多只能在德国才算一个新的发现。蒲鲁东有过类似的妄想，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时已经证明，李嘉图理论的这种用法毫不新奇。

“只要对英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有一点点了解，就不会不知道，这个国家所有的社会主义者在各个不同时候几乎都提倡过平均主义地（即社会主义地）^① 应用李嘉图的理论。我们可以给蒲鲁东先生指出如下一些著作：霍吉斯金的‘政治经济学’（1827年版），威廉·汤普逊的‘为人类谋取最大福祉的财富分配原则’（1824年版），托·娄·艾德门兹的‘实践的、精神的和政治的经济学’（1828年版）等等，这一类的著作的名称还可以写上四页。现在我们且来听听一位英国共产主义者布雷先生是怎么说的。这里引用他的出色的著作‘劳动的弊害及其消除方法’（1839年里子版）中最重要的几段话”。^② 单单这里从布雷的著作中引出的几段话就把洛贝尔图要求的优先权取消了一大块。

那时候，马克思还没有去过不列颠博物馆的阅览室。他除了巴黎和布鲁塞尔图书馆的书籍，除了我的书籍和札记以外，当我们一起在 1845 年夏天到英国作了六星期的旅行的时候，只浏览了曼彻斯特可以找到的书。这样看来，上述的书籍，在那四十年代并不像现在这样难于找到。如果说，尽管这样，洛贝尔图始终不知道有这些书籍，那完全要怪他的普鲁士的地方局限性。他是普鲁士所特有的社会主义的真正的奠基人，而现在也终于被公认为这样的人了。

但是，就在他可爱的普鲁士，洛贝尔图也不能一点不受惊动

① 括号里的话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② 见本书第 54 页。——译者注

啊。在 1859 年，柏林出版了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学批判，第一分册”。其中，从經濟学家对李嘉图提出的种种責难中举出下述一点作为第二个辯駁，在第 40 頁上^①：

“如果一个生产物的交换价值等于包含在它里面的劳动時間，一个劳动日的交换价值就等于它的生产物。或者說劳动的工资必須等于劳动的生产物。实际情形恰恰相反”。馬克思对此作了如下的注解：“資產階級經濟学家对李嘉图的这种責难，后来給社会主义者抓住了。他們假定这个公式在理論上是对的，責备不符理論的实际，要求资本主义社会在实际上实现从它的理論原則推出的臆想中的結論。至少英国的社会主义者曾經这样地将李嘉图的交换价值公式轉而反对政治經濟学。”^② 在同一个注里提到馬克思的“哲学的貧困”，这本书当时在书店里到处都可以找到。

因此，洛貝尔图有充分机会亲自确定一下他的 1842 年的发现究竟是不是新的。他不这样作，反而一再宣告他的新发现，把它看成如此举世无双，以致再也不想，馬克思也能像他洛貝尔图一样，独立地从李嘉图的理論中引出自己的結論。决不会！馬克思“剽窃”了他，——然而就是这个馬克思向他提供过一切机会，让他确切認識到，这些結論，早在他們两人之前很久，至少在洛貝尔图还保存的那样粗糙形式上，在英国已經有人說到过！

李嘉图理論的最简单的社会主义的应用就是上面所說的那样。这样的应用在許多場合曾引向对于剩余价值的源泉和本质的認識，大大超过了李嘉图；就中洛貝尔图也是如此。他在这方面，除了別人早已說过，并且說得至少是同样好的以外，什么也沒有提供，这且不說，他的表現方法还犯了同他的前輩一样的毛病，——他把劳动、資本、价值等等范疇，就在經濟学家們傳授給他的那种

^① 見“政治經濟学批判”，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30 頁。——譯者注

^② 見同上第 178 頁。——譯者注

粗糙的、只看表面現象的形式上不加批判地接受下来，而不考究它們的內容。这么一来，他就不仅切断了自已进一步发展的一切道路，——同馬克思相反，馬克思是第一个从六十四年来被反复背誦的这几条原理作出了一些东西的人，——而且为自已开辟了通向烏托邦的大道，这一点我們就会看到。

李嘉图理論的上述应用，——說全部社会产品、工人的产品属于作为唯一生产者的工人，——直接引导到共产主义。但是，正如馬克思在上述的地方也指出的那样，就經濟形式說，这种应用是錯誤的，因为它不过是将道义运用于經濟而已。照资产階級經濟学的規律，产品的最大部分不属于生产了这些产品的工人。如果我們說：这是不公平的，不应该这样，但是这句话同經濟原来毫无关系。我們不过是說，这些經濟事实同我們的道德感情不合而已。所以馬克思从来没有把他的共产主义要求放在这样的基础上，而是放在必然的、在我們眼前一天比一天成熟的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崩潰上；他只說剩余价值是由无偿劳动构成的，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但是，就經濟形式說是錯誤的东西，在世界历史意义上却可以是正确的。如果群众的道德感宣布某一經濟事实为不公平，如当年对于奴隶制或农奴制那样，这就证明这个事实本身已經过时，而另一些經濟事实已經出現了，由于这种情况，那原来的事实已經变成不能忍受和不能維持的了。因此，在表面的經濟不公平之后，可以藏着一个非常实在的經濟內容。不过这里不是詳細研究剩余价值理論的意义和历史的地方。

除此以外，人們从李嘉图的价值理論还可以并且已經引出別的結論。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决定的。但是，情况是这样，在这个不良的世界上，商品一时在价值以上、一时在价值以下出售，并且这还不只是由于竞争引起的摆动。利潤率恰恰具有一个显著的对所有資本家保持同一水平的平均化趋势，正

如商品价格具有因供需关系把自己归结到劳动价值的趋势一样。但是，利润率是按照投在一个工业企业中的总资本计算的。由于在两个不同的生产部门中，一年的产品可以体现同量劳动，因而代表同等价值，两部门的工资又是同样高，但是一个生产部门的垫支资本可以并且常常是两倍或三倍于另一个生产部门，这里，李嘉图的价值规律就同利润率均等的规律矛盾了，这是李嘉图自己已经发现了的。如果两个生产部门的产品各按它们的价值出售，利润率就不能均等，如果利润率均等，两个生产部门的产品就不能都按它们的价值出售。所以我们在这里遇到一个矛盾，遇到了两个经济规律的二律背反；这个矛盾的实际解决，照李嘉图的说法（第一章第四、五节）一般是有利于利润率而不利于价值。

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尽管有它的不祥之兆，但是也有它使善良的资产者喜爱珍贵的一面。它以不可抗拒的威力诉诸他们的公平感。权利的公平和平等，是十八、十九世纪资产者打算在封建制的不公平、不平等和特权的废墟上建立他们的社会建筑物的基石。马克思已经指出过，商品价值的决定于劳动、按照这个价值尺度在权利平等的商品所有者之间进行的劳动产品的自由交换，是现代资产阶级全部政治的、法律和哲学的意识形态所据以建立起来的现实基础。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尺度，——这个认识一经确立，善良的资产者必然会因世道邪恶感到良心深受伤害，这个世界，名义上承认公平原则，事实上时时刻刻肆无忌惮地抛棄公平原则。特别是小资产者，他们的诚实劳动——尽管只是他的伙计和学徒的劳动——在大生产和机器的竞争下天天跌价，特别是小生产者，必然会迫切希望一个这样的社会，其中按劳动价值交换产品终于成为毫无例外的完全真理，换句话说，他们必然迫切希望一个这样的社会，其中商品生产的唯一一条规律绝对地不折不扣地通行，而把这条规律定要在其下才能生效的那些条件、即商品生产以至资本

主义生产的其他规律都排除了。

这种空想在现代(现实的或精神的)小资产者的思想中是多么根深蒂固,由下述事实就可证明:这种空想在1831年已由约翰·格雷系统地发挥过,在三十年代,在英国还实际上试办、并在理论上推广过,1842年洛贝尔图在德国,1846年蒲鲁东在法国,都把它宣布为最新真理;1871年洛贝尔图再次把它宣称为社会问题的解答,并当作他的社会遗嘱;1884年,它又在一群追逐名位的人中找到了信徒,这些人以信奉洛贝尔图为名,准备借普鲁士国家社会主义谋自己的好处。

这种空想,马克思已经把它批判得如此透彻,不论对蒲鲁东也好,对格雷也好(参看本书附录①),因此,我在这里可以只限于对这种空想的论证和描绘在洛贝尔图手上所特有的形式发表几点意见。

上面说过,洛贝尔图把经济学概念的传统的定义完全按照经济学家所传给他的形式接受了下来。他丝毫没有想一想必须加以研究。在他看来,价值是“一物对他物按数量的声价,而这声价被看作尺度”。这个——忠厚些说——非常模糊的定义,至多告诉我们价值大致像什么,却决没有说出它是什么。可是,这就是洛贝尔图关于价值所能向我们说的一切了,因此,他显然是在寻求一个处于价值之外的价值尺度。他运用了使阿道夫·华格纳先生称赞不置的抽象思维能力,以三十页篇幅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乱七八糟地搅和在一起,然后得出结论说:真正的价值尺度是不存在的,我们必须以一个代用的尺度为满足。劳动可以充当这样的代用的尺度,但是只有在等量劳动的产品总是用等量劳动的产品交换时才是如此,不管“事情本来就是这样,或者由于采取了措施”才

① 见本书第166页至第169页。——译者注

保证是这样。因此，尽管整个第一章都是向我们解释商品“耗费了劳动”、仅仅耗费了劳动，以及为什么，但是价值和劳动仍然是没有任何实际联系的。

而劳动又是不加批判地在它在经济学家们那里通常采取的形式上被接受下来了。不仅如此，洛贝尔图虽然也用两句话提到一下劳动强度的差别，但劳动还是非常一般地当作“耗费的”东西，因而当作度量价值的东西提出来，而不问这个劳动究竟是不是在正常的社会平均条件下付出的。生产者为了生产那一天就可以生产出来的产品，是费了十天呢还是只费一天，他们用的工具是最好的呢还是最坏的，他们的劳动时间是费在生产社会必需的产品和社会需要的数量上呢，还是费在根本不需要的东西上、或者虽然需要却在数量上比需要的过多或过少，——对于所有这一切，根本不提，却只是说：劳动就是劳动，等量劳动的产品必须同等量劳动的产品交换。在别方面，不管适当不适当，洛贝尔图总还随时准备站在全国观点上，从社会瞭望台的高度俯瞰个别生产者之间的关系，然而在这里，他却小心翼翼地避开了这种作法。其所以如此，只因为他从书的第一行起就笔直地驶向劳动货币的乌托邦，而对于劳动就其创造价值的本质进行任何研究，都会在他的航道里投下无法通过的礁石。他的本能，在这里比他的抽象思维能力强得多，——顺便说说，你在洛贝尔图身上发现的抽象思维能力，只是依靠最具体的思想空虚造成的。

现在，过渡到乌托邦的事，在一挥手之间就完成了。为保证按劳动价值进行商品交换成为毫无例外的规则而作的“措施”，没有引起任何困难。具有这个倾向的其他空想家，从格雷到蒲鲁东，都煞费苦心地揣摩过用什么社会制度来实现这个目的。他们至少是设法通过经济途径解决经济问题，通过进行着交换的商品所有者本身来解决问题。洛贝尔图却解决得轻便多了。他作为一个老实

的普魯士人，他請求國家幫忙；國家政權的一道命令就指揮了這個改革。

這樣一來，價值是幸運地“構成”了，但構成的決不是洛貝爾圖在這個構成上所要求的優先地位。相反，格雷同勃雷以及其他等人早在洛貝爾圖以前很久的時候，就反復表示過（而且反復到令人生厭的程度）同樣的思想：他們期望有這樣一些措施能使產品在任何情況下都總是只依它們的勞動價值相互交換。

國家這樣把價值構成之後，——至少是一部分產品的價值，因為洛貝爾圖也是有分寸的，——就發行它的勞動券，預付給工業資本家，工業資本家用它發給工人作工資，工人再用他們得到的勞動券購買產品，於是勞動券又流回它的出發點。它運轉得多美，我們該听听洛貝爾圖本人如何說的：

“至於第二個條件，那麼，為了使勞動券上註明的價值真正在流通中存在，必要的措施是只有真正交出一個產品的人才取得一張精確地註明生產那個產品的勞動量的勞動券。誰交出了一個兩天勞動的產品，誰就取得一張註明‘兩天’的券。只要嚴格遵守這條規則發券，這第二個條件也就能滿足了。因為照我們的假定，貨物的真正價值總是同生產這貨物時所費的那個勞動量一致的，而這個勞動量的尺度就是普通的时间段落，於是無論誰交出一件費過兩天的產品，得到註明兩天的券，他得到證明的，不多不少恰恰是他實際交出的價值，——並且，因為只有真正把一件產品投入流通的人才取得一個這樣的證明，那麼，券上註明的價值也就一定存在着，足以滿足社會的要求。不論我們把分工的範圍想像得多么廣闊，只須嚴守這條規則，實際上存在的價格總額必定恰恰等於所註明的價值總額。可是因為註明的價值總額恰恰等於提交的价值總額，所以後者也必然會與實際存在的價值總額相符，一切要求都會得到滿足，清算也會正確地進行。”（第 166—167 頁）

如果說，到此為止，洛貝爾圖的命運總是不濟，他的新發現總是來得太遲，那麼，這一次他至少在一種獨創性上建了功勳：在他的對手中還找不到一個敢于以這樣幼稚天真、透徹明淨、可以說地道的波美拉尼亞形式說出勞動貨幣烏托邦的痴話的人。因為對於

每一張券都提供了一個相當的價值對象，而價值對象又沒有一個不是對一張相當的券而交出的，這樣，券上的總額必然總是同價值對象的總額相抵，計算下來連一點餘額也沒有，一秒钟勞動都不差，連資格再老的政府總金庫出納員也沒有一個能夠找出絲毫計算上的錯誤。還能要求些什麼呢？

在現今資本主義社會中，每一個工業資本家承擔着生產上的一切責任，生產什麼，如何生產，生產多少，都隨他的意。但是，在他來說，社會需要仍是一個未知數，無論關於所需要的對象的質量、品種，無論關於它們的數量，都是這樣。今天還不能充分迅速供應的東西，明天可能供應得大大超過需要。儘管如此，需要畢竟是這樣那樣地、好壞得到滿足，生產總的說來畢竟轉到需要的對象上去了。矛盾是怎樣得到解決的呢？通過競爭。競爭又怎樣解決問題的呢？非常簡單，對於品種上、數量上不合當前社會需要的商品，競爭使它們的價格落到它們的勞動價值之下，通過這種拐彎的辦法，競爭使生產者感覺到，他們或者是生產了根本不需要的東西，或者東西本身雖然需要，但生產的數量已經超過需要、成為多餘的了。從此得出兩條結論：

第一：商品價格對商品價值的不斷背離是一個必要的條件，只有在這個條件下並通過這個條件，商品價值才能存在。商品生產的價值規律，只有通過競爭的擺動以及同競爭一起的商品價格的擺動，才得到貫徹，商品價值的決定於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也只有在這情況下才成為現實。因此，價值的表現形式——價格，一般看來多少不同於它所表現的價值，這種命運是價值同大多數社會關係所共同的。國王同他所代表的王國看來也是大不相同的。因此，在一個進行交換的商品生產者的社會里，想把勞動時間決定價值這一條確立起來，而又禁止競爭用加壓力於價格的辦法，即一般說來唯一可行的辦法來確立這種價值決定，——這種想法不過證明，

至少在这方面，他采取了空想主义者惯有的轻视经济规律的态度。

第二，竞争既然使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在一个进行交换的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发生作用，它也正因为如此使社会生产在这种条件下唯一可能的组织和安排得以实现。个别的商品生产者只有从产品的跌价和涨价才亲眼看到社会需要什么、需要多少和不需要什么。但是洛贝尔图也是它的代表人之一的乌托邦却恰恰要废除这个唯一的调节者。如果我们问，我们有什么保证使每种产品都是生产一个必须的数量而不是过多，我们不致一面缺乏谷物和肉类，同时却渍在甜菜糖堆里和醉倒在马铃薯酒里，我们不致一面裸着身体没有裤子穿、一面却有千千万万裤子钮扣滚滚而来，——那么，洛贝尔图就得意洋洋地把他的漂亮账指给我们看，照他的计算，对每一磅多余的糖、每一桶销不出去的酒、每一颗缝不到裤子上去的钮扣，都正确地发过券，一切都严格“相符”，“一切要求都会得到满足，清算也会正确地进行”。谁要是不信，可以去请教波美拉尼亚的那位政府总金库出纳员某甲，他审核过账目，查明无误，他在出纳上从未出过舛错，完全可靠。

现在，我们看看洛贝尔图的又一个天真想法——用他的乌托邦消除工商业危机。从商品生产已经以世界市场的范围来进行之后，遵循着私人打算进行生产的个别生产者同他们为之生产、却对于所需的质量和数量方面多少不清楚的市场之间，是靠世界市场的风暴、靠商业危机来平衡的^①。因此，如果禁止了竞争，——它通过价格起落把世界市场情况告诉个别生产者，——人们就完全闭塞了眼睛。把商品生产安排得叫生产者一点也不知道他们为之

^① 至少直到不久以前的情况就是如此。自从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由于法国、德国、特别是美国的参加世界交易而被打破以后，似乎有一种新的平衡形式起作用。危机前普遍繁荣时期比较少见了。如果它完全不出现了，长期停滞加一些轻微的摆动将成为现代工业的常态。〔恩格斯注〕

生产的市場的情况，——这的确是一个医治危机症的妙方，使得爱森巴医生也要羡慕洛貝尔图呢。

现在可以理解了，为什么洛貝尔图干脆用“劳动”来决定商品价值，頂多只提一下劳动的不同强度。如果他研究过劳动通过什么形式、怎样創造了价值，从而决定和度量价值，他就会得出社会必要劳动，——不論就个别产品对同类其他产品的关系上說、不論就它对社会的总的需要說都是必要的劳动。如果这样，他就会遇到一个問題：各別經營的商品生产者的生产怎样会符合于社会的总的需要；这样一来，他的整个烏托邦也就搞不成了。这一次，实际上他是宁可“抽象”，恰恰把問題所在“抽象”掉。

现在，我們终于走到了一个地方，这里洛貝尔图真的拿出一些新鲜东西給我們了；这些东西，是把他同他的无数伙伴——劳动貨幣的交換經濟論者——区别开来的东西。那些人要求这种交換制度的目的在于廢除資本对工資劳动的剝削。每个生产者应该取得他的产品的全部劳动价值。他們在这一点上，从格雷到蒲魯东，都是一致的。洛貝尔图說，无论如何不能这样。工資劳动和对工資劳动的剝削要保留下来。

首先，工人在任何可以想像得到的社会制度下都不能取得他的产品的全部价值拿来消費的；总有許多在經濟上是非生产性的、但又是必要的职能要从生产出来的基金中开支，有关的人員也要靠它来維持生計。——这一点，只有在现在的分工还起作用的时候是正确的。在一个以普遍参加生产劳动为义务的社会中——要知道，这样的社会也是“可以想像的”呵——就不存在这种情况。但是，社会儲备和积累基金的必要性总还是存在的，因此，到了那时虽然**这些工人即社会全体成員**占有着和享受着他們的全部产品，但每个个别工人也还不会享受他的“全部劳动成果”。对于从劳动产品中拿出一部分来維持經濟上非生产性的职能的事，其他的

劳动货币空想家也没有忽视。不过，他们是让工人为这个目的而通过一般的民主方式向自己征税，而洛贝尔图则反之，他的 1842 年的全部社会改革方案都是迎合着当时的普鲁士国家，把事情全部委之于官僚们去决定，由他们高高在上地规定工人应在自己的产品中分多少而恩赐给他们。

第二，可是地租和利润也应该不折不扣地保存下去。因为地主和工业资本家也从事了一定的活动，这些活动那怕从经济方面说是非生产性的，但是从社会方面说还是有益的或者甚至是必需的，他们以地租和利润的形式得到一定的报酬，——这个论点，就是在 1842 年也显然不算什么新的论点。实在说，凭他们起的那么小的一点作用，并且作得够坏，他们现在所得到的真是太多了，但是洛贝尔图偏认为一个特权阶级至少在今后 500 年间还是必要的，所以，现在的剩余价值率——为正确起见我这样说——还应该继续存在下去，不过不应该再提高。现在的剩余价值率，洛贝尔图认为是 200%，即工人在一天 12 小时的劳动中不是得到 12 小时的劳动券，而是 4 小时，其余 8 小时生产的价值应当拿到地主和资本家中去分配。因此，洛贝尔图的劳动券干脆是个骗局。并且，必须是一个波美拉尼亚的大地主才能设想工人阶级会同意为了 4 小时的劳动券工作 12 小时。如果把资本主义生产的戏法翻译成这样坦白的話，表现成赤裸裸的搶劫，那它就不可能存在下去了。发给工人的每一张劳动券就会变成直接教唆叛乱的东西，触犯德意志帝国刑法第 110 条。只有那除了波美拉尼亚大地主地产上的实际上还处于半农奴地位的短工以外从没有见过任何别的无产阶级的的人，——在那些地产上，棍棒和鞭子当权，村里所有漂亮女人都属于仁慈的老爷的后宫，——才想得出来这样来侮辱工人。但是我们的保守党倒真是我们的最大的革命家呢。

不过，如果我们的工人够温顺，竟受了骗，辛苦了整整 12 个小

时,实际上只算作了4小时的工,那么,他们就得到一个保证,从此以后他们从自己产品所得的报酬永远不会低于三分之一。这实际是用孩子的喇叭吹出的未来的音乐,不值得我们为之一费一句话。因此,如果洛贝尔图在劳动货币乌托邦中有什么新贡献,这新贡献就是幼稚,远远落在他以前和以后无数同道的贡献之下。

洛贝尔图的“……认识”一书,在它出版的当时,无疑是一本重要的书。它对李嘉图价值理论的继续发展,在一个方向上是大有希望的开始。尽管这一著作只是对他来说和对德国来说才是新东西,但是总的说来它还是同他的较好的英国的前辈们的著作处在同一个水平上。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从此出发,只有通过寻根究底的、批判的、进一步的工作,才能在理论上有真正的收获。他却一开头就在第二个方向上也就是乌托邦的方向上发展李嘉图,从而切断了自已上述发展的道路。于是他失去了一切批判的第一个条件——不抱偏私成见。他事先设定了目标,为此目标努力,他变成一个偏颇的经济学家。一旦陷入他的乌托邦的圈套,他就断绝了在科学上进步的一切可能。从1842年直到他死,他是在转圈子,老是重复他第一本书已经说过或暗示过的同一思想,感到不被人所了解,在沒有东西可供剽窃的所在发觉被人剽窃,最后,并非不是故意地拒绝承认自己只是重新发现了实际上人家早已发现的东西。

譯文同已經印出的法文原文有些出入。这是根据馬克思亲笔的修正作的,已經准备好的一个法文新版中也作了这些修正。

本书用詞同“資本論”不尽相同,例如这里說到当作商品的劳动,說到劳动的买卖,而不是說劳动力,看来这一点无須再提請注意了。

本版加入下列附录:(1)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柏林,

1859年版)中論約翰·格雷的劳动貨幣交換烏托邦的一段,(2)馬克思1848年在布魯塞爾关于自由貿易的演講稿的譯文,此稿同“哲學的貧困”屬於著者的同一个发展时代。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4年10月28日。倫敦

德文第二版序言

要說的,只是法文本中写錯了的名字 Hopkins (見第 45 頁^①)
已經改正为 Hodgskin, 同处, 威廉·湯普逊的著作的年份已經改
正为 1824, 借以告慰于安东·門格尔教授先生对书目的忠心。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2年3月29日。倫敦

^① 見本书第 54 頁。——譯者注

馬克思
—
哲學的貧困

答蒲魯东先生的
“貧困的哲學”¹

卡·馬克思寫于 1847 年上半年
1847 年第一次以單行本刊行于
巴黎和布魯塞爾
署名：卡爾·馬克思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 1847 年版譯的，并參考
了 1885 年、1892 年德文版、1896
年法文版所做的訂正

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

—
RÉPONSE A
LA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DE M. PROUDHON.

Par Karl Marx.



PARIS.
A. FRANK,
69, rue Richelieu



BRUXELLES.
C. G. VOGLER,
2, petite rue de la Madeleine.

1847

“哲学的貧困”第一版的封面

序 言

蒲魯东先生不幸在欧洲異常不为人了解。在法国，人家认为他理应是一个拙劣的經濟学家，因为他在那里以卓越的德国哲学家著称。在德国，人家却认为他理应是一个拙劣的哲学家，因为他在那里以最杰出的法国經濟学家著称。我們是德国人同时又是經濟学家，我們要反对这一双重錯誤。

讀者将会明白，为什么我們在做这件不討好的工作时常常不得不放下对蒲魯东先生的批判，而去批判德国的哲学，同时还要对政治經濟学作某些評論。

卡尔·馬克思

1847年6月15日于布魯塞尔

蒲魯东先生的著作不单是一本政治經濟学的論著，也不是一本平常的書籍，而是一部聖經；其中应有尽有，如“神秘”、“来自神的怀抱的秘密”、“启示”等。但是，因为今天預言家受到的裁判要比普通的作者更严格，所以讀者必須甘願和我們一起經過“創世記”的貧瘠而陰暗的杂学的領域，然后才和蒲魯东先生一起升入超社会主义的縹緲而富饒的境地（見蒲魯东“貧困的哲学”前言第 3 頁第 20 行）。

第一章

科学的发现

第一节 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

“一切自然产品或工业产品所具有的那种维持人类生存的性能，有一个专门名称，叫做使用价值。这些产品具有的互相交换的性能，则称为交换价值…… 使用价值怎样变成交换价值呢？…… 经济学家们并没有很仔细地阐明(交换)①价值观念的起源，因此我们必须对这一点加以论述。由于我所需要的许多东西在自然界里为数有限或者根本没有，因此我不得不去协助生产我所缺少的东西，可是，由于我不能单独生产这么多的东西，所以我就会向别人，即向各行各业中我的合作者建议，把他们所生产的一部分产品同我所生产的产品交换。”(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一卷第二章)

蒲鲁东先生打算先给我们说明价值的二重性，“价值内部的区别”，使用价值变成交换价值的过程。我们必须和蒲鲁东先生一起来谈谈这种神秘的变化。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根据我们作者的意见，这种变化是怎样发生的。

绝大多数的产品不是自然界供给的，而是工业生产出来的。如果产品的需要量超过自然界所提供的数量，人们就得求助于工业生产。在蒲鲁东先生的想像中，这种工业是什么呢？它的起源怎样呢？个人需要很多东西，可是“不能单独生产这些东西”。需要满足的多种需求，就决定要生产多种东西(不生产就没有产品)；要生产多种多样的东西，就已经决定参加这项生产的不止一个人。

①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既然认为从事生产的不止一个人，那末这就完全决定了生产是建立在分工之上的。因而蒲魯东先生所假定的那种需要本身就已经决定了全盘的分工。既假定有分工，就是假定有交换存在，因此也就有交换价值。这样看来，本来一开头就可以假定有交换价值存在。

然而蒲魯东先生喜欢繞圈子。我們就跟他一起轉吧，轉來轉去总是回到他原来的出发点去。

为了摆脱每个人单独生产的状态并达到交换，蒲魯东先生说：“我就求助于各行各业中我的合作者”。这样一来我就有了从事各行各业的合作者，虽然按照蒲魯东先生的假定我們（我和其他一切人）这时还没有摆脱魯濱遜式的那种和社会隔絕的孤独状态。合作者和各种不同的业务，分工和这种分工所包含的交换等都是凭空掉下来的。

总括起来就是：我有許多建立在分工和交换基础上的需要。蒲魯东先生既然假定有这些需要，因而也就是假定有交换和交换价值存在，而交换价值的“起源”正是他想“比其他的經濟学家更仔細地闡明”的。

同样，蒲魯东先生也可以把整个事态倒轉过来而仍然不損害他的結論的正确性。要說明交换价值就要有交换。要說明交换就要有分工。要說明分工就必须有使分工成为必要的种种需要。要說明这种需要，就必须“假定”有这种需要，但是并不是否定这种需要，这和蒲魯东先生前言中的第一个定理：“假定上帝就是否定上帝”（前言第1頁）正好相反。

假定分工是已經知道的事情的蒲魯东先生，怎样用分工來說明他始終不知道的交换价值呢？

“个人”开始“向別人，即向各行各业中他的合作者建議”建立交换，并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区别开。合作者們如果接受这种

区别，那末要蒲鲁东先生“操心”的只是记录一下既成的事实、并在他的政治经济学论文中标明和“列入”“价值观念的起源”。但是他总还应该把这个建议的“起源”讲给我们听听，此外也应该给我们讲讲这位单独的个人，这位鲁滨逊怎么会突然想到向“他的合作者”提出这种建议，而这些合作者又怎么会毫无异议地就接受了这个建议。

蒲鲁东先生并没有细究这些关系的始末，他只是给交换这一事实盖了历史的印记，把交换看做急欲确立这种交换的第三者可能提出的建议。

这就是蔑视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历史的叙述的方法”的蒲鲁东先生的“历史的叙述的方法”。

交换有它自己的历史。它经过各个不同的阶段。

曾经有这样一个时期，例如在中世纪，当时交换的只是剩余品，即生产超过消费的过剩品。

也曾经有这样一个时期，当时不仅剩余品，而且一切产品，整个工业活动都处在商业范围之内，当时一切生产完全取决于交换。对于交换的这个第二阶段，即二次方的交换价值应该怎样说明呢？

对这点蒲鲁东先生会找到很现成的回答：假定有人曾“向别人，即向各行各业中他的合作者建议”把交换价值提高到二次方。

最后到了这样一个时期，人们一向认为不能出让的一切东西，这时都成了交换和买卖的对象，都能出让了。这个时期，甚至像德行、爱情、信仰、知识和良心等最后也成了买卖的对象，而在以前，这些东西是只传授不交换，只赠送不出卖，只取得不收买的。这是一个普遍贿赂、普遍买卖的时期，或者用政治经济学的术语来说，是一切精神的或物质的东西都变成交换价值并到市场上去寻找最符合它的真正价值的评价的时期。

对于交换的这个新的和最后的阶段，即三次方的交换价值又

該怎樣說明呢？

对这点蒲魯东先生也会找到現成的回答：可以假定曾經有人“向別人，即向各行各业中他的合作者建議”把德行、愛情等都变成交換价值，把交換价值提高到三次方，即最后一次乘方。

可見，蒲魯东先生的“历史的叙述的方法”事事适用，它能答复一切和說明一切。特別是在要从历史上來說明“某种經濟观念的产生”的时候，蒲魯东先生就会假定一个人，这个人向別人，即向各行各业中他的合作者建議去完成这个产生的动作，这样問題就解决了。

从此以后，我們就把交換价值的“产生”当做一个既成事实，現在我們只要闡明一下交換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关系就行了。且听蒲魯东先生是怎么說的：

“經濟学家們很清楚地揭明了价值的二重性；但是他們並沒有同样明确地闡明价值的矛盾的本性；我們的批判就从这里开始…… 只指出使用价值和交換价值之間的这种惊人的对照是不够的，經濟学家們慣于把这种对照看成非常簡單的事情，应当指出，在这种虛构的簡單中却隐藏着深奥的秘密，我們的責任就是要弄清这个秘密…… 用术语來說，就是使用价值和交換价值成反比。”

假如我們已經領会了蒲魯东先生的思想的話，那末他要肯定的就是如下四点：

- (1) 使用价值和交換价值构成“惊人的对照”，形成互相对立。
- (2) 使用价值和交換价值成反比，互相矛盾。
- (3) 無論是两者的对立或是矛盾，經濟学家都既沒有看出也不認識。
- (4) 蒲魯东先生的批判从終点开始。

我們也从終点开始，并且为了消除蒲魯东先生对經濟学家們的責难，我們就让两个相当有名的經濟学家来讲講話。

西斯蒙第，“商业把一切东西都归结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概論”布魯塞爾版第二卷第 162 頁²）

罗德戴尔：“一般地說，国民财富（使用价值）^①是随着个人财产（因交换价值的上升）的增加而减少；如果个人财产因交换价值的下降而减少，那末国民财富通常会相应地增加。”（“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源的研究”，拉让蒂·德·拉瓦伊斯譯，1808 年巴黎版³）

西斯蒙第把他的主要学說建立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上，这个学說认为，收入的减少和生产的增长成正比例。

罗德戴尔把他的体系建立在这两种价值的反比例上，而且他的那套理論在李嘉图时代非常流行，以致后者可以把它当作一件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来談。

“由于交换价值和财富（使用价值）^②的概念混淆不清，有人就竭力断言，只要减少商品的数量，即减少生活所必需的、有用的或能享受的东西的数量，就可以增加财富。”（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原理”，孔斯坦西奥譯，让·巴·薩伊注，1835 年巴黎版第二卷“論价值和财富”章⁴）

我們看到，蒲魯东先生以前的經濟学家們“已經看出”对立和矛盾的深奥秘密。現在再来看看，蒲魯东先生在这些經濟学家們以后又是怎样說明这个秘密的。

如果需求不变，那末产品的交换价值随着供給的增长而下降，換句話說，产品越是供过于求，它的交换价值或价格也就越低。vice versa [反过來說]，越是求过于供时，供应的产品的交换价值或价格也就越高；換句話說，供应的产品越少，产品也就越貴。产品的交换价值取决于产品的多少，不过这总是对需求而言。假定某种产品不仅极为稀少，甚至是独一无二的，可是如果对它沒有需求，这个独一无二的产品也是太多，也是多余的。相反地，假定某种产

① ② 括弧里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品有千百万个,可是如果它还不能滿足需求,也就是說对这种产品的需求非常大,那末这种产品仍然是稀少的。

这些話可以說是老生常談了,但是为了弄清蒲魯东先生的秘密,在这里我們还得重述一下。

“因此,按这一原則彻底推究下去,就可以得出世界上最合邏輯的結論:凡屬日用必需而数量又是无窮的东西就一錢不值,毫无用处但极端稀少的东西价格就不可估量。但是最困难的是,实际不会容許有这两种极端,因为一方面人类生产的任何产品决不会在数量上增加到沒有止境的地步,另一方面即使最稀少的东西也会有某种用处,否則就不会有任何价值。因此,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虽然按性质來說經常力图互相排斥,但两者必然是互相联系的。”(第一卷第 39 頁)

蒲魯东先生最困难的究竟是什么呢?那就是他干脆忘記了需求,忘記了任何东西只有在对它有需求的条件下,才說得上或多或少。他撇开需求不談,就是把交换价值和稀少、把使用价值和众多混为一談。他說,“毫无用处但极端稀少的东西价格就不可估量”,这种說法实际上正是表明,稀少就是交换价值。“极端稀少和毫无用处”,这是純粹的稀少。“价格不可估量”,这是交换价值的最高限度,即純粹的交换价值。他在这两个术语之間划了一个等号。这样,交换价值和稀少就成了同义的术语。蒲魯东先生得出这个臆造的“极端的結論”,实际上他触及的并不是事物,仅仅是那些表达事物的术语,这说明他对修辞学要比邏輯学有才能得多。他以为得出了新的結論,其实只是源源本本地重新发现了他当初的假定而已。也就是用这种同样的手法,他才把使用价值和純粹的众多混为一談。

蒲魯东先生在交换价值和稀少之間、在使用价值和众多之間划了等号以后,既不能在稀少和交换价值中發現使用价值,又不能在众多和使用价值中發現交换价值,这才使他大吃一惊;他后来发

現实际不会容許有这种极端，于是只好相信神秘。蒲魯东先生以为，不可估量的价格之所以存在，正是由于沒有购买者，可是只要他撇开需求不談，那就永远找不到购买者。

另一方面，蒲魯东先生所謂的众多好像是一种自然发生的現象。他完全忘記了正是人創造了这种众多，忘記了决不忽略需求是符合人的利益的。不然蒲魯东先生怎么能够断言，极有用的东西价格应当非常低廉甚至一錢不值呢？相反地，他應該得出这样的結論：要提高极有用的东西的价格和交换价值，就必须限制这些东西的众多，縮減这些东西的生产。

从前法国种植葡萄的人要求頒布一条法律来禁止开辟新的葡萄园，这和荷兰人燒毀亚洲的香料和鏟除摩鹿加群島的丁香树如出一轍，他們就是想减少众多来提高交换价值。整个中世紀人們都奉行了这个原則，他們以法律規定，一个师傅只可以雇用多少帮工、使用多少工具。（見安德森“商业史”⁵）

蒲魯东先生把众多当做使用价值，把稀少当做交换价值（证明众多和稀少成反比是再容易不过的），就把使用价值和供給、把交换价值和需求混为一談。为了使这个对照更加明显，他就换了一个术语，用“由意見决定的价值”来代替交换价值。这样，斗争就轉移到另一个战场，現在一方面是效用（使用价值，供給），另一方面是意見（交换价值，需求）。

这两种对立的力量怎样調和呢？怎样使它們取得一致呢？能不能在它們中間找出哪怕是一点共同之处呢？

蒲魯东先生大声說，当然有，这就是决定的自由。价格是需求和供給之間、效用和意見之間进行斗争的产物，它不会代表永恒的公平。

蒲魯东先生进一步扩大这个对照：

“我作为自由的购买者，我就是我的需要的裁判，是物品适用与否的裁

判,是对这个物品願意出多少价格的裁判。另一方面,你作为自由的生产者,那你就是制造物品用的資料的主人,因此,你就能够縮減你的費用。”(第一卷第 41 頁)

• 由于蒲魯东先生把需求或交换价值和意見当作同一个东西,他就只得这样說:

“已經证明,正是人的自由意志引起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間的对立。只要自由意志存在,怎么能解决这个对立呢? 不牺牲人,怎么能牺牲自由意志呢?”(第一卷第 41 頁)

因此,不会有什么結果的。在这两种可說是不能比較的力量之間,在效用和意見之間,在自由的购买者和自由的生产者之間存在着斗爭。

讓我們更仔細地来看看問題吧。

供給并不只是代表效用,需求也不只是代表意見。难道需求者不也同样供給某种产品或貨幣(代表一切产品的符号)嗎? 既然他供給了这些东西,难道他不也代表,像蒲魯东先生所說,效用或使用价值嗎?

另一方面,难道供給者不也需求某种产品或貨幣(代表一切产品的符号)嗎? 因此他不也就成了意見的代表,由意見决定的价值的代表或交换价值的代表嗎?

需求同时又是供給,而供給同时又是需求。因此,蒲魯东先生随便把供給和效用、需求和意見混为一談的那种对照,不过是建立在空洞的抽象概念之上而已。

蒲魯东先生称为使用价值的东西,其他的經濟学家也可以称为由意見决定的价值。我們就只举施托尔希的話为例吧(“政治經濟学教程”,1823 年巴黎版第 48、49 頁⁶)。

根据施托尔希的意見,我們觉得需要的东西就叫做需要,我們給予价值的东西就叫做价值。大多数东西之所以有价值,仅仅由

于它們可以滿足意見所产生的需要。关于我們需要的意見是可以改变的，因此，东西的效用（只是表現这些东西和我們的需要的关系）也是可以改变的。就是自然的需要也在不断地变化。实际上，各国人民的主要食物的差別就非常之大！

斗争不是发生在效用和意見之間，而是发生在出卖者所要求的交换价值和购买者所提出的交换价值之間。产品的交换价值每次都是这些互相矛盾的估价的合力。

归根到底，供給和需求才使生产和消費互相接触，但是生产和消費是以个人交换为基础的。

供給的产品本来并没有效用。它的效用是由消費者确定的。即使产品的效用得到公认，但产品究竟不仅仅代表效用。在生产过程中，产品和原料、工人的工資等一切生产費用进行交换，一句话，和一切具有交换价值的东西进行交换。因此在生产者的心目中，产品代表交换价值的某种总和。生产者所供給的不仅是有效用的物品，而且主要是某种交换价值。

至于需求，它只有在掌握交换手段的条件下才有效。而这些交换手段本身也是产品，也是交换价值。

因此我們在供給和需求中，一方面发现花費过交换价值的产品和出卖这种产品的需要，另一方面又发现花費过交换价值的資金和购买的願望。

蒲魯东先生把自由的购买者和自由的生产者对立起来。他使两者具有純形而上学的性质。这也就促使他說：“已經证明，正是人的自由意志才引起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

生产者只要是在以分工和交换为基础的社会里进行生产（这正是蒲魯东先生的假定），他就不得不出卖。蒲魯东先生使生产者成为生产資料的主人，但是他却同意我們說生产者的生产資料不取决于自由意志。不仅如此，而且这些生产資料大部分又都是生

产者从别处取得的产品,并且在现代的生产条件下,他并不是想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现在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责成他在一定的限度内进行生产。

消费者并不比生产者自由。他的意见是以他的资金和他的需要为基础的。这两者都由他的社会地位来决定,而社会地位却又取决于整个社会组织。当然,工人买马铃薯和妇女买花边这两者都是根据本人的意见行事的。但是他们意见的差别就是由于他们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不同,而这种社会地位的差别却又是社会组织的产物。

需要的整个体系究竟是建立在意见上还是建立在整个生产组织上?需要往往直接来自生产或以生产为基础的情况。世界贸易几乎完全不是由个人消费的需要所决定,而是由生产的需要所决定。同样,再举另一个例子来说,对公证人的需要难道不是以一定的民法(民法不过是所有制发展的一定阶段,即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的表现)的存在为前提吗?

蒲鲁东先生并不满足于从需求和供给的关系中去掉了刚才我们说过的要素。他使抽象达到极端,把一切生产者化为一个唯一的生产者,把一切消费者化为一个唯一的消费者,然后使这两个虚构的人物互相斗争。但在现实的世界里情况并不是这样。供给者之间的竞争和需求者之间的竞争构成购买者和出卖者之间斗争的必然要素,而交换价值就是这个斗争的产物。

蒲鲁东先生去掉了生产费用和竞争以后,就能随心所欲地把需求和供给的公式弄得荒谬绝伦。

他说:“供给和需求无非是两种仪式,使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互相接触,并促进两者之间的调和。这是两个电极,把它们连接起来就会发生接合,又名交换。”(第一卷第49、50页)

同样可以说,交换只是使消费者和消费品互相接触所必要的

一种“仪式”。同样也可以說，一切經濟关系都是直接消費借以进行的一些“仪式”。供給和需求(恰如个人交換一样)就是某种生产的关系。

那末，蒲魯东先生的整个辯证法是什么呢？就是用抽象的和矛盾的概念，如稀少和众多、效用和意見、一个生产者和一个消費者(两者都是自由意志的騎士)来代替使用价值和交換价值、需求和供給。

可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呢？

为了以后能够引用他自己所去掉的各种要素中的一个要素(生产費用)作为使用价值和交換价值的綜合。在他的心目中，生产費用就是这样构成綜合价值或构成价值的。

第二节 构成价值或綜合价值

“(交換)^①价值是經濟結構的基石”。“构成”价值是經濟矛盾体系的基石。

蒲魯东先生在政治經濟学中的全部发现——“构成价值”是什么呢？

只要承认某种产品的效用，劳动就是它的价值的源泉。劳动的尺度是時間。产品的相对价值由生产这种产品所需的劳动時間来确定。价格是产品的相对价值的貨幣表現。最后，产品的构成价值不过是体現在产品中的劳动時間所构成的价值。

像亚当·斯密发现分工一样，蒲魯东先生也自以为发现了“构成价值”。当然这个发现中并没有“什么聞所未聞的东西”，但是也应该承认，在經濟学的任何一个发现中都没有什么聞所未聞的东

① 括弧里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西。蒲魯东先生虽然感觉到他的发现非常重要,但是“为了使讀者对他自以为独创的东西放心,并为了迁就那些由于懦弱而不容易接受新思想的人們”,他极力縮小这个发现的意义。但是当评价他的每一个前輩在确定价值方面所作的贡献的时候,他就不得不承认并大声宣称,在这方面,最大最多的一份应归功于他。

“亚当·斯密已經模糊地看出了价值的綜合观念……但是在他那里,这种价值观念完全是直觉的,而社会并不因信仰直觉就改变自己的习惯;只有事实的权威能使社会信服。必須使二律背反获得更明确的表现,而让·巴·薩伊就是这个二律背反的主要解釋者。”

总之,亚当·斯密有模糊的直觉,让·巴·薩伊有二律背反,蒲魯东先生則有构成着的和“构成了的”真理,这就是发现綜合价值的完整历史。但是不要弄錯,所有其他的經濟学家,从薩伊到蒲魯东;都只不过躑躅在二律背反的老路上。

“四十年以来,这么多有思想的人都为这样一个简单的观念而煞费苦心,这真令人难以置信。其实不然,价值之間虽然沒有任何共同点和任何度量单位,但也在被比較。这就是 19 世紀的經濟学家不接受平等的革命理論,却不顾一切地力图证明的一点。后人对此將怎么說呢?”(第一卷第 68 頁)

突然受到这样追問的后人首先就会对年代感到困惑。他們必然会提出这样的問題:难道李嘉图和他的学派不就是 19 世紀的經濟学家嗎?根据“商品的相对价值完全取决于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这一原則建立起来的李嘉图的体系,創始于 1817 年。李嘉图是复辟时期⁷以来在英国占統治地位的那个学派的領袖。李嘉图的学說严峻地总括了作为現代资产階級典型的整个英国资产階級的观点。“后人对此將怎么說呢?”他們总不会說蒲魯东先生完全不知道李嘉图,因为蒲魯东談起过李嘉图,談得不少,还常常引用他,可是結果却把他的学說說成是“廢話連篇”。如果后人有一天过問这件事,他們也許會說,蒲魯东先生怕激起讀者的反英情

緒，所以情願自己充當李嘉圖觀念的負責發行人。李嘉圖已科學地闡明作為現代社會即資產階級社會的理論，蒲魯東先生却硬把它當作“將來的革命理論”；李嘉圖及其學派在很早以前就提出作為二律背反的一方面即交換價值的科學公式，蒲魯東先生却把它當做效用和交換價值之間的二律背反的解決；無論如何，後人會認為這種做法太幼稚了。我們干脆撇開後人不談，讓蒲魯東先生和他的前輩李嘉圖來對質一下。下面是這位作者的著作中總括他的價值學說的幾段話：

“效用不是交換價值的尺度，雖然它對交換價值是絕對必要的。”（“政治經濟學……原理”，弗·索·孔斯坦西奧譯自英文，1835年巴黎版第一卷第3頁）

“東西本身一旦被認為有效用，那末這東西就從兩個來源，即從東西的稀少和從獲得這些東西所需要的勞動量中取得交換價值。有些東西的價值完全取決於它的稀少。因為任何勞動都不能增加它們的數量，所以它們的價值不可能由於供應增加而下降。珍貴的雕像和繪畫等就屬於這類東西。它們的價值只取決於想占有這種物品的人的財富、趣味和癖好。”（同上，第一卷第4頁和第5頁）“但是這種商品在市場上每日流轉的大多數商品中只占極少部分。因為人們想占有的絕大多數的東西都是靠勞動獲得的，只要我們願意為生產這些東西花費必需的勞動，它們的數量就會不僅在一個國家中，而且在許多國家中增加到幾乎無可限量的程度。”（同上，第一卷第5頁）“因此，當我們談到商品、商品的交換價值和調節商品的相對價格的原則時，我們總是只指那些人的勞動可以增加其數量，競爭可以刺激它們的生產而且不會碰到任何障礙的商品。”（第一卷第5頁）

李嘉圖引用亞當·斯密的話，他認為亞當·斯密“很精確地規定了一切交換價值最初的來源”（參看亞當·斯密著作第一卷第五章⁸）。然後他又補充說：

“這（即勞動時間）^①就是一切東西（除了人的勞動不能隨便增加的東西

① 括弧裏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以外)的交换价值的基础,这个学说对政治经济学有极重要的意义;因为在这門科学中,再沒有比‘价值’这个名词的含义不精确和含糊不清而造成更多的錯誤和意見分歧的了。”(第一卷第 8 頁)“如果商品的交换价值由体現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那末这种劳动量的任何增长就必然会增加在生产时花費了这种劳动的商品的价值;而劳动量的任何减少也会减低商品的价值。”(第一卷第 8 頁)

李嘉图接着責备亚当·斯密,說他:

(1)“除劳动以外又給价值提出了别的尺度,有时是粮食的价值,有时是用这种东西可以购买的劳动量”等。(第一卷第 9、10 頁)

(2)“无保留地接受这个原則,但是对这个原則的运用却只限于資本积累和土地所有权确立以前的社会的原始和粗野的状态。”(第一卷第 21 頁)

李嘉图极力证明,土地所有权即地租不能改变农产品的相对价值,而資本积累对相对价值(它是由生产中花費的劳动比較量决定的)只起暫时的不稳定的作用。为了证明这一命題,他創立了有名的地租論,把資本分解为各个組成部分,最后,他在資本里除了积累的劳动以外什么也沒有看到。他接着又發揮了整套的工資和利潤理論,并且证明,工資和利潤的增减互成反比,而这并不影响产品的相对价值。他沒有忽略資本积累、資本在性质上的差別(固定資本和流动資本)以及工資率等对产品的比值所能起的影响。这些問題就是李嘉图所注意的主要問題。

他說:“节省劳动(無論是节省制造物品本身所必要的劳动,还是节省为形成这种生产中使用的資本所必要的劳动)常常会降低商品的相对价值①。”

① 大家知道,李嘉图用“制造商品所需的劳动量”来确定商品价值。但是在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一切生产方式中(因此也包括資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占統治的交换形式造成这样的情况,这种价值不是直接被表現在劳动量上,而表現在其他的商品量上。李嘉图把表現在一定数量的其他商品(無論是不是貨幣都一样)上的商品价值叫做这个商品的相对价值。——弗·恩·(恩格斯在 1885 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第一卷第 28 頁)“因此, 只要一天的劳动一直使甲得到同量的魚, 使乙得到同量的野味, 那末無論工資和利潤的变化怎样, 資本积累所起的作用怎样, 相互交换时价格的自然率始終是一样的。”(第一卷第 32 頁)“我們把劳动看做是物品价值的基础, 而把生产物品所必需的劳动量看做确定互相交换的商品数量时所依据的标准; 但是我們也不想否认, 商品的市場价格偶而也会暂时脱离商品的这个最初的和自然的价格的。”(同上, 第一卷第 105 頁)“物品的价格归根到底是由生产費用来調节, 而不是像一般所說的由供求关系来調节。”(第二卷第 253 頁)

罗德戴尔勋爵根据供求規律, 或者說根据供多于求或供少于求的規律探討交换价值的变化。他以为, 物品的价值在物品的数量减少或需求增加时就会提高; 这个价值因物品的数量增加或因需求减少时就会下降。因此, 物品的价值在八种不同原因的影响下都会发生变化, 其中四个原因和物品本身有关, 另四个原因和貨幣或作为这种物品的价值尺度的其他商品有关。下面是李嘉图对这种观点的駁斥:

“个人或公司所壟断的产品的价值, 是按照罗德戴尔勋爵确定的規律变化的, 产品的价值随供应量的增加而下降, 随购买者需求的扩大而上升。产品的价格和它的自然价值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至于在出卖者中間引起竞争而且数量可以适当增加的那些物品, 它們的价格归根到底也不是取决于供求关系, 而是取决于生产費用的增减。”(第二卷第 259 頁)

我們让讀者自己把李嘉图的这种简单明了而又准确的語言和蒲魯东先生想用劳动时间来确定相对价值的那种玩弄辞句的企图比較一下。

李嘉图給我們指出资产階級生产的实际运动, 即构成价值的运动。蒲魯东先生却撇开这个实际运动不談, 而“煞費苦心地”去发明按照所謂的新公式(这个公式只不过是李嘉图已清楚表述了的现实运动的理論表現)来建立世界的新方法。李嘉图把現社会当做出发点, 給我們指出这个社会怎样构成价值; 蒲魯东先生却把

构成价值当做出发点，用它来构成一个新的社会世界。根据蒲鲁东先生的说法，构成价值应当绕个圈子，又成为按照这种估计方法已经完全构成的世界的构成因素。在李嘉图看来，劳动时间确定价值这是交换价值的规律，而蒲鲁东先生却认为这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综合。李嘉图的价值论是对现代经济生活的科学解释；而蒲鲁东先生的价值论却是对李嘉图理论的乌托邦式的解释。李嘉图从一切经济关系中得出他的公式，并用来解释一切现象，甚至如地租、资本积累以及工资和利润的关系等那些骤然看来好像是和这个公式抵触的现象，从而证明他的公式的真实性；这就使他的理论成为科学的体系。蒲鲁东先生只是完全凭任意的假设再度发现了李嘉图的这个公式，后来就不得不找出一些孤立的经济事实，加以歪曲和捏造，以便作为例证，作为实际应用的现成例子，作为实现他那新生观念的开端。（见本章第三节“构成价值的应用”）

现在来谈谈蒲鲁东先生从（由劳动时间）构成的价值中得出的结论。

——一定的劳动量和同一劳动量所创造的产品是等价的。

——任何一个劳动日和另一个劳动日都是相等的；这就是说，一个人的劳动和另一个人的劳动如果数量相等，二者也是等值的，两个人的劳动并没有质的差别。在劳动量相等的前提下，一个人的产品和另一个人的产品相交换。所有的人都是雇佣工人，而且都是以相等劳动时间得到相等报酬的工人。交换是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的。

这些结论是不是由劳动时间所“构成”或决定的价值的自然的和必然的结果呢？

如果商品的相对价值由生产商品所需的劳动量来决定，那末自然就会得出结论说，劳动的相对价值或工资也由生产工资所必

需的劳动量来决定。工资，即劳动的相对价值或价格，因而也是由生产工人一切生活必需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来决定的。

“如果把帽子的生产费用减少，即使需求增加两三倍，帽子的价格结果也会降到新的自然价格的水平。如果用减少维持生活的粮食和衣服的自然价格的办法来减少人们的生活费用，即使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大增加，结果工资也会下降。”(李嘉图，第二卷第 253 页)

当然，李嘉图的话是极为刻薄的。把帽子的生产费用和人的生活费用混为一谈，这就是把人变成帽子。但是用不着对刻薄大声叫嚷！刻薄在于事实本身，而不在于表明事实的字句！法国的作家，像德罗兹、布朗基、罗西等先生用遵守“人道的”语言的礼节来证明他们比英国的经济学家们高明，从而得到天真的满足；如果他们责难李嘉图和他的学派言词刻薄，那是由于他们不乐意看到把现代经济关系赤裸裸地揭露，把资产阶级最大的秘密戳穿。

总括起来就是：劳动本身就是商品，它是作为商品由生产劳动这种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来衡量的。而要生产这种劳动商品需要什么？需要为了生产维持不断的劳动即供给工人活命和延续后代所必需的物品的时间。劳动的自然价格无非就是工资的最低额^①。如果工资的市价超过了它的自然价格，那是由于被蒲鲁东先生推崇为原则的价值规律遇到供求关系波动后果的抵

① 劳动力的“自然”价格(即正常价格)和工资的最低额相等，即和保证工人活命和延续后代所绝对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相等；这一论点，是我首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 1844 年巴黎版]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⁹中提出的。从本文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当时是采用了这个论点的。拉萨耳借用了我们两人的这个论点，虽然工资实际上经常有接近最低额的趋势，但上述论点毕竟是不正确的。劳动力的报酬平均总低于劳动力的价值，这一事实并不能改变它的价值。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纠正了上述论点(见“劳动力的买和卖”节)，而且阐明了在资本主义生产下劳动力的价格会愈来愈低于劳动力的价值(第二十三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弗·恩·(恩格斯在 1885 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抗。但是工資的最低額始終是工資市場價格趨向的中心。

因而，由勞動時間衡量的相對價值註定是工人遭受現代奴役的公式，而不是蒲魯東先生所希望的無產階級求得解放的“革命理論”。

現在我們來看看，把勞動時間作為價值尺度這種做法和現存的階級對抗、和勞動產品在直接勞動者與積累勞動占有者之間的不平等分配是多麼不相容。

我們就拿一種產品例如麻布來說。這種產品本身包含着一定的勞動量。無論參加製造這種產品的人們的相互地位起什麼變化，這種勞動量始終是一樣的。

再拿別的產品例如呢絨來說，並假定生產呢絨所需要的勞動量和生產麻布的勞動量相等。

如果這些產品互相交換，那就是相等的勞動量在交換。這種等量的勞動時間的交換並沒有改變生產者的相互地位，正如工人和工廠主的相互關係沒有任何改變一樣。如果認為這種由勞動時間來衡量價值的產品的交換會使一切生產者得到平等的報酬，這種說法就是假定，平等分配還在交換以前就存在了。當呢絨和麻布進行交換的時候，呢絨的生產者就會在麻布上恰恰占有他們以前在呢絨上所佔有的那一份。

蒲魯東先生的謬誤是由於他把至多不過是一種沒有根據的假設看做結果。

我們再看下去。

我們把勞動時間當做價值尺度，那末這至少是不是假定各個勞動日是等價的，這一個人的勞動日和另一個人的勞動日是等值的呢？不是。

暫且假定，一個首飾匠的勞動日和一個織布工人的三個勞動日是等價的；在這種情況下，首飾品對紡織品比值的任何變化，如果

不是供求变动的暂时结果，就必然是由于两种生产的劳动时间有所增减。如果不同的劳动者的三个劳动日相互的比例是1：2：3，他们产品的相对价值中的一切变化也会是这个比率，即1：2：3。因此，虽然不同的劳动日的价值不等，价值还是可以用劳动时间来衡量的；但是要使用这种尺度，就需要有一个可以比较各种不同劳动日价值的尺度表；确定这种尺度表的就是竞争。

你每小时的工作和我每小时的工作是不是等值？这是要由竞争来解决的问题。

据一个美国经济学家的意见，竞争决定着一个复杂劳动日中包含多少简单劳动日。把复杂劳动日化为简单劳动日，这是不是假定把简单劳动当做价值尺度呢？如果只把劳动量当做价值尺度而不问它的质量如何，那也就是假定简单劳动已经成为生产活动的枢纽。这就是假定：由于人隶属于机器或由于极端的分工，各种不同的劳动逐渐趋于一致；劳动把人置于次要地位；钟摆成了两个工人相对活动的精确的尺度，就像它是两个机车的速度的尺度一样。所以不应该说，某人的一个工时和另一个人的一个工时是等值的，更确切的说法是，某人在这一小时中和那个人在同一小时中是等值的。时间就是一切，人不算什么；人至多不过是时间的体现。现在已经不用再谈质量了。只有数量决定一切：时对时，天对天；但是这种劳动的平均化并不是蒲鲁东先生的永恒的公平；这不过是现代工业的一个事实。

在使用机器的企业中，这个工人的劳动和那个工人的劳动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工人彼此间的区别，只是他们在劳动中所化的时间不等。但是从某种观点来看，这种量的差别也成了质的差别，因为用在劳动上的时间一方面是取决于纯粹物质方面的原因，例如生理的构造、年龄和性别；而另一方面却又取决于一些纯粹消极的精神上的原因，例如忍耐、镇静和勤恳。最后，如果说工人的劳动

中有质的差别，那末这至多也不过是一种决不能作为特点的无足轻重的质。总之这就是现代工业的情况。而蒲鲁东先生却把他打算在“将来的时代”中普遍实现的“平均化”的刨子用到机器劳动中早已实现的这种平等上。

蒲鲁东先生从李嘉图学说中引伸出的一切“平等”的结论，是建立在一个根本谬误的基础上。他把用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来衡量的商品价值和用“劳动价值”来衡量的商品价值混为一谈。如果把这两种衡量商品价值的方法搅在一起，那末也就同样可以说，任何一种商品的相对价值都是由它本身所包含的劳动量来衡量的；或者说，商品的相对价值是由它可以购买的劳动量来衡量的；或者还可以说，商品的相对价值是由可以得到它的那种劳动量来衡量的。但是情况远不是这样。像任何其他的商品价值一样，劳动价值不能作为价值尺度。为了更清楚地说明上面这点，只要举几个例子就行了。

如果一个穆伊^①的谷物在以前值一个劳动日，而现在值两个劳动日，这就是说它的价值要比原来增加一倍；但是这一个穆伊的谷物并不能起一倍劳动量的作用，因为它包含的养料和以前一样多。因此，由生产谷物使用的劳动量来衡量的谷物价值将增加一倍，但是用谷物能购买的劳动量或者可以用来购买谷物的劳动量来衡量的谷物价值，决不会增加一倍。另一方面，如果用同样的劳动生产了比以前多一倍的衣服，那末衣服的相对价值就会因此降低一半；但是即使如此，这种数量加倍的衣服支配一定劳动量的能力并不会降低一半，或者换句话说，同样的劳动并不能取得加倍数量的衣服；因为现在这一半数量的衣服对工人的效用和以前同样数量的衣服的效用完全一样。

① 法国古代的容量名，用于量谷物时约合 1800 公升。——编者注

因此，用劳动价值来确定商品的相对价值是和經濟事实相抵触的。这是在循环論证中打轉，这是用本身还需要确定的相对价值来确定相对价值。

毫無疑問，蒲魯东先生是把以下两种衡量的方法混为一談了：一种是用生产某种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時間来衡量，另一种是用劳动价值来衡量。他說：“任何人的劳动都可以购买这种劳动所包含的价值。”因此按照他的說法，产品中所包含的一定劳动量和劳动者的报酬是相等的，即和劳动价值是相等的。根据同样的理由，他把生产費用和工資也混为一談了。

“工資是什么？这是粮食等的成本，这是一切东西的全部价格。再进一步說，工資是构成財富的各要素的均匀配合。”

工資是什么？这就是劳动价值。

亚当·斯密有时把生产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時間当做是价值尺度，有时却又把劳动价值当做价值尺度。李嘉图揭露了这个錯誤，清楚地表明了这两种衡量方法的差别。蒲魯东先生加深了亚当·斯密的錯誤。亚当·斯密只是把这两个东西并列，而蒲魯东先生却把两者混而为一。

蒲魯东先生寻找商品相对价值的尺度是为了进而找出工人們应分得的产品正确比例，或者換句話說，为了确定劳动的相对价值。为了确定商品相对价值的尺度，除了把一定劳动量所創造的产品总額当做它的等价物外，他想不出更好的方法。这就等于說，似乎整个社会仅仅是由以工資形式領得自己的产品的直接劳动者所組成。此外，他还把各种不同劳动者的工作日的价值相等当做既成事实。总而言之，他寻找商品相对价值的尺度是为了找出劳动者的平等报酬，他把工資的平等当做已經完全确定的事实，是为了根据这种平等去找出商品的相对价值。多么奇妙的辯证法！

“薩伊和追隨他的一些經濟學家們指出說，勞動是一種其本身價值尚待確定的東西，是像任何其他商品一樣的商品，因此，如果把勞動當做價值的原則和實際的原因，那就是墮入循環論證中了。我可以說，這些經濟學家的這種說法表現了極大的疏忽。人們認為勞動有價值並不因為它本身是商品，而是指人們認定勞動中所隱含的價值。勞動的價值是一種倒因為果的比喻說法。它和資本的生產率一樣，是一種臆想。勞動在生產，資本有價值……所謂勞動價值，是一種簡略的說法……勞動像自由一樣……按其本質來說是一種模糊而不確定的東西，然而它的性質在其對象中是確定的；換句話說，勞動通過它的產品而成為實在的東西。”

“然而何必堅持呢？因為經濟學家（讀做蒲魯東先生）^①既要改變事物的名稱，*vera rerum vocabula* [事物的真正名稱]，就是默認自己無能，逃避問題的討論。”（蒲魯東，第一卷第188頁）

由此可見，蒲魯東先生把勞動價值變為產品價值的“實際原因”，因為他以為工資（“勞動價值”的正式名稱）構成一切東西的全部價格。正因為如此，薩伊的反駁使他感到惶惑不安。他把勞動商品這個可怕的事實只看做是文法上的簡略。這就是說，建立在勞動商品基礎上的整個現代社會，今後僅僅是建立在某種破格的詩文和比喻性的用語上了。如果社會願意“排除”使它煩惱的“一切麻煩”，那末只要去掉不好聽的字句，改一改說法就可以了；要達到這個目的，只要請求科學院出版一部新辭典就夠了。這樣一來就不難了解，為什麼蒲魯東先生認為必須在政治經濟學的著作中大事議論語源學和文法學的其他部分。例如，他老是擺出一付學者的面孔，反對把 *servus* [奴隸] 這字解釋成起源於 *servare* [保護] 那種陳舊的說法。這種語文學的議論具有深刻的意義，神秘的意義，這些議論構成蒲魯東先生論證的重要部分。

由於勞動^②被買賣，因而它也和任何其他商品一樣，也是一種

① 括弧裏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② 在1876年馬克思送給娜·吳亭娜的那一本上，“勞動”後面添上了“勞動力”一詞。1896年的法文版上也加上了這一詞。——編者注

商品，因此它也有交换价值。但是劳动的价值或作为商品的劳动并不生产什么，正如粮食的价值或者作为商品的粮食不能当作食物一样。

劳动“值”多少取决于食物的贵贱，取决于劳动人手供求量的大小等等。

劳动决不是“不确定的东西”，进行买卖的不是一般的劳动，而总是某种确定的劳动。不仅劳动的性质由对象来确定，而且对象本身也由劳动的特性来确定。

由于劳动被进行买卖，所以它本身就是商品。为什么人们要买它呢？“由于人们认为劳动中蕴含着价值”。但是当人们说某个东西是商品时，那这里所指的就已经不是购买它的目的，就是说，不是指想从这个东西中取得的效用，不是指想拿它做什么用了。它成为商品是由于它是交易对象。蒲鲁东先生的一切议论总结起来不外是：劳动不是作为直接的消费对象才被购买。当然不是的，人们购买它是把它当做生产工具，就像购买机器一样。由于劳动是商品，所以具有价值，但它并不生产东西。蒲鲁东先生也可以这样说，根本不存在任何商品，因为购买任何商品只是为了它的某种效用，而决不是由于它是一种商品。

蒲鲁东先生用劳动来衡量商品的价值，他就笼统地认为，既然劳动具有价值，是劳动商品，那就不能不把它置于这个共同的尺度下。他预感到，这样说就是承认工资的最低额是直接劳动的自然的和正常的价格，因而也就是承认现代的社会制度。为了逃避这个倒霉的结论，他就掉转头来说，劳动不是商品，它不可能有价值。他忘了自己就曾经把劳动的价值当做尺度；他忘了他的整个体系是建立在劳动商品的基础上，建立在可以买卖和交换各种产品的交易对象——劳动的基础上，建立在作为工人收入的直接源泉——劳动的基础上。他忘了一切。

为了挽救他的体系，他决心牺牲体系的基础。

Et propter vitam vivendi perdere causas! [为了生活而失去生活的根基]①

現在我們得出了“构成价值”的一个新的定义。

“价值是构成财富的各种产品的比例性关系”。

首先我們說，在“相对价值或交换价值”这个简单的用語中已經包含着产品互相交换的某种关系的概念。把这种关系叫做“比例性关系”，除了名称以外，意思根本沒有改变。产品的价值无论怎样漲跌，絲毫不会使这种产品失去它和构成财富的其他产品形成某种“比例性关系”的那种特性。

这个新术语并没有新概念，要它做什么呢？

“比例性关系”使人联想到許多其他的經濟关系，例如生产的比例性，供求之間的适当比例等；而蒲魯东先生在以訓人的口吻解釋交换价值的时候，是考虑到这一切的。

首先，由于产品的相对价值由生产每种产品所使用的劳动比較量来确定，在这种情况下，比例性关系就是表示在一定時間內所能生产并因而能互相交换的产品的相对量。

讓我們再看一看蒲魯东先生从这个比例性关系中得到了什么好处。

大家都知道，当供求互相均衡的时候，任何产品的相对价值都恰好由包含在产品中的劳动量来确定，也就是說，这种相对价值恰好表示了我們剛才所解釋的比例性关系。蒲魯东先生把实际情况弄顛倒了。他說：只要先开始用产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来衡量产品的相对价值，那末供求就必然会达到平衡。生产就会和消費相适应，产品就可以永远順利地进行交换，而产品的市場价格也就会

① 尤維納利斯“諷刺集”。——編者注

恰好表现产品的真正价值。一般人都这样说：天气好的时候，可以碰到许多散步的人；可是蒲鲁东先生却为了保证大家有好天气，要大家出去散步。

被蒲鲁东先生当做由劳动时间先天决定交换价值中所得出的结果，大概只能用下面这种规律来说明：

今后产品应当完全按照花费在产品上的劳动时间来交换。不论供求关系怎样，商品的交换应当永远像商品的生产量完全适合需求那样来进行。就让蒲鲁东先生来担任制定和贯彻这样一个规律好了，这里我们并不要求他提出证据。可是他如果想以经济学家的身份，而不是立法者的身份来为自己的理论辩护，那末他就应当证明：生产商品所必要的时间恰好表明了商品的效用的程度，而且表示了商品对需求的比例性关系，因而也表明了商品对财富总额的比例性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产品按照等于生产费用的价格出售，供求就会永远保持平衡；因为生产费用被认为是表示供求的真正关系的。

蒲鲁东先生确实力图证明：生产产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说明它和需要的真正关系，所以在生产上花费时间最少的东西是最有直接效用的东西，并且可以依次类推。根据这个理论，生产奢侈品这一事实就足以证明社会有多余时间来满足某种奢侈的需要。

至于这种论点的证据，蒲鲁东先生是这样说的：根据他的观察，生产最有效用的东西需要的时间最少；社会总是先从最轻便的生产部门开始；然后才逐步地“转到生产那些化费劳动时间最多并适合更高级需要的东西”。

蒲鲁东先生从杜诺瓦耶先生那里借用了采捕（如采集果子、牧放、狩猎、捕鱼等）这一最简单、花费最少的工业作为例子；人类的“第二个创造的第一天”就是从这种工业开始的。他的第一个创造的第一天则记载在创世纪中，它告诉我们上帝是世界上第一个工

业家。

实际上，情况完全不像蒲魯东先生所想的那样。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級別、等級和階級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沒有对抗就沒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規律。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階級对抗的規律而发展起来的。如果硬說由于所有劳动者的一切需要都已滿足，所以人們才能創造更高級的产品和从事更复杂的生产，那就是撇开階級对抗，顛倒整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不然也可以这样說：因为在羅馬皇帝时代曾有人在水造的池子里喂养鱈魚，所以說全体羅馬居民的食物是充裕的。然而实际情况完全相反，当时羅馬人民連必要的粮食也买不起，而羅馬的貴族却并不缺少充当鱈魚飼料的奴隶。

生活用品的价格几乎不断上升，而工业品和奢侈品的价格却几乎不断下降。就拿农业來說，最必需的东西，如粮食、肉类等的价格不断上漲，而棉花、食糖、咖啡等的价格却以惊人的比例不断下降。就在真正的食品中，如朝鮮薊、龙鬚菜等奢侈品在今天要比最必需的食品便宜。在我們这个时代中，多余的东西要比必需的东西更容易生产。最后，在各种不同的历史时代中，价格的相互关系不仅各不相同，而且完全相反。整个中世紀中，农产品比工业品便宜；近代，两者之間的情形倒过来了。但是能由此得出結論說，农产品的效用自中世紀以来减少了嗎？

产品的使用取决于消費者所处的社会条件，而这种社会条件本身又建立在階級对抗上。

棉花、馬鈴薯和燒酒是最普遍的消費品。馬鈴薯引起了瘰癧；棉花大規模地排挤亞麻和羊毛，虽然羊毛和亞麻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使从卫生观点來說，也比棉花更有用。最后，燒酒占啤酒和葡萄酒的上風，虽然大家都承认把燒酒当作食品是有害的。整整一个

世紀，各國政府竭力抵制歐洲的鴉片，然而毫無效果；經濟取得了勝利，消費得聽它的命令。

為什麼棉花、馬鈴薯和燒酒是資產階級社會的基石呢？因為生產這些東西需要的勞動最少，因此它們的價格也就最低。為什麼價格的最低額決定消費的最高額呢？是不是由於這些物品本身有絕對的效用，由於它們的效用最能滿足作為人的工人，而不是作為工人的人的種種需要呢？不，這是因為在建立在貧困上的社會中，最粗劣的產品就必然具有供給最廣大群眾使用的特權。

如果說因為最便宜的物品使用最廣，因而這些物品就應當有最大的效用，這就是說，燒酒由於生產費用低廉而到處風行，這件事就是燒酒的效用最確凿的證明；這就是向無產者說，馬鈴薯比肉對他們更有益；這就是和現狀妥協；結果，這就是和蒲魯東先生一起為自己並不理解的社會進行辯護。

在沒有階級對抗和沒有階級的未來社會中，用途大小就不會再由生產所必要的時間的最低額來確定，相反地，花費在某種物品生產上的時間將由這種物品的社會效用大小來確定。

現在我們再回到蒲魯東先生的命題上來。生產物品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既不表現它的效用程度，那末早就由包含在物品中的勞動時間所確定的這種物品的交換價值就決不能調節供求的正確關係，即蒲魯東先生現在所說的**比例性關係**。

供求的“**比例性關係**”，也就是一種產品在生產總和中所占的比例，根本不決定於這種產品按照相等於生產費用的價格的出售。只有**供求的變動**告訴生產者，某種商品應當生產多少才可以在交換中至少收回生產費用。這種變動是經常的，所以資本也就不斷地出入於各個不同的工業部門。

“正是由於這種變動，資本才按照適當的比例（而不是超過這個比例）投入各種有需求的商品的生產中去。利潤隨着價格的漲落而升降於一般水平

上下,因此,随着某一生产部門中的不同变化,資本时而流向那里,时而又从那里流出。”——“如果我们注意一下大城市的市場,那末我們就会看到,这些市場如何正常地如数供应各种国内外商品,不管这里的需求由于爱好或人口数量的变动有什么变化;市場上很少发生供应过多、商品充斥或供不应求、物价飞漲的現象。我們应当承认,在各个生产部門間按照精确的适当比例分配資本的原則所起的作用,要比平常所想像的巨大得多。”(李嘉图,第一卷第105、108頁)

如果蒲魯东先生承认产品的价值由劳动時間来确定,那末他同样也应当承认,在以个人交换为基础的社会中,单只这种搖摆运动已使劳动時間成为价值尺度。完全构成了的“比例性关系”是不存在的,只有构成这种关系的运动。

我們剛才已經看到,在什么意义下把“比例性”說成是由劳动時間来确定价值的結果才算正确。現在我們再来看看,蒲魯东先生称为“比例規律”的这个用時間来衡量的尺度如何变为比例失調的規律。

任何一种新发明,只要能在一小时内生产出过去两小时才生产的东西,都会使市場上所有这一类的产品跌价。竞争迫使生产者出卖花两小时生产的产品时不能貴于花一小时所生产的产品。竞争实现了产品的相对价值由生产它的必要劳动時間来确定这一規律。劳动時間成为交换价值的尺度这一情况因而也就成了劳动不断跌价的規律。不仅如此,跌价的不仅是运到市場上去的商品,而且連生产工具以及整个企业也都在內。李嘉图已指出这个事实,他說:

“由于生产日益便利,因而过去生产的某些东西的价值也就不断下降。”(第二卷第59頁)

西斯蒙第更进了一步。他认为这种由劳动時間所“构成的价值”是現代工商业的一切矛盾的根源。

他說：“交換價值歸根到底總是由取得這種東西所必要的勞動量來確定；但不是實際花費的勞動量，而是在今後生產資料可能改進的情況下將要花費的勞動量。這種勞動量雖然很難作精確的確定，但它總是由競爭加以正確地確定…… 這一勞動量就是出賣者和購買者之間議價的基礎。出賣者也許會說，這種東西花費了他十個工作日；但如果購買者知道這種東西以後花八個工作日就能生產出來，如果競爭給雙方提出確凿的證明，那末這種東西的價值就會縮減到八個工作日，市場價格也就會固定在這個水平上。當然出賣者和購買者都知道這種東西是有用的，是有人需要的，如果沒有人需要這種東西，那也就賣不出去；但是規定這種東西的價格却和它的效用毫無關係。”（“政治經濟學概論”布魯塞爾版第二卷第 267 頁）

千萬不要忽視，一種東西的價值不是由生產它的時間來確定，而是由可能生產它的**最低限度**的時間來確定，而這種最低額又是由競爭來規定。我們暫且假定沒有競爭，因而也就沒有任何方法來規定為生產某種商品所必要的勞動的最低額。那時將會怎樣呢？按照蒲魯東先生的理論，要以一種物品換取六倍多同樣的物品，只要把別人一小時能生產的用六小時來生產就行了。

如果我們不論好壞總是要什麼關係，那末我們得到的就不會是“比例性關係”，而是比例失調的關係。

勞動的不斷跌價只是一個方面，只是用勞動時間估價商品的一個結果。價格過高、生產過剩以及其他許多生產無政府狀態的現象也都可以用這種估價的方法來解釋。

但是把勞動時間作為價值尺度，會不會至少引起蒲魯東先生為之神往的那種產品的均勻的多样化呢？

恰恰相反，它使單調而清一色的壟斷在產品領域中占統治；正如大家看到和知道的，這種壟斷已經侵入了生產工具的領域。只有某些生產部門，例如棉紡織工業會很快地進步。這種進步的自然結果就是使棉紡織工業產品價格迅速下降；但是隨着棉花價格的下跌，亞麻的價格就必然會比棉花昂貴。這會發生什麼結果呢？

那就是棉花排挤亚麻。亚麻就这样几乎从整个北美被驅逐出来，結果并不是产品的均匀的多样化，而是棉花的統治。

此外，这个“比例性关系”还有什么呢？除了那种希望商品能按比例生产（这可以使商品按公平价格出售）的好心人的善良願望以外，就什么也沒有。不論什么时候，好心腸的資產者和仁慈的經濟学家总喜欢表示这种天真的願望。

我們且听听布阿吉尔貝尔老头是怎样說的。

他說：“各种商品的价格必須永远是成比例的，因为只有这种相互的协调，才能使它們共同存在，时时刻刻能互相进行交換（这就是蒲魯东所謂的不断交換性能）^①，时时刻刻能互相重新生产…… 财富无非是人和人之間、企业和企业之間等的这种不断的交換，因此，如果不在因脫离比例价格而引起的交換的破坏中寻求貧困的原因，将是一种极大的謬誤。”（“論財富的本性”，見德尔編的文集¹⁰）

我們也听听一位現代經濟学家是怎样說的：

“应当运用于生产的重要規律就是比例規律（the law of proportion），只有它才能保持价值經常不变…… 等价物必須得到保证…… 一切国家在各个时代都企图用許多商业上的規定和限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来实现这个比例規律。但是人性固有的利己心把这整个調节制度推翻了。比例生产（proportionate production）就是真正的社会經濟科学的实现。”（威·阿特金森“政治經濟学原理”1840年倫敦版第170—195頁¹¹）

Fuit Trojal [特洛伊城已不存在！] 人們一再迫切希望实现的这种供求之間的正确比例早就不存在了。它已經过时了；它只有在生产資料有限、交換是在极狹隘的範圍內进行的时候，才可能存在。随着大工业的产生，这种正确比例必然消失；由于自然規律的必然性，生产一定要經過繁荣、衰退、危机、停滞、新的繁荣等等

^① 括弧里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周而复始的更替。

誰像西斯蒙第那样想恢复生产的正确比例，同时又要保存现代的社会基础，誰就是反动者，因为要贯彻自己的主張，他們必定要竭力恢复旧时工业的其他条件。

是什么东西維持了生产的正确的或大致正确的比例呢？是支配供給并先于供給的需求；生产是紧随着消費的。大工业由于它所使用的工具的性质，不得不經常以愈来愈大的規模进行生产，它不能等待需求。生产走在需求前面，供給强制需求。

在现代社会中，在以个人交换为基础的工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灾难丛生的根源，同时又是进步的原因。

因此，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是希望在现代生产資料的条件下保持旧时的正确比例，这就意味着他既是反动者又是空想家；

或者是希望一种沒有无政府状态的进步，那就必須放棄个人交换来保存生产力。

个人交换或者只适宜于过去几世紀的小工业和它特有的“正确比例”，或者适宜于大工业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貧困和无政府状态。

归根到底，用劳动时间来确定价值，即蒲魯东先生当做将来再生公式向我們推崇的那个公式，也无非是现代社会的科学表现，而这早在蒲魯东先生以前李嘉图就明确地論证过。

但是，“平均主义地”应用这个公式至少不應該归功于蒲魯东先生嗎？是他第一个想到把一切人都变成交换同等劳动量的直接劳动者这样的方法来改造社会嗎？应当由他来責备共产主义者（这些对政治经济学一窍不通的家伙，这些“頑固不化的笨蛋”，这些“天国的梦想家”），責备他們在他以前沒有发现这样“解决无产阶级的問題”嗎？

只要对英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有一点点了解,就不会不知道,这个国家所有的社会主义者在各个不同时候几乎都提倡过平均主义地应用李嘉图的理论。我们可以给蒲鲁东先生指出如下一些著作:霍吉斯金的“政治经济学”(1827年版)¹²,威廉·汤普逊的“为人类谋取最大福祉的财富分配原则”(1824年版),托·娄·艾德門茲的“实践的、精神的和政治的经济学”(1828年版)¹³等等,这一类的著作的名称还可以写上四页。现在我们且来听听一位英国共产主义者布雷先生是怎么说的。这里引用他的出色的著作“劳动的弊害及其消除方法”(1839年里子版¹⁴)中最重要的几段话,并且我们将要在这上面多花些时间,首先因为布雷先生在法国还很少有人知道,其次是我们觉得在这位作者的著作中可以找到了解蒲鲁东先生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著作的钥匙。

“弄清基本原则是得出真理的唯一方法。我们马上来回溯一下产生政府本身的根源。这样去探究事物的本源,我们就会发现一切统治的形式,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公平都是从现在占统治的社会制度,即**现存的私有制度**(the institution of property as it at present exists)中产生出来的。因此,要永远消除现在的不公平和贫困,就必须**彻底摧毁现代的社会制度**……如果我们在经济学家的领域中用他们自己的武器去攻打他们,那就可以摆脱他们经常喜欢搬用的什么**空想家、空论家**那套废话。只要经济学家们不想否认或推翻他们自己的论点所依据的那种公认的真理和原则,那末他们就决不能推翻我们按照这种方法所得出的结论。”(见布雷上述著作第17、41页)“**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It is labour alone which bestows value)……每个人对于他用正当劳动所获得的一切东西都有不容置辩的权利。如果他占有了他自己的劳动果实,那末他对其他人并没有做出任何不公正的行为;因为他丝毫没有侵犯别人这样做的权利……一切关于高贵和低贱以及主人和雇佣工人的概念,都是由于忽视基本原则及因之而产生的**财产不平等**(and to the consequent rise of inequality of possessions)所引起的。只要这种不平等继续存在,那末这些观念就不可能根除,建立在这些观念上的制度也不可能推翻。直到现在还有许多人枉费心机地希望通过消灭

現存的不平等但并不触及这种不平等的原因，来糾正現在占統治的这种反常情况；但是我們馬上就要指出：政府不是原因，而是結果，它不是創造者，而相反地是被創造者，总而言之，政府是財產不平等的产物 (the offspring of inequality of possessions)，而財產的不平等和現在的社会制度是密不可分的。”(同上，第 33、36、37 頁)

“平等制度不仅有极大的优越性，而且十分公正…… 每个人都是一个环节，而且是一連串作用中不可缺少的环节，这一連串的开头只是一个观念，而末端也許是一匹呢絨的生产。因此，虽然我們对各种职业有不同的感觉，但不应由此得出結論說，这个人的劳动必須比另一个人的劳动得到較多的报酬。发明家除了得到正当的金錢报酬以外，經常还会获得我們只給予天才的那种贊誉……

“按照劳动和交换的性质來說，严格的公正的要求是交换双方的利益不仅是相互的，而且是相等的(all exchangers should be not only mutually but they should likewise be equally benefited)。人們之間可以交换的东西只有两种，即劳动和劳动产品。在公正的交换制度下，一切产品的价值都会由它們的生产費用的全部总和来确定，并且相等的价值經常会換得相等的价值(If a just system of exchanges were acted upon, the value of all articles would be determined by the entire cost of production, and equal values should always exchange for equal values)。如果帽匠化一个工作日生产一頂帽子，鞋匠化同样的時間做出一双鞋子(假定两者所用的原料的价值是相同的)，他們把这两种产品进行交换，那末他們从这种交换中所得到的利益就不仅是相互的，而且是相等的。这时一方所得的利益不会是对方的損失，因为两者都提供了同等的劳动量，而且都是使用同等价值的材料。但是如果在上述所假定的相同条件下，帽匠用一頂帽子換得两双鞋子，那末显而易见，这种交换是不公正的。帽匠骗得了鞋匠一个工作日，如果帽匠在所有的交换中都这样，那末他用半年的劳动就会得到別人一年的劳动产品。直到今天，我們一直在遵循这种最不公正的交换制度：工人們交給資本家一年的劳动，但只換得半年的价值(the workmen have given the capitalist the labour of a whole year, in exchange for the value of only half a year)。財富和权力的不平等就从这里产生，而决不是由人們所說的个人的体力和智力的不等产生。交换的不平等以及买卖价格的差異，只有在以下的情况下才能存在，即資本家永

远是资本家，而工人永远是工人，一面是暴君阶级，另一面是奴隶阶级……资本家和工人之间这种交易明显地表明，资本家和财主们对工人一星期劳动的偿付，只是他们上星期从工人那里取得的财富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他们同工人以无易有 (nothing for something)……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全部交易纯粹是一幕滑稽剧：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无非是一种无耻的（虽是法定的）抢劫而已 (The whole transaction between the producer and the capitalist is a mere farce: it is, in fact, in thousands of instances, no other than a barefaced though *legalised robbery*).” (同上，第 45, 48, 49, 50 页)

“只要企业主和工人之间的交换不平等，那末企业主的利润就永远是工人的损失；只要社会分成资本家和生产者，只要生产者靠自己的劳动过活而资本家靠从别人劳动中榨取利润来养肥自己，那末交换就不会平等……”

布雷先生接着说：“显然，不论建立什么统治形式……不论怎样宣扬道德和友爱……互惠和交换的不平等是不相容的。交换的不平等是财产不平等的源泉，它是吞噬我们的无形的敌人 (No reciprocity can exist where there are unequal exchanges. Inequality of exchanges, as being the cause of inequality of possessions, is the secret enemy that devours us)” (同上，第 51, 52 页)

“从考察社会的目的和任务中我可以得出结论说，不仅一切人都必须劳动，这样才能进行交换，而且相等的价值必须和相等的价值进行交换。其次，为了使一个人的利益不致成为另一个人的损失，价值必须由生产费用来确定。然而我们知道，在现存的社会制度下，资本家和富人的利益永远是工人的损失，这个结果是不可避免的；只要交换的不平等继续存在，在一切的统治形式下，穷人将完全听凭富人摆布。平等交换只有在普遍劳动的社会制度下才能得到保证……平等交换会使财富逐渐地由现在的资本家手里转到工人阶级的手里。” (同上，第 53—55 页)

“只要这种不平等交换制度继续存在，即使政府的一切赋税和一切捐税都取消，生产者还永远会像现在一样地贫穷、无知，劳动过重……只有彻底改变制度，只有实施劳动和交换的平等才能改善这种情况并保证人们有真正的权利平等……生产者只要努力（也只有他们努力才能自救），就能永远打破束缚他们的锁链……政治平等作为目的是错误的，作为手段也同样是错误的 (As an end, the political equality is there a failure, as a

means, also, it is there a failure)。

“在平等的交换下，一个人的利益就不会是另一个人的损失，因为那时候每一次交换只不过是劳动和财富的轉移，不需要任何牺牲。因此，虽然在以平等交换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下生产者仍然可以靠节约致富，但是他們的财富只是他們自己劳动的积累。那时他也可以把自己的财富和别人交换，或者送给别人，但是只要停止劳动，他就不能长时期继续保持富裕。随着平等交换的建立，财富就会失去它现在所具有的那种自行更新和再生产的能力；它再也不能弥补消费带来的损失，因为已消耗的财富只有用劳动再生产出来，否则它就永远消失了。我们现在所谓的利润和利息，在平等交换制度下是不可能再存在的。那时无论生产者或分配者将会得到相等的报酬，每种生产出来并供应给消费者的产品的价值，将由他们花费在产品上的劳动总额来确定……”

“因而，平等交换的原则，按其本性来说，必然会引起普遍劳动。”(同上，第 67、88、89、94、109—110 页)

駁斥了经济学家們反对共产主义的議論以后，布雷先生继续說：

“如果要順利实现以财产公有为基础的最完善的社会制度，就必须改变人的性格；如果现在的制度没有条件和可能来改变这种性格，使人们达到合乎我們理想的更好的状态，那末显而易见，情况就必然会保持原状。否则，就必须发现和实行一种过渡的社会阶段——即部分属于现在的制度、部分属于将来的制度(以财产公有为基础的制度)^①的过程——或者某种中间阶段，社会进入这个阶段时将带着自身的各种弊病和愚蠢，以后出来时却带着财产公有制度中不可缺少的各种品质和特点。”(同上，第 134 页)

“整个这一进程只要求最简单的合作形式…… 生产费用在任何情况下都确定产品的价值，相等的价值总是和相等的价值进行交换。如果说有两个人，其中一个人工作一个星期，而另外一个人只工作半个星期，那末前者所得的报酬就会比后者所得的多一倍；但是前者多得的报酬并不损害后者的利益，后者的损失决不会对前者有利。每个人都以自己所得的工資来交换同样

① 括弧里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价值的物品；在任何情况下，无论哪一个人或者哪一个生产部门所得的利益，都不会是另一个人或者另一个生产部门的损失。每一个人的劳动才是他的利益或损失的唯一标准……

“……消费所需要的各种不同产品的数量，每个物品和其他物品（各种不同劳动部门所需要的工人数目）所比较的相对价值，总之，凡和社会的生产和分配有关的一切事务，都由中央和地方贸易局（boards of trade）来确定。这种核算在整个民族中实行，就像在现存制度下在私人公司中实行一样，并不费什么时间，而且是轻而易举的……个人构成家族，家族构成乡镇，就像在现存制度下一样……城乡居民的分布不管有怎样的弊病，也不会马上取消……在这个联合体中，每个人继续享有任意积蓄和按照自己的愿望去使用这种储金的自由……我们的社会可说是由无数最小的股份公司（在这些最小的股份公司中，大家劳动、大家生产并且在最平等的基础上交换自己的产品）所构成的一个大股份公司……我们这种股份公司的新制度是为了过渡到共产主义而对现代社会的一种让步，它允许产品的个人所有制和生产力的公有制同时存在；这种新制度使每个人的命运取决于他本身的活动，并使人人均享自然和技术的成就所提供的一切利益。因此，这种制度可以适用于现在的社会，还可以准备它今后的变化。”（同上，第 158、160、162、168、194、199 页）

我们现在只要用几句话来回答布雷先生。他出乎我们的意料甚至违背了我们的意志，取蒲鲁东先生而代之；所不同的是，布雷先生没有以给人类下最后断语的主宰自命，他认为自己提出的办法只适合于现代社会和以财产公有为基础的制度之间的过渡阶段。

某甲的一个工时交换某乙的一个工时。这就是布雷先生的基本定理。

假定某甲工作十二小时，而某乙只工作六小时；在这种情况下，某甲只要用六小时就能交换某乙的六小时，这样某甲的其余六小时就会剩下来。他怎样处理这六小时的劳动时间呢？

或者根本不做处理，这样他就白白劳动六小时，或者在其他的

六小时不干活，以便取得均衡，再不然，最后的一着就是他把这自己用不着的六小时也一起卖给某乙。

这样某甲到底比某乙多得了什么呢？是劳动时间吗？不是的。他只过多得了空闲的时间，他只得在六小时中间无所事事。为了使这种无所事事的新权利不仅在新社会中得到承认，而且受到重视，这个新社会就必须把懒惰当作最大的幸福，将劳动看成必须全力摆脱的沉重负担。再回到上述的例子来看，某甲比某乙多得的空闲时间，对某甲来说该是一种真正的收获吧！并不是这样。最初只工作六小时的某乙经过经常的和有规律的劳动以后，便达到某甲在开始时用过度的劳动所得的结果。每个人都想做某乙，于是就会发生为争夺某乙的地位而展开竞争，即展开懒惰的竞争。

那末相等劳动量的交换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生产过剩、价格低落和过度劳动（接着是无事可做），总而言之，现代社会中所有的一切经济关系，只是没有劳动的竞争。

但是不然，我们错了。要拯救新社会，即某甲和某乙的社会，只有一个方法。某甲可以自己消费掉他所剩下的六小时劳动的产品。但是一旦他不需交换他的产品，那末他就不需为交换而生产了，我们原先所说的社会是建立在分工和交换之上的这个前提，也就完全垮台了。只有停止一切交换才能拯救平等交换，那时某甲和某乙就都会变成鲁滨逊。

因此，假定社会的全体成员都是直接劳动者，那末要进行劳动时间的等量交换，只有事先对花费在物质生产上的时间数量取得协议。但是这种协议是对个人交换的否定。

如果不以产品的分配而以生产行为本身作为出发点，我们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在大工业中，某甲不能任意确定自己劳动的时间，因为某甲的劳动，如果没有组成企业的一切其他的某甲和某乙的合作，那就没有什么作用。这非常清楚地说明英国的厂主为

什么頑固地反对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他們都很知道，减少女工和童工两小时的劳动時間¹⁵ 必然也会引起成年工人的劳动時間的縮短。大工业的性质就要求一切人的劳动時間都完全一样。今天是資本以及工人們之間相互竞争的结果的东西，如果一旦取消劳动和資本的关系，明天就会成为以生产力总额对現存的需要总额的关系为基础的一个实在的协定。

但是这样的协定就是个人交换的死刑；因此我們又回到原来的結論上了。

在原則上，沒有产品的交换，只有参加生产的各种劳动的交换。产品的交换方式取决于生产力的交换方式。总的說来，产品的交换形式是和生产的形式相适应的。生产形式一有变化，交换形式也就随之变化。因此在社会的历史中，我們就看到产品交换方式常常是由它的生产方式来調节。个人交换也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而这种生产方式又是和阶级对抗相适应的。因此，沒有阶级对抗就不会有个人交换。

但是可敬的资产者的良心却不承认这个明显的事实。只要是资产者，他就不能不把这种对抗关系当作不允許任何人損人利己的、以和諧与永恒的公平为基础的关系。在资产者的心目中，沒有阶级对抗个人交换也可以存在；他們认为两者之間是毫无关系的。资产者想像中的个人交换和实际中存在的个人交换是大不相同的。

布雷先生把可敬的资产者的幻想变成了他想实现的理想。他刷新个人交换，清除个人交换中的一切对抗因素，他以为这样就找到了他希望社会采用的“平均主义的”关系。

布雷先生沒有看到，这个平均主义的关系，即他想应用到世界上去的这个具有糾正作用理想本身，只不过是现实世界的反映；因此，要想在不过是这个社会美化了的影子的基础上来改造社

会是绝对不可能的。随着这个影子重新成为具体的东西，我們就可以看到，这决不是梦想中的一个变了形的社会，而是现代社会的实体①。

第三节 价值比例规律的应用

甲、货币

“金银是价值已经达到构成的第一种商品。”

所以金银成了由蒲鲁东先生……“构成的价值”的最初应用。蒲鲁东先生是用产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比较量确定价值的方法来构成产品的价值，因此，他只要证明金银价值的变动总是由于生产金银所必要的劳动时间的变动就可以了。可是蒲鲁东先生却没有想到这一点。他在谈及金银的时候，是把它们当作货币而不是当作商品。

如果还有逻辑的话，那末他的全部逻辑就是：他以变戏法的手法把金银做为货币的特性运用于由劳动时间衡量价值的一切商品。当然，在这套戏法中，幼稚多于狡猾。

任何有用的产品的价值既然由生产它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来衡量，那末这种产品就永远具有交换性能。蒲鲁东先生大声叫道，在

① 和任何其他理论一样，布雷先生的这个理论也得到了一些受它假象蒙蔽的拥护者。在伦敦、设菲尔德、里昂以及英国其他的许多城市中都曾设立过劳动产品公平交换所(equitable-labour-exchange-bazars)。这些交换所吸收了大批资本以后都遭到可耻的破产。这批拥护者对它们也就永远失去了兴趣。蒲鲁东先生可要注意这个警告！（马克思原注）

大家知道，蒲鲁东并没有接受这个警告。1849年他在巴黎也企图开办一个新的交换银行。但是这个银行还没有开始正常活动就垮台了。对蒲鲁东的审讯掩饰了这个银行的垮台。——弗·恩·（恩格斯在1885年德文版上补加的注）

“交換可能性”上已达到我所要求的条件的金銀就是证据。所以，金銀就是达到构成状态的价值，即蒲魯东先生思想的体现。他在选择例子上沒有比这更幸运的了。金銀除了像其他商品一样是由劳动时间来衡量价值的商品以外，还具有普遍交換手段，即货币的特性。因此，如果把金銀当做由劳动时间所“构成的价值”的应用，那末要证明由劳动时间构成价值的一切商品都将具有不断交換性能，都将成为货币，是再容易也沒有了。

蒲魯东先生脑子里产生了一个非常簡單的問題：为什么只有金銀才能成为“构成价值”的典型？

“习惯赋予貴金屬作为交換手段的特殊职能是純粹契約的职能。任何別的商品，虽然可能有些不便，也都能同样可靠地实现这个作用；經濟学家們都承认这一点，并且举出了不少例子。貴金屬被公认作为货币使用，究竟是什么原因？而货币的这种特殊职能（政治經濟学中並沒有类似情况）又該怎样解釋呢？…… 货币似乎已經从一种系列中脱离出来，要重建这种系列并把货币重新引到它的真正的原理上去，这是否不可能呢？”

蒲魯东先生这样提出問題，那就已經預先假定了货币的存在。蒲魯东先生應該首先自問一下：为什么在目前已形成的这种交換中，必須創造一种特殊的交換手段来使交換价值个别化呢？货币不是东西，而是一种社会关系。为什么货币所表現的关系也像任何其他經濟关系如分工等一样，是一种生产关系呢？如果蒲魯东先生对这种关系有个明确的概念，那他就不至于把货币当做例外，当做人尚不知或需要确定的系列中分离出来的一个要素。

相反地，他会认为这个关系只是其他經濟关系的整个鎖鏈中的一个环节，因此两者非常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他会承认，这种关系正如个人交換一样，是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但是他究竟怎么办呢？他首先把货币从現在的生产方式的总体中分离出来，然后使它成为想像中的系列，即尚待发现的系列的第一个

要素。

既已承认特殊的交换手段的必要性，即货币的必要性，剩下的就只是说明为什么这个特殊的职能属于金银，而不属于任何其他商品。这是一个次要问题，这个问题不应当用生产关系的总体体系来解释，而应当用金银作为一种物质所固有的特性来解释。由此可见，如果经济学家们在这种情况下，像蒲鲁东先生所斥责他们那样，“超出自己所学的领域，去研究物理学、力学和历史等”，那末他们只是做了必须做的事情。问题已经不在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之内了。

蒲鲁东先生说：“所有经济学家都没有看到、没有理解到使贵金属享有特权的那种经济原因。”

谁也没有（不是没有根据的）看到和理解到的经济原因，蒲鲁东先生却看到了，理解了，而且传给了后代。

“没有人注意到，金银在一切商品中是价值已经达到构成的第一种商品。在宗法时期，金银作为交易对象出现，而且还一锭锭地互相交换，然而当时它们已经具有占统治地位的明显趋向并且比其他商品占显著的优势。君主们逐渐地占有了贵金属，并且在上面打了自己的印章；经过君主的神圣化以后就产生了货币，即 *par excellence* [最道地的] 商品，不论交易中有什么动荡，这种商品都能保持一定的比值并在各种支付中被人接受……再說一遍，金银的特点就是由于它们有金属的本性，开采困难，尤其是由于国家的干预，它们作为商品早就获得了稳固性和确实性。”

金银在一切商品中是价值已经达到构成的第一种商品，从他上述的话里所得出的结论，就是说，金银最早成为货币。这就是蒲鲁东先生伟大的启发，这就是在他以前没有人发现过的真理。

如果蒲鲁东先生想用这些话说明，人们对开采金银所必要的时间比生产其他商品所必要的时间知道得更早，那末这又是他慷慨地奉送给读者的假定之一。如果我们想遵循这种宗法时期的学

問，那我們就要奉告蒲魯東先生，生產日用必需品（例如鐵等）所必要的時間是知道得最早的。至於亞當·斯密的古弓那就更不必說了。

既然任何一種價值都不是單獨構成的，蒲魯東先生怎麼還能說價值的構成呢？價值不是由單獨生產某種產品所必要的時間構成，而是與同一時間內所能生產的一切其他產品的數量成比例。因此金銀價值的構成是以許多其他產品的價值已經構成為前提的。

可見，並不是商品在金銀這種形式中達到“構成價值”的狀態，相反地，而是蒲魯東先生的“構成價值”在金銀這種形式中達到貨幣的狀態。

根據蒲魯東先生的意見，由於某些經濟原因，金銀經過構成價值的狀態，比一切其他產品就更具有成為貨幣的優越性。現在我們就來進一步考察這些經濟原因。

這些經濟原因是：“力求占居統治地位的明顯趨向”、“在宗法時期”已經取得的“顯著的優勢”以及同一事實的其他的轉彎抹角說法；這種轉彎抹角的說法只能增加我們的困難，因為蒲魯東先生在解釋一個事實時添加了許多枝節，從而使需要說明的事實越來越多了。但是蒲魯東先生還沒有講完他的所謂經濟原因。下面就是那種至高無上和不可抗拒的力量的一個原因：

“經過君主的神聖化以後就產生了貨幣；君主們占有金銀，並且在上面打了自己的印章。”

因此，在蒲魯東先生看來，君主的專橫就是政治經濟學中的最高原因！

其實，只有毫無歷史知識的人才不知道：君主們在任何時候都不得不服從經濟條件，並且從來不能向經濟條件發號施令。無論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記載經濟關係的要求

而已。

究竟是君主占有了金銀，蓋上自己的印章使它們成为普遍的交換手段呢，还是普遍的交換手段占有了君主，让他蓋上印章并授与政治上的神圣？

人們过去和現在給銀币盖上的印記，并不表明它的价值，而是表明它的重量。蒲魯东先生所說的稳固性和确实性只和錢币的成色有关；这种成色表明一块銀币中含有多少純金屬。

伏尔泰用他那总是健全的理智說：“一个銀馬克所含的唯一价值是一馬克的銀子，半磅銀子重量为八盎斯。只有重量和成色构成这种內在的价值。”（伏尔泰：“約翰·罗的制度”¹⁶）

但是，一盎斯金子或者銀子值多少呢？这个問題还是没有解决。就算“大柯尔培尔”商店的克什米尔呢上印着“純毛”的商标，但是这种商标根本没有說明克什米尔呢的价值。而毛呢究竟值多少，这始終还是一个問題。

蒲魯东先生說：“法国皇帝菲力浦一世在查理大帝时代的土尔銀币中掺进了三分之一的杂质。他以为他既占有鑄造錢币的壟断权，也就能够像一切壟断产品的商人处理自己商品那样地处理錢币。菲力浦和他的继承人被人責难伪造錢币实际上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是一种从商业慣例的观点來說非常正当、但从經濟学的观点來說却十分荒謬的想法。这种想法认为，既然供求調节价值，那末人为地使物品稀少或完全掌握它們的生产，就可以提高物品的估价及价值，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金銀，正如它适用于粮食、酒、食油、烟草一样。然而菲力浦的欺詐只要一引起怀疑，他的錢币就会跌到真正价值上去，从而他也就失去了他指望从臣民那里贏得的一切。所有类似的企图也都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首先，事实已經无数次地证明，如果君主要想伪造錢币，那末他就会遭到損失。他在最初发行中虽一度得到利益，但以后每当伪造的錢币以捐稅等形式重新回到他那里去的时候，他又要将这

些利益失掉。但是菲力浦和他的继承人多多少少防止了这种损失，因为他们把伪造的錢币一投入流通，馬上就下令照原有成色普遍改鑄錢币。

其次，如果菲力浦一世真像蒲魯东先生那样推論，那末他的推論“从商业观点來說”就决不是完美无缺的。如果菲力浦一世或者蒲魯东先生只是根据商品的价值取决于供求关系这一点，便以为金子的价值完全像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是可以改变的，那末这只表明他們的商业才能很差。

如果菲力浦皇帝命令把一繆伊粮食叫做二繆伊粮食，那他就成了騙子。他就是欺騙了一切收租的人，一切收一百繆伊粮食的人；由于他的好意，这些人本来可以收一百繆伊粮食，現在只能收五十繆伊了。假定皇帝欠人一百繆伊粮食，那他現在只要还五十繆伊就行了。但是在貿易中，一百繆伊粮食一点也不会比从前五十繆伊有更多的价值。名称是改变了，事物却并没有变化。无论是供应的或是需求的粮食的数量，都不会仅仅由于名称的改变而有所增减。因此，尽管名称改变，只要供求关系不变，那末粮食的价格也不会有任何实际的变化。人們在談到供求的时候，指的是物品的供求，而不是物品的名称。菲力浦一世并不像蒲魯东所說的那样創造了金銀，他只是創造了錢币的名称。你把法国的克什米尔呢充作亚洲的克什米尔呢也許会欺騙一两个购买者，但是一旦騙术被拆穿，那末你的所謂亚洲的克什米尔呢的价格就会回跌到法国克什米尔呢的价格。菲力浦一世在金銀上盖印了假标记，这种伎俩只能在未被揭穿前騙一騙人。像别的老板一样，用冒牌商品欺騙顾客只能蒙混一时。他迟早一定会感到貿易規律的严峻。蒲魯东先生想证明的是这一点嗎？不，不是这一点。在他看来，使貨币获得价值的不是貿易，而是君主。实际上他证明了什么呢？他证明貿易比君主更有权力。即使君主下命令使一馬克今后

成为两馬克，但是貿易却总是告訴你：这两个新的馬克只值从前一个馬克。

但是这并没有把价值取决于劳动量这个问题进一步推进。重新变成从前那一个馬克的这两个馬克的价值，究竟是由生产費用来确定还是由供求規律来确定？这个问题仍然有待解决。

蒲魯东先生接着說：

“甚至也应当注意，如果君主不伪造錢币，但有权把錢币的数量增加一倍，那末金銀的交换价值由于比例性和均衡的原因，立刻会跌价一半。”

如果蒲魯东先生和其他經濟学家們的这个共同观点是正确的話，那末这也只是有利于他們的供求学說，对蒲魯东先生的比例性却完全无补。因为根据这个观点，無論在双倍的金銀中包含的劳动量如何，只要需求不变而供应增加一倍，那末金銀的价值就会跌价一半。也許“比例規律”这一次是偶然和很受輕視的供求規律一致起来了吧？蒲魯东先生的这个正确的比例性的确伸縮性很大，随时都可以变化、配合和移項，下一次很可能又和供求关系一致起来。

“任何商品，即使不是在事实上，至少在法律上具有交换能力”，金銀所起的作用便是根据，其实这是不了解金銀的作用。金銀之所以在法律上具有交换能力，只是由于它們具有事实上的交换能力，而它們之所以具有事实上的交换能力，那是因为当前的生产組織需要普遍的交换手段。法律只是事实的公认。

我們知道，蒲魯东先生选择貨幣作为达到构成状态的价值的应用的例子，只是为了偷运他那一套关于交换可能性的理論，即为了证明每个按生产費用来估价的商品都必须成为貨幣。如果不是下面一个小小的缺陷，这一切都是很好的。这个缺陷是：在一切商品中，只有作为貨幣的金銀不是由生产費用来确定的商品；这一点是确实無疑的，因为金銀在流通中可以用紙币来代替。只要

流通的需要和发行货币(无论纸币、金币、白金币或铜币)的数量之間保持着一定的比例,那就不可能产生保持货币的内在价值(由生产費用所确定)和名义价值之間的比例問題。当然,在国际貿易中,货币像一切其他商品一样是由劳动時間来确定的。这是由于在国际貿易中,甚至金銀也只是以产品的身份作为交換手段,而不是以货币的身份作为交換手段;这就是說,金銀失去了蒲魯东先生认为构成金銀特性的“稳固性和确实性”,即“經過君主的神圣化”的特点。李嘉图非常理解这个真理,他把价值取决于劳动時間作为他的整个体系的基础,并且指出:“金銀像一切其他商品一样,它們所具有的价值,只是与生产它們并把它們投入市場所必要的劳动量相适应”,但是他又补充說,确定货币价值的不是实物所包含的劳动時間,而只是供求規律。

“虽然紙币沒有任何内在的价值,但是如果数量有限,那末紙币的交換价值就会和票面金額相同的硬币的价值或这种錢币所包含的金屬的价值一样大。由于这一原則,即由于货币数量有限,那末磨損了的錢币如果它以前含有法定的重量和成色,就可以按照它应有的价值流通,而不是按照它实际所含有的純金屬的份量的价值流通。因此,在不列顛的货币史中我們常常看到,硬币从沒有随它們的质地下降程度而贬值。这是因为硬币从来不随其内在价值的减少而增加数量。”(李嘉图,“政治經济学……原理”)

让·巴·薩伊对李嘉图这些話的看法如下:

“我觉得,这个例子应当足以使作者相信:一切价值的基础都不是生产某种商品所必要的劳动量,而是和該商品的稀少相对比的那种对商品的需要。”¹⁷

在李嘉图的心目中,货币已經不是由劳动時間来确定的一种价值,而让·巴·薩伊正根据这一点把货币作为例子,想使李嘉图相信其他的价值也不能由劳动時間来确定。我說,这些被让·巴·薩伊当作价值完全由供求确定的例子的货币,在蒲魯东先生看来,

就成了由劳动时间来构成……价值的 par excellence [最好的] 实例。

总而言之，如果货币不是由劳动时间所“构成的价值”，那末它就更不能和蒲鲁东先生的正确的“比例性”有什么共同之处。金银之所以永远能够交换，是由于它们具有作为普遍交换手段的特殊职能，而决不是由于它们在数量上和财富总额成比例；或者更明确地说，金银之所以经常保持均衡，是由于在一切商品中只有它们作为货币，作为普遍的交换手段，不管它们的数量和财富总额的比例关系如何。

“流通中的货币决不会多得无用；因为如果减少货币的价值，那就是在以同样的比例增加货币的数量，而如果增加它的价值，那也就是在减少它的数量。”（李嘉图）

蒲鲁东先生大声叫道：“这种政治经济学真是一团糟。”

“一个共产主义者（通过蒲鲁东先生的嘴）^① 可笑地叫道：可恶的金子！同样也可以说：可恶的小麦！可恶的葡萄！可恶的绵羊！因为一切商业价值都和金银一样，必须得出它的精确而严格的确定。”

使绵羊和葡萄具有货币的特性，这种思想并不新奇。在法国，在路易十四那个世纪就有这种思想。在这个货币开始成为万能的时期，人们抱怨其他一切商品的跌价，热烈地期待有一天“一切商业价值”都可以得到精确而严格的确定，成为货币。在法国最老的经济学家之一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中，我们就已经发现有这样的话：

“那时，由于恢复了公正价值的商品作为无数竞争者出现，货币就会被引到它的自然界限。”（“18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德尔编，第422页）

可见，资产阶级最初的幻想也正是他们最后的幻想。

^①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乙、劳动的剩余

“在政治經濟学的著作中，可以看到这样荒謬的假設：如果一切物品的价格增加一倍…… 好像一切物品的价格并不是物品間的比例，好像人可以使比例、比率或者規律增加一倍！”（蒲魯东，第一卷第 81 頁）

經濟学家們之所以陷入这种謬誤，是由于他們不会应用“比例規律”和“构成价值”。

不幸得很，在蒲魯东先生自己的著作（第一卷第 110 頁）中也能看到这种荒謬的假設：“如果工資普遍提高，一切物品的价格就会上升。”不仅如此，在政治經濟学的著作中我們既可以看到这样的话，同时还可以找到它的說明。

“当說到一切物品价格的漲跌的时候，通常总是把某种商品除外的，这种商品通常是貨币或劳动。”（“京都百科全书，或知識大辞典” 1836 年倫敦版第六卷中西尼耳所著“政治經濟学”条 18。关于这种說法，也可參閱：約·斯·穆勒“略論政治經濟学的某些有待解決的問題” 1844 年倫敦版，以及图克“价格史……” 1838 年倫敦版 19）

現在我們来談談“构成价值”和其他比例性（它們唯一的缺点是缺少比例）的第二种应用，并且来看看蒲魯东先生在这里的做法是不是比企图把綿羊說成貨币更幸福些。

“任何劳动必然留下某些剩余，这个定理是經濟学家們公认的。这个原理对我來說是普遍的和絕对的真理，这是可以当做全部經濟科学总结的比例規律的必然結果。但是請經濟学家們原諒，任何劳动必然留下某些剩余的原理，在他們的理論中是毫无意义的，而且也不会得到任何证明。”（蒲魯东）

为了证明任何劳动必然留下某些剩余，蒲魯东先生把社会人格化，他使社会变成作为人的社会，这种社会决不是由人所組成的社会，因为它有自己的特殊規律，这些規律与組成社会的人毫无关系，有“自己的理性”，这种理性不是普通的人的理性，而是丧失理

智的理性。蒲魯东先生責备經濟学家們不了解这种集合体的个性。美国有一位經濟学家从完全相反的角度来責备别的經濟学家,我們认为有必要引用他的一段話来和蒲魯东先生的話作对照:

“人們給被称为社会的精神实体 (the moral entity)——即文法的存在 (the grammatical being), 硬加上一些实际上只存在于那些无中生有的人們的想像中的屬性…… 这就在政治經濟学中引起許多困难和可悲的誤解。”(托·庫伯“論政治經濟学的要素”1826年哥倫比亞版20)

蒲魯东先生繼續說道:

“劳动剩余这一原理对于个人之所以正确, 只是由于这一原理产生于社会, 社会因此以自己的規律加惠于个人。”

蒲魯东先生是否只是想說明, 社会里的个人的生产可以超过孤独的个人的生产? 他是否指联合起来的个人的生产剩余多于沒有联合的个人的生产剩余? 如果是的話, 我們可以給他指出几百个沒有求助于蒲魯东先生的那种神秘主义但却表明了这种簡單真理的經濟学家。例如薩德勒先生就說过这样的話:

“联合劳动产生出个人劳动决不能达到的結果。因此, 随着人类在数目上的增加, 人类联合劳动的产品将远远超过人口数量增长简单加算所得出的总额…… 今天, 無論在机械技术中或科学工作中, 一个人一天所做的事情比孤独的个人一生所做的还要多。全体等于各部分之和这一数学定理, 如果应用到我們所考察的对象上来就会錯誤。至于劳动即人类生存的偉大支柱 (the great pillar of human existence), 那末可以說, 共同努力的产品要远远超过个人的和分散的努力所能生产的一切。”(托·薩德勒“人口的規律”1830年倫敦版21)

我們再回来談談蒲魯东先生。他說, 劳动剩余在作为人的社会得到了說明。这种人的生活所服从的規律, 是和确定作为个人的人的活动的規律相对立的; 蒲魯东先生想用“事实”来证明这一点。

“經濟方面的新發現決不會給發明者帶來和他貢獻給社會相等的利益……大家知道，鐵路企業為企業主提供的財富遠不如為國家提供的多……馬力車運輸的運費（包括裝卸費用在內）平均每噸公里為 18 生丁。有人算過，照這種比率，普通的鐵路企業就得不到 10% 的純利，這和馬力車運輸企業的結果差不多一樣。但是假定鐵路運輸的速度和馬力車運輸的速度是 4 比 1；由於對社會來說時間就是價值，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運費一樣，鐵路運輸所提供的利益就是馬力車運輸所提供的 400%。然而這種對社會來說非常現實的巨大利益，對運輸企業主來說卻決不能按同樣的比例獲得實現，運輸企業主使社會得到 400% 的利益，而自己卻連 10% 的利益也得不到。為了把問題說得更清楚些，我們假定實際上鐵路運費提高到 25 生丁，而馬力車運輸的運費仍然是 18 生丁，這時鐵路立刻就會失去一切運貨生意。所有的發貨人和收貨人都將重新使用舊時的行李車，必要時甚至使用馬車。機車就會被棄置不用，400% 的社會利益將因 35% 的私人損失而犧牲。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為鐵路運貨迅速所帶來的利益完全是社會的，每人所得到的利益只占非常小的比例（不要忘記，目前只談運貨問題），而損失對於消費者卻是直接的具體的。假定社會只有 100 萬人，那末等於 400 的社會利益對個人來說就是萬分之四，而消費者遭受的 33% 的損失卻決定了 3300 萬的社會虧損。”（蒲魯東）

蒲魯東先生還可以用原始速度的 400% 來表明四倍的速度；但是他拿速度的百分比和利潤的百分比來比較，並且在這兩種單獨可以用百分比來計算但相互不可比的比數之間來確定比例，這就是不管百分比指的是什麼，而在百分比之間求比例。

百分比終究是百分比。10% 和 400% 是可以比較的；兩者的關係就像 10 和 400 一樣。因此蒲魯東先生就斷言，10% 的利潤只及四倍速度的四十分之一。為了裝飾門面，他又說，對社會來說，時間就是金錢（time is money）。他之所以犯這個錯誤，是因為他模糊地想起在價值和勞動時間之間存在着某種關係，就急急忙忙把勞動時間和運輸時間等同起來，就是說他把某些司爐、車務員以及乘務員（他們的勞動時間確實和運輸時間完全一致）和整個社會

混为一谈了。这样，速度一下子就变成了资本，他有充分理由说：“400%的利润将因35%的损失而牺牲。”他先以数学家的姿态确立了 this 奇特的原理，然后又从经济学家的观点来给我们解释这个原理。

“如果社会只有一百万人，那末等于400的社会利润对个人来说就只是万分之四。”就算是这样；可是问题不在于400，而在于400%；400%的利润对个人来说不多不少恰好是400%。无论资本多少，而红利总是按400%的比率来计算。蒲鲁东先生究竟要做什么？他把百分比当做资本，似乎唯恐他的混乱思想表现得不够清楚，不够“明显”，所以继续说：

“而消费者遭受的33%的损失却决定了3300万的社会亏损。”对一个消费者是33%的损失，对一百万个消费者来说仍旧是33%的损失。蒲鲁东先生既不知道社会的资本总额，又不知道当事人个人的资本额，他怎么能确切地说，损失为33%的时候，社会亏损会达到3300万？蒲鲁东先生还不满足于把**资本和百分比混为一谈**，而且更进一步，把投入企业的**资本和对资本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的数目混为一谈**。

“为了把问题说得更清楚些，假定在实际上”有一笔确定的资本。社会利润是400%，要在一百万个每人曾拿过一个法郎的参与者之间分配，那末每人可得四个法郎，而不是像蒲鲁东先生所说的0.0004法郎。同样，每个参与者遭受33%的损失，社会亏损是33万法郎，而不是3300万法郎($100:33=1\ 000\ 000:330\ 000$)。

蒲鲁东先生专心致力于他的作为人的社会的理论，忘记了用100来除，因此蒙受了33万法郎的损失。但是每人得到4法郎的利润，对于社会来说就是400万法郎的利润。因此，社会还留下367万法郎的纯利润。这种精确的计算所证明的和蒲鲁东先生企图证明的恰恰相反，就是说，社会的损益和个人的损益决不是成反

比的。

糾正这种简单的純粹算术上的錯誤以后，我們再来看看，如果我們同意蒲魯东先生以铁路为例所得出的速度和資本的关系，去掉算术上的錯誤，会得出什么結果。假定說，运输加快四倍，運費也增加四倍，那末这种运输的利潤，不会少于那种速度慢四倍而運費只有四分之一的兽力車运输的利潤。这就是說，如果兽力車运输要 18 生丁，那末铁路运输就得 72 生丁。根据“数学的严密性”，蒲魯东先生的假設的結果就会是这样，——当然这里也得去掉他在計算中的錯誤。可是他却非常突然地告訴我們說，如果铁路运输不要 72 生丁，只要 25 生丁，它立刻就会失去一切运貨生意。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得不重新用行李車甚至馬車来运输。我們唯一要忠告蒲魯东先生的，就是他在“进步的联合体的綱領”中不要忘记用 100 来除。但是很可惜！我們的忠告很难希望得到傾听，因为蒲魯东先生如此醉心于他那种适合于“进步的联合体”的“进步的”計算，他甚至大声疾呼地喊道：

“我在第二章中讲到解决价值的矛盾时已經指出，每一种有用的发现給予发明者的利益（不論他怎么做）都比給予社会的利益少得不可比拟；在证明这一点方面，我已做到**数学的严密性**！”

現在，我們回到作为人的社会这一臆想上来，这个臆想的唯一目的就是要证明如下一个简单的真理：每种新的发明都使产品的交换价值下降，使同样的劳动量生产出更多的商品。因此，社会之所以获得利益，并不是由于它获得更多的交换价值，而是它凭原来的价值获得了更多的商品。至于发明者，他的利潤在竞争的影响下不断下降到利潤的一般水平。蒲魯东先生有沒有照他所想的那样证明了这个論点呢？沒有。但是这并不妨碍他責难經濟学家們沒有证明这个論点。为了证明事实恰好相反，这里只要引用李嘉图和罗德戴尔的話就足够了。李嘉图是用劳动時間确定价值的学派

領袖；罗德戴尔則是供求确定价值的一个最热烈的拥护者。可是他們兩人都闡明了同一个論点。

“我們使生产越来越方便，因而以前生产的某些商品的价值就不断降低，虽然我們用这种方法不仅增加国民财富，而且还扩大将来的生产能力……一旦我們利用机器或自然科学知識使自然力从事以前人做的工作，这种工作的交换价值也就随着降低。如果推动一个面粉磨要用十个人的劳动，后来发现可以利用風力或水力节省下这十个人的劳动，那时磨子生产的面粉的价值就会随节省的劳动量成比例地下降；而社会将因获得这十个人的劳动生产物的价值而更为富裕，因为維持他們生活的基金絲毫不会减少。”(李嘉图)

现在再看看罗德戴尔是怎么說的：

“資本的利潤經常是这样获得的，或者由于資本代替了人类必須亲手去做的一部分劳动，或者由于資本做了超乎人力之外和人所不能为的那种劳动。如果和机器所代替的劳动价格比較起来，机器所有者通常得到的利益是微薄的，这也許会使人怀疑我們的看法是否正确。例如，一架蒸汽抽水机一天內从煤坑中抽出的水比三百个人用水桶背水还要多；而且毫无疑问，抽水机花的費用要少得多。一切其他的机器也都如此。机器代替人的双手进行劳动，而代价却非常低廉…… 假定說，有个发明家发明了一架代替四个人劳动的机器并获得专利权；由于他有这种特权，所以除了被他的机器代替的那部分工人的劳动所产生的竞争以外，他不可能有别的竞争。显而易见，在特权的有效期間，这些工人的工資就是发明家出售产品时定价的标准；这就是說，发明家为了保证产品的銷售，他的索价只要略低于机器所代替的劳动的工資就行了。可是这个特权一滿期，同样的机器就会出现，和他的机器展开竞争。那时他就必須根据共同的原則調节他的索价，要根据机器增多这一情况索价。使用資本所获的利潤……虽然它也是被代替的劳动的結果，到底并不是由这种劳动的价值来調节，而是像在所有其他情形下一样，由資本所有者之間的竞争来調节；而竞争的强弱总是由某項用途的資本的供应量和对该項資本的需求之間的关系来确定。”

总之，只要新的生产部門的利潤高于其他部門，那末資本就經常会涌向这个部門，直到利潤率跌至一般水平为止。

我們剛才已經看到，铁路的例子很难闡明作为人的社会这样一种臆想。可是蒲魯东先生却仍然勇敢地繼續发表他的議論：

“这一点一經說明，要解釋为什么每个生产者的劳动必然給生产者一种剩余，是再容易不过的。”

再接下去，就是有关远古时代的事情了。这是富有詩意的故事，目的是要使因上述数学证明的严密性而疲憊不堪的讀者得到休息。蒲魯东先生把普罗米修斯的名字給予作为人的社会，并且用以下的話来歌頌他的功績：

“最初，普罗米修斯从自然的怀抱中走出来，感到生活在一种愉快的悠閑中……。于是，普罗米修斯就开始劳动，从第一天(第二次創世的第一天)起，他的产品，即他的財富，他的幸福等于十。第二天普罗米修斯实行分工，他的产品增加到一百。从第三天起，普罗米修斯每天发明机器，发现物体的新的效用，新的自然力……。他的劳动活动步步进展，他的生产数字也就随着上升，这表明他的幸福也在增进。最后，因为对他來說消費就是生产，因此每天的消費只是消耗前一天的产品，它还为第二天留下剩余产品。”

蒲魯东先生的这个普罗米修斯真是怪物！他無論在邏輯上或政治經濟学上都是軟弱无力的。如果普罗米修斯只是教訓我們說：分工、使用机器以及利用自然力和科学的力量可以增加人的生产力，并且能比孤立的劳动提供剩余产品，那末这位新的普罗米修斯的不幸就是出世太晚。但是只要普罗米修斯一談起生产和消費，他就完全变成可笑的人物。对他來說消費就是生产；他在第二天消費的是前一天生产的东西，因此他經常有一天的儲备；这多余的一天就是他的“劳动的剩余”。但是既然今天消費昨天生产的东西，那末在沒有前一天的最初第一天，普罗米修斯为了使以后有一个工作日作为儲备就必须做两天的工作。但是在第一天，当时既沒有分工、又沒有机器，除了火以外也不知道別的自然力量，那他是怎么得到这个剩余的呢？因此，如果問題扯到“第二次創世的第

一天”上去，那就寸步难行了。这种說明現象的方法，部分是希腊的，部分是犹太的，既神秘又有寓意；它使蒲魯东先生完全有权說：

“我已用理論和事实证明一切劳动必然留下某些剩余这一原理。”

所謂事实，就是那大家知道的累进算法；所謂理論，就是那关于普罗米修斯的神話。

蒲魯东先生接着說：“但是这个像算术定理那样正确的原理，还远不是所有人都能实现的。个人每天劳动所得的产品随着集体劳动的进步而不断增加，其結果必然是劳动者获得的工資和以前一样，但生活却日益富裕。然而我們看到的却是，社会上某些阶层日益富裕，而另一些阶层則死于貧困。”

在 1770 年，大不列顛联合王国的人口是 1 500 万，其中生产人口是 300 万。当时技术成就的生产力大約相当于 1 200 万人的生产力；因此生产力的总額是 1 500 万。所以生产力和人口的比例是 1 : 1，而技术成就的生产率和手工劳动生产率的比例是 4 : 1。

在 1840 年，人口沒有超过 3 000 万，其中生产人口是 600 万，但当时技术成就的生产率已达 6 亿 5 000 万人的生产力，和总人口的比例是 21 : 1，和手工劳动生产率的比例是 108 : 1。

可見，英国社会中一个工作日的生产率在七十年間增加了 2 700 %，即 1840 年每天所生产的是 1770 年的二十七倍。根据蒲魯东先生的說法，那就应当提出这样的問題：为什么英国工人在 1840 年时并不比 1770 年时富裕二十七倍？这样提問題就是說，英国人即使沒有生产这种財富的历史条件（如私人資本的积累、現代分工、工厂、无政府状态的竞争、雇佣劳动制度，一句話，沒有建立在階級对抗上的一切东西），也能生产所有这一切財富。然而这些条件恰恰也是发展生产力和增加劳动的剩余的必要条件。因此，要获得达种生产力的发展和这种劳动剩余，就必需有階級存在，其中一些階級日益富裕，另一些則死于貧困。

但是蒲魯东先生使之复活的这个普罗米修斯究竟是什么东西呢？这就是社会，是建立在阶级对抗上的社会关系。这不是个人和个人的关系，而是工人和资本家、农民和地主的關係。抹杀这些社会关系，那就是消灭整个社会，而你的普罗米修斯也就变成一个没有手脚的怪影，就是说既没有工厂也没有分工，总之，没有最初你为了使他能获得这种劳动的剩余而给他的一切东西。

如果在理论上，像蒲魯东先生那样，只是对劳动的剩余的公式加以平均主义的解释而不必注意现代的生产条件，那末在实践中，只要把现有的一切财富平均分配给工人们也就够了，不必改变现代的生产条件。这样的分配当然不会保证每个参加者都获得极大的幸福。

可是蒲魯东先生决不是一般所设想的悲观论者。因为在他看来一切都归结为比例性，所以在现在实存的普罗米修斯中，即在现代社会中，他不能不看到他所宠爱的那个观念在开始实现。

“但是财富的日益增加（即价值的比例性）到处都是统治的规律；当经济学家们用公共福利日益增长和最贫困阶级的状况也获得改善来反对社会主义者的申诉的时候，他们在不自觉中宣布一项真理，这个真理是对他们的理论的谴责。”

实际上，所谓集体财富，公共福利究竟是什么？这是资产阶级的财富，而不是每一个别资产者的财富。经济学家们只不过证明了：在现存的生产关系中，资产阶级的财富已经增长并应继续增长。至于工人阶级，那就大有问题；他们的状况是不是因所谓的社会财富的增加得到改善还是疑问。经济学家们为了替自己的乐观主义作辩护，就拿英国的棉纺织工业工人为例，他们所看到的只是难得的商业繁荣时期工人的情况。这个繁荣时期和危机及停滞时期的“正确的比例”关系是3：10。也许经济学家们所谈的改善是指那些为了使同行的150万英国工人在十年中得到三年繁荣而不

得不卖命于东印度群島的几百万工人吧？

至于临时分享社会财富的增长，那是另一回事。这种临时分享的事实已由经济学家的理論加以說明。这一事实是这个理論的确认，而决不是像蒲魯东先生所說的那样，是对理論的“譴責”。如果有什么东西应当受到譴責的話，毫無疑問，那就是蒲魯东先生的体系，像我們所指出的，它不管财富的增长却要把工人的工資降到最低限度。只有把工人的工資降到最低限度，蒲魯东先生才能应用价值的正确比例性的原則，即劳动時間“构成的价值”的原則。正是由于竞争使工資时高时低于維持工人生活所必要的生活資料的价格，工人才有可能在某种程度內（即使微不足道）分享社会财富的增长；但正因为如此，他們也可能死于貧困。这就是在这方面沒有任何幻想的經濟学家們的全部理論。

蒲魯东先生节外生枝地长期糾纏于铁路、普罗米修斯和应当在“构成价值”的基础上重新改組新社会的問題之后，現出十分庄重的神情，他激动地以教訓人的口吻大声喊道：

“我懇求經濟学家們暫時摆脱心灵深处那些迷惑他們的成見，不要考虑他們既得的或者希望获得的职位，不要考虑他們为之献身的利益，也不要考虑他們所追求的称贊和誘惑他們虛荣心的声誉，反躬自問一下，到目前为止，以我所說明的前提和結果这一环节來說，任何劳动必然留下一些剩余这个原理會出現在他們面前嗎？”

第二章

政治經濟学的形而上学^①

第一节 方 法

現在我們已在德国中心！我們一方面談論政治經濟学；同时又談形而上学。这一次，我們也只是跟着蒲魯东先生的“矛盾”走。剛才他迫使我们讲英国話，使我們在相当程度上变成了英国人。現在場面变了。蒲魯东先生使我們回到我們亲爱的祖国，使我們不由得又变成了德国人。

如果說有一个英国人把人变成帽子，那末，有一个德国人就把帽子变成了观念。这个英国人就是李嘉图，一位銀行巨子，杰出的經濟学家；这个德国人就是黑格尔，柏林大学的一位专任哲学教授。

法国最末一个专制君主和法兰西王朝沒落的代表者路易十五有一个御医，这个人同时又是法国的第一个經濟学家。这位御医，这位經濟学家是預言法国资产階級必然要取得胜利的先知。魁奈医生使政治經濟学成为一門科学；他在自己的名著“經濟表”中概括地叙述了这門科学。除了已經有的对该表的一千零一个注解以外，我們还找到医生本人做的一个注解。这就是附有“七个重要說明”的“經濟表的分析”²²。

① 形而上学是一种反辯证法的思維和認識的方法。这里所讲的形而上学，是指脫离具体科学的哲学的一个部分，它用純思辨的方法来闡述經驗以外的各种問題，如关于存在的始源，关于世界的实质，关于上帝，关于灵魂，关于意志自由等等。——譯者注

蒲魯东先生是魁奈医生第二，他是政治經濟学的形而上学方面的魁奈。

但是在黑格尔看来，形而上学同整个哲学一样，可以概括在方法里面。所以我們必須設法弄清楚蒲魯东先生那套至少同“經濟表”一样含糊不清的方法。因此，我們做了七个比較重要的說明。如果蒲魯东博士不滿意我們的說明，那沒关系，他可以扮演修道院长勃多的角色，亲自写一篇“經濟学—形而上学方法解說”²³。

第一个說明

“这里我們論述的不是适应時間次序的历史，而是适应观念順序的历史。各經濟阶段或范畴有时候是同时出現，有时候又是顛倒的……不过，經濟理論有它自己的邏輯順序和理性中的一些系列，經濟理論的这种次序，如所預期的那样，已被我們发现了。”（蒲魯东，“貧困的哲学”第一卷第145和146頁）

蒲魯东先生把这些冒牌的黑格尔詞句扔向法国人，毫无問題是想吓唬他們一下。这样一来，我們就要同两个人打交道：首先是蒲魯东先生，其次是黑格尔。蒲魯东先生和其他經濟学家有什么不同呢？黑格尔在蒲魯东先生的政治經濟学中又起什么作用呢？

經濟学家們都把分工、信用、貨幣等資產階級生产关系說成是固定不变的、永恒的范畴。蒲魯东先生有了这些完全形成的范畴，他想給我們說明所有这些范畴、原理、規律、观念、思想的形成情况和来历。

經濟学家們向我們解釋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沒有說明这些关系本身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說，沒有說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由于蒲魯东先生把这些关系看成原理、范畴和抽象的思想，所以他只要把这些思想（它們在每一篇政治經濟学論文末尾已經按字母表排好）編一下次序就行了。經濟学家的材料是人的生动活潑的生活；蒲魯东先生的材料則是經濟学家的教

条。但是，既然我們忽略了生产关系（范畴只是它在理論上的表現）的历史发展，既然我們只希望在这些范畴中看到观念、不依賴实际关系而自生的思想，那末，我們就只得到純理性的运动中去找寻这些思想的来历了。純粹的、永恒的、无人身的理性怎样产生这些思想呢？它是怎样造成这些思想的呢？

假如在黑格尔主义方面我們具有蒲魯东先生那种大无畏精神，我們就会說，理性在自身中把自己和自身区分开来。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无人身的理性在自身之外既沒有可以安置自己的地盘，又沒有可与自己对置的客体，也沒有自己可与之結合的主体，所以它只得把自己顛来倒去；安置自己，把自己跟自己对置起来，自己跟自己結合——安置、对置、結合。用希腊語來說，这就是：正題、反題、合題。对于不懂黑格尔語言的讀者，我們將告訴他們一个神圣的公式：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这就是措詞的含意。固然这不是天书（請蒲魯东先生不要見怪），然而却是脫离了个体的純理性的語言。这里看到的不是一个用普通方式說話和思考的普通个体，而是沒有个体的純粹普通方式。

在抽象的最后阶段（因为这里談的是抽象，而不是分析），一切事物都成为邏輯范畴，这用得着奇怪嗎？如果我們抽掉构成某座房屋特性的一切，抽掉建筑这座房屋所用的材料和构成这座房屋特点的形式，結果只剩下一个一般的物体；如果把这一物体的界限也抽去，結果就只有空間了；如果再把这个空間的向度抽去，最后我們就只有同純粹的数量，即数量的邏輯范畴打交道了，这用得着奇怪嗎？用这种方法把每一个物体的一切所謂偶性（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人类的或物类的）抽去，我們就有理由說，在抽象的最后阶段，作为实体的将是一些邏輯范畴。所以形而上学者认为进行抽象就是进行分析，越远离物体就是日益接近物体和深入事物。这些形而上学者說，我們世界上的事物只不过是邏輯范畴这种底

布上的花彩；在他們自己看来，这种說法是正确的。哲学家和基督教徒不同之处正是在于：基督徒只知道邏各斯的化身，不管什么邏輯不邏輯；而哲学家那里則有无数这种化身。既然如此，那末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东西經過抽象都可以归結为邏輯范疇，因而整个现实世界都淹沒在抽象世界之中，即淹沒在邏輯范疇的世界之中，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东西，只是由于某种运动才得以存在、生活。例如，历史的运动創造了社会关系，工业的运动給我們提供了工业产品，等等。

正如我們通过抽象把一切事物变成邏輯范疇一样，我們只要抽去各种各样的运动的一切特征，就可得到抽象形态的运动，純粹形式上的运动，运动的純粹邏輯公式。既然我們把邏輯范疇看做一切事物的实体，那末也就不难設想；我們在运动的邏輯公式中已找到了一种絕對方法，它不仅說明每一个事物，而且本身就包含每个事物的运动。

关于这种絕對方法，黑格尔这样說过：

“方法是任何对象所不能抗拒的一种絕對的、唯一的、最高的、无限的力量；这是理性企图在每一个事物中发现和認識自己的意向。”（“邏輯学”第三卷24）

既然把任何一种事物都归結为邏輯范疇，任何一个运动、任何一种生产行为都归結为方法，那末，由此自然得出一个結論，产品和生产、对象和运动的任何总和都可以归結为应用的形而上学。黑格尔为宗教、法等做过的事情，蒲魯东先生也想在政治經濟学上如法泡制。

那末，这种絕對方法到底是什么呢？是运动的抽象。运动的抽象是什么呢？是抽象形态的运动。抽象形态的运动是什么呢？是运动的純粹邏輯公式或者純理性的运动。純理性的运动又是怎

么回事呢？就是它安置自己，把自己跟自己对置，自相结合，就是它把自己规定为正题、反题、合题，或者就是它自我肯定、自我否定和否定自我否定。

理性怎样进行自我肯定，或者它怎样把自己形成这种或那种特定的范畴呢？这已经是理性自己及其辩护人的事情了。

但是理性一旦把自己作为正题安置下来，这个正题、这个思想就会自相对置，分为两个互相矛盾的思想，即肯定和否定，“是”和“否”。这两个包含在反题中的对抗因素的斗争，形成辩证运动。“是”转化为“否”，“否”转化为“是”。“是”同时成为“是”和“否”，“否”同时成为“否”和“是”。对立面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互相均衡，互相中和，互相抵消。这两个彼此矛盾的思想的融合，就形成一个新的思想，即它们的合题。这个新的思想又分为两个彼此矛盾的思想，而这两个思想又融合成新的合题。这种增殖过程就构成思想群。同简单的范畴一样，思想群也遵循这个辩证运动，它也有另一个与自己矛盾的群为自己的反题。从这两个思想群中产生出新的思想群，即它们的合题。

正如从简单范畴的辩证运动中产生群一样，从群的辩证运动中产生系列，从系列的辩证运动中又产生整个体系。

把这个方法运用到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上面，就会得出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换句话说，就会把人所共知的经济范畴翻译成人们不大知道的语言，这种语言使人觉得这些范畴似乎是刚从充满纯粹理性的头脑中产生的，好像这些范畴单凭辩证运动才互相产生、互相联系、互相交织。请读者不要害怕这个形而上学以及它那一大堆范畴、群、系列和体系。尽管蒲鲁东先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想爬上矛盾体系的顶峰，可是他从来没有超越过头两级即简单的正题和反题，而且这两级他仅仅爬上过两次，其中有一次还跌了下来。

在这以前我們談的只是黑格尔的辯证法。下面我們要看到蒲魯东先生怎样把它降低到极可怜的程度。黑格尔认为，世界上过去发生的一切和現在还在发生的一切，就是他自己的思維中发生的一切。因此，历史的哲学仅仅是哲学的历史，即他自己的哲学的历史。沒有“适应時間次序的历史”，只有“观念在理性中的順序”。他以为他是在通过思想的运动建設世界；其实，他只是根据自己的絕对方法把所有人們头脑中的思想加以系統的改組和排列而已。

第二个說明

經濟范疇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論表現，即其抽象。真正的哲学家蒲魯东先生对事物的理解是顛倒的，他认为现实关系只是睡在“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怀抱里（正如这位哲学家蒲魯东先生告訴我們的）的一些原理和范疇的化身。

經濟学家蒲魯东先生非常明白，人們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范圍內制造呢絨、麻布和絲織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們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們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們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資本家为首的社会。

人們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創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疇。

所以，这些观念、范疇也同它們所表現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們是历史的暫时的产物。

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思想的产生都是不断变动的，只有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²⁵才是停滯不动的。

第三个說明

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統一的整体。蒲魯东先生把种种經濟关系看做同等数量的社会阶段，认为这些阶段一个产生一个，一个来自一个，正如反題来自正題一样；认为这些阶段在自己的邏輯順序中实现着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

这个方法的唯一短处就是：蒲魯东先生在考察其中任何一个阶段时，都不能不靠其他一些社会关系來說明，可是当时这些社会关系尚未被他用辯证运动产生出来。当蒲魯东先生后来借助純粹理性使其他阶段产生出来时，却又把它們当成初生的嬰兒，忘記它們和第一个阶段是同样年老了。

因此，要构成被他看做一切經濟发展基础的价值，就非有分工、竞争等等不可。然而当时这些关系在一定的系列中、在蒲魯东先生的理性中以及邏輯順序中根本还不存在。

誰用政治經濟学的范疇构筑某种思想体系的大厦，誰就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就是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互相连接的单个社会。其实，单凭运动、順序和時間的邏輯公式怎能向我們說明一切关系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

第四个說明

現在我們看一看蒲魯东先生把黑格尔的辯证法应用到政治經濟学上去的时候，把它变成了什么样子。

蒲魯东先生认为，任何經濟范疇都有好坏两个方面。他看范疇就像小資产者看历史偉人一样：拿破仑是一个大人物；他行了許多善，但是也作了許多恶。

蒲魯东先生认为，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益处和害处加在一起

就构成每个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

应当作的是：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

奴隶制是同其他任何经济范畴一样的一个经济范畴。因此，它也有两个方面。我们抛开奴隶制的坏的方面不谈，且来看看它的好的方面。自然，这里谈的只是直接奴隶制，即苏利南、巴西和北美南部各州的黑人奴隶制。

同机器、信用等等一样，直接奴隶制是资产阶级工业的基础。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现代工业就不可设想。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价值，殖民地产生了世界贸易，世界贸易是大工业的必备条件。可见，奴隶制是一个极重要的经济范畴。

没有奴隶制，北美这个进步最快的国家就会变成宗法制的国家。如果从世界地图上把北美划掉，结果看到的是一片无政府状态，现代贸易和现代文明十分衰落的情景。消灭奴隶制就等于从世界地图上抹掉美洲^①。

因为奴隶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所以它总是列入各民族的社会制度中。现代各民族只是在本国内把奴隶制掩饰一下，而在新大陆却赤裸裸地公开推行奴隶制。

蒲鲁东先生将用什么办法挽救奴隶制呢？他提出的任务是：保存这个经济范畴的好的方面，消除其坏的方面。

黑格尔没有需要提出任务。他只有辩证法。蒲鲁东先生从黑格尔的辩证法那里只学得了术语。而蒲鲁东先生自己的辩证运动

① 这对 1847 年说来是完全正确的。当时美国的对外贸易主要限于输入移民和工业产品，输出棉花和烟草，即南部奴隶劳动的产物。北部各州主要是为奴隶占有制各州生产谷物和肉类。直至北部开始生产供输出用的谷物和肉类，并且成为工业国，而美洲棉花的垄断又遇到印度、埃及、巴西等国的激烈竞争的时候，奴隶制才有可能废除。而且当时，奴隶制的废除曾引起南部的破产，因为南部还没有以印度和中国隐蔽的苦力奴隶制代替公开的黑人奴隶制。——弗·恩·（恩格斯在 1885 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只不过是机械地划分出好、坏两面而已。

我們暫且把蒲魯东先生当做一个范畴看待，看一看他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他的长处和短处。

如果說，与黑格尔比較，他的长处是提出任务并且保留为人类最大幸福而解决这些任务的权利，那末，他也有一个短处：当他想用辩证法引出一个新范畴时，却毫无所获。两个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誰要給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任务，就是立即使辩证运动終結。我們看到的已經不是由于矛盾本性而自我安置和自我相对置的范畴，而是在范畴的两个方面中間激动、挣扎和冲撞的蒲魯东先生。

这样，蒲魯东先生就陷入了用正当方法难以摆脱的困境，于是他用尽全力一跳，便跳到一个新范畴的領域中。这时在他那惊異的目光面前便出現了理性中的一些系列。

他抓住第一个到手的范畴，随心所欲地給它一种特性：把应该清除的范畴的缺陷消除。例如，如果相信蒲魯东先生的話，捐稅可以消除壟断的缺陷，貿易差額可以消除捐稅的缺陷，土地所有权可以消除信用的缺陷。

这样，蒲魯东先生把所有經濟范畴逐一取来，把一个范畴用作另一个范畴的消毒剂，用矛盾和矛盾的消毒剂的混合物写成两卷矛盾，并且恰当地称为“經濟矛盾的体系”。

第五个說明

“在绝对理性中，所有这些观念……是同样简单和普遍的……实际上我們只有靠我們的观念搭成的一种脚手架才能达到科学境地。但是，真理本身并不以这些辩证的图形为轉移，而且不受我們智慧的种种組合的束縛。”
(蒲魯东，第二卷第 97 頁)

这样，一个急轉弯（現在我們才知道其中奧妙）就使政治經濟

学的形而上学变成了幻想！蒲魯东先生的話从来沒有說得这样公正。当然，如果把辯证运动的全部过程归结为简单地对比善和恶，归结为提出任务来消除恶并且把一个范畴用作另一个范畴的消毒剂，那末范畴就失去自己的独立运动；观念就“不再发生作用”；它就沒有内在的生命。它既不能把自己安置为范畴，也不能把自己分解为范畴。范畴的顺序成了一种脚手架。辩证法已不是绝对理性的运动了。辩证法沒有了，代替它的至多不过是最純粹的道德而已。

当蒲魯东先生談到理性中的一些系列即范畴的邏輯顺序的时候，他肯定地說，他不是想論述适应時間次序的历史，即蒲魯东先生所认为的范畴在其中出現的历史顺序。他认为那时一切都在理性的純粹以太中进行。一切都应当通过辩证法从这种以太中产生。現在当实际应用这种辩证法的时候，理性却背叛了他。蒲魯东先生的辩证法背棄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于是蒲魯东先生只得承认，他用以說明經濟范畴的次序和这些經濟范畴在其中相互产生的次序是不相适应的。經濟的进化不再是理性本身的进化了。

那末，蒲魯东先生給了我們什么呢？是现实的历史，即蒲魯东先生所认为的范畴适应着時間次序在其中出現的那种顺序嗎？不是。是在观念本身中进行的歷史嗎？更不是。这就是說，他既沒有給我們范畴的世俗历史，也沒有給我們范畴的神圣历史！那末，到底他給了我們什么历史呢？是他本身矛盾的历史。讓我們来看看这些矛盾怎样行进以及它們怎样拖着蒲魯东先生吧。

在未研究这一点（这是第六个重要說明的引子）之前，我們应当再作一个比較次要的說明。

我們暫且和蒲魯东先生一同假定：现实的历史，适应時間次序的历史是观念、范畴和原理在其中出現的那种历史顺序。

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現的世紀。例如，与权威原理相适应的是

11 世紀，與個人主義原理相適應的是 18 世紀。推其因果，我們應當說，不是原理屬於世紀，而是世紀屬於原理。換句話說，不是歷史創造原理，而是原理創造歷史。但是，如果為了顧全原理和歷史我們再進一步自問一下，為什麼該原理出現在 11 世紀或者 18 世紀，而不出現在其他某一世紀，我們就必然要仔細研究一下：11 世紀的人們是怎樣的，18 世紀的人們是怎樣的，在每個世紀中，人們的需求、生產力、生產方式以及生產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樣的；最後，由這一切生存條件所產生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難道探討這一切問題不就是研究每個世紀中人們的現實的、世俗的歷史，不就是把這些人既當成劇作者又當成劇中人物嗎？但是，只要你們把人們當成他們本身歷史的劇中人物和劇作者，你們就是迂迴曲折地回到真正的出發點，因為你們拋棄了最初作為出發點的永恆的原理。

至於蒲魯東先生，他一直還在思想家所走的這條迂迴曲折的道路上緩慢行進，離開歷史的康莊大道還有一大段路程。

第六個說明

我們且沿着這條迂迴曲折的道路跟蒲魯東先生走下去。

假定被當做不變規律、永恆原理、理想範疇的經濟關係先於人們的生動活躍的生活而存在；再假定這些規律、這些原理、這些範疇自古以來就睡在“人類的無人身的理性”的懷抱里。我們已經看到，在这一切一成不變的、停滯不動的永恆下面沒有歷史可言，即使有，至多也只是觀念中的歷史，即反映在純理性的辯證運動中的歷史。蒲魯東先生談到辯證運動中的各種觀念不能自相“區分”時，把運動的一切影子和影子（它們可以造成某種類似歷史的東西）的一切運動一概抹煞。他沒有這樣做，反而把自己的無能歸罪於歷史，埋怨一切，甚至連法國話也埋怨起來。

哲学家蒲魯东先生告訴我們：“我們說什么东西出現或者什么东西产生，这种說法是不确切的，無論是在文明里还是在宇宙中，自古以来一切就存在着、活动着…… 整个社会經濟也是如此。”（蒲魯东，第二卷第 102 頁）

在蒲魯东先生的体系中起作用并且使蒲魯东先生本人也起作用的矛盾的實力竟大到这样程度，以至他本想說明历史，但却不得不否定历史；本想說明社会关系的順次出現，但却根本否定某种东西可以出現；本想說明生产及其一切阶段，但却否定某种东西可以生产出来。

这样，在蒲魯东先生看来，再沒有有什么历史，也沒有有什么观念的順序了；可是，他那本自称为“适应观念順序的历史”的大作却繼續存在。怎样才能找到一个公式（因为蒲魯东先生就是公式的人物）帮助他一跳就越过这一切矛盾呢？

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发明了一种新理性，这既不是絕对的、純粹的和純真的理性，也不是生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活跃的人們的普通的理性；这是一种十分特殊的理性，是作为人的社会的理性，是称为人类的这种主体的理性，这种理性在蒲魯东先生的笔下有时也被写为“社会天才”、“普遍理性”以及“人类理性”。然而这种名目繁多的理性都是蒲魯东先生的个人理性，它有一切好的和坏的方面，有消毒剂也有任务。

“人类理性不創造真理”，真理蘊藏在絕对的永恒的理性的深处。它只能发现真理。但是直到現在它所发现的真理是不完备的，不充足的，而且是矛盾的。經濟范疇是人类理性、社会天才所发现和揭示出来的真理，所以也是不完备的并含有矛盾的萌芽。在蒲魯东先生以前，社会天才只看見对抗因素而未发现綜合公式，虽然两者同时潛藏在絕对理性里面。既然經濟关系只是这些不充足的真理、这些不完备的范疇、这些矛盾的概念在人世間的实现，因此，它們本身就包含着矛盾，并且有好坏两个方面。

社会天才的任务是发现完备的真理、完整无缺的概念、排除二律背反的综合公式。这就再一次说明，为什么蒲鲁东先生想像中的这个社会天才不得不从一个范畴跑到另一个范畴，尽管已经有了一整套范畴，但是直到现在还不能从上帝那里，从绝对理性那里得到一个综合公式：

“首先，社会(社会天才)^①假定一个原始的事实，提出一个假设……一个真正的二律背反，它的对抗性结果在社会经济中展开就像它们作为后果可以在精神上被推论出来一样，所以工业运动在各方面随着观念的演绎分为两道洪流：一道是有益行为的洪流，一道是有害结果的洪流……为了和谐地构成这个两重性的原理和解决这个二律背反，社会就产生第二个二律背反，随后很快地又产生第三个二律背反；**社会天才**将一直这样行进，直到它用尽自己的全部矛盾(尽管未曾得到证实，但是我料想，人类固有的矛盾是有止境的)，一跳而回到它自己原来的各种论点并在**唯一的公式**中将自己的全部任务加以解决时为止。”(第一卷第 133 页)

正如以前**反题**变成**消毒剂**一样，现在**正题**将变成**假设**。但是，蒲鲁东先生这种术语上的变换现在再也不能使我们感到惊奇了。人类理性最不纯洁，因为它只具有不完备的见解，每走一步都要遇到新的待解决的任务。人类理性在绝对理性中发现的以及作为第一个正题的否定的每一个新的正题，对它说来都是一个合题，并且被它相当天真地当做一个任务的解决。这个理性就这样在不断变换的矛盾中乱窜，直至它达到了矛盾的终点，发觉这一切正题和合题不过是相互矛盾的假设时为止。在极度混乱的状态下，“人类理性、社会天才一跳而回到它自己原来的各种论点并在唯一的公式中将自己的全部任务加以解决”。这里附带说一下，这个唯一的公式是蒲鲁东先生真正的发现。这就是构成价值。

假设只是为了某种特定的目的而设立的。通过蒲鲁东先生之

①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口讲话的社会天才首先给自己提出的目的，就是消除每个经济范畴的一切坏的东西，使它只保留好的东西。他认为，好的东西，最高的幸福，真正的实际目的就是平等。为什么社会天才只要平等，而不要不平等或友爱、不要天主教或别的什么原理呢？因为“人类之所以实现这么多特殊的假设，正是由于考虑到一个最高的假设”，这个最高的假设就是平等。换句话说，因为平等是蒲鲁东先生的理想。他以为分工、信用、工厂，一句话，一切经济关系都仅仅是为了平等的利益才被发明的，但是结果它们往往对平等不利。由于历史和蒲鲁东先生的臆测步步发生矛盾，所以他得出结论说，有矛盾存在。即使是有矛盾存在，那也只存在于他的固定观念和现实运动之间。

从此以后，肯定平等的就是每个经济关系的好的方面，否定平等和肯定不平等的就是坏的方面。每一个新的范畴都是社会天才为了消除前一个假设所产生的不平等而作的假设。总之，平等是原始的意向、神秘的趋势、天命的目的，社会天才在经济矛盾的圈子里旋转时从来没有忽略过它。因此，天命是一个火车头；用它拖蒲鲁东先生的全部经济行囊前进远比用他那走了气的纯粹理性要好得多。我们这位著者在论捐税一章之后，用了整整一章来写天命。

天命，天命的目的，这是当前用以说明历史进程的一个响亮字眼。其实这个字眼不说明任何问题。它至多不过是一种修辞形式，是冗长地重述事实的若干方式之一。

大家知道，英国工业的发展提高了苏格兰地产的价值。英国工业为羊毛开辟了新的销售市场。要生产大量的羊毛，必须把耕地变成牧场。要这样做就必须集中地产。要集中地产就必须消灭世袭租佃者的小农庄，使成千上万的租佃者离开家园，让放牧几百万只羊的少数牧羊人来居住。这样，由于耕地接连不断地变成牧

場，結果蘇格蘭的地產使羊群趕走了人。如果現在你們說，羊群趕走人就是蘇格蘭土地私有制度的天命的目的，那末，你們就會得到天命的歷史。

當然，平等趨勢是我們這個世紀所特有的。但是，說以往各世紀及其完全不同的需求、生產資料等等都是為實現平等而遵照天命行事，這首先就是把我們這個世紀的人和生產資料當做過去世紀的人和生產資料看待，否認世世代代不斷改變前代所獲得的成果的歷史運動。經濟學家們很清楚，同是一件東西對甲說來是成品，對乙說來只是從事另一種生產的原料。

如果你們同蒲魯東先生一道假定：社會天才製造出，或者更确切些說隨興製造出封建主，是為了達到把耕者變為負有義務的和彼此平等的勞動者這一天命的目的，那末，你們就是把目的和人換了一下，這種做法和為了達到惡意的滿足（即羊群趕走人）而在蘇格蘭確立土地私有制的天命比較起來，毫不遜色。

可是，蒲魯東先生既然對天命表現出那樣親切的關懷，我們就介紹他看一看維爾紐夫-巴爾熱蒙的“政治經濟學歷史”²⁶，此人也是追求天命的目的。但他這個目的已經不是平等，而是天主教了。

第七個即最後一個說明

經濟學家們在論斷中採用的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們認為只有兩種制度：一種是人為的，一種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為的，資產階級制度是天然的。在這方面，經濟學家很像那些把宗教也分為兩類的神學家。一切異教都是人們臆造的，而他們自己的教則是神的啟示。經濟學家所以說現存的关系（資產階級生產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說明，這些关系正是使生產財富和發展生產力得以按照自然規律進行的那些关系。因此，這些关系是不受時間影響的自然規律。這是應當永遠支配社會的永恒規律。於是，以

前是有历史的,現在再也沒有历史了。以前所以有历史,是由于有过封建制度,由于在这些封建制度中有一种和經濟学家称为自然的、因而是永恒的資產階級社会生产关系完全不同的生产关系。

封建主义也有过自己的无产阶级,即包含着資產階級的一切萌芽的农奴等級。封建的生产也有两个对抗的因素,人們称为封建主义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可是,却沒想到結果总是坏的方面占优势。正是坏的方面引起斗争,产生形成历史的运动。假如在封建主义統治时代,經濟学家看到騎士的德行、权利和义务之間美妙的协调、城市中的宗法式的生活、乡村中家庭手工业的繁荣、各同业公会、商会和行会中所組織的工业的发展,总而言之,看到封建主义的这一切好的方面而深受感动,抱定目的要消除这幅图画上的一切阴暗面(农奴状况、特权、无政府状态),那末結果会怎样呢?引起斗争的一切因素就会灭絕,資產階級的发展在萌芽时就会被切断。經濟学家就会給自己提出把历史一笔勾銷的荒唐任务。

資產階級得势以后,也就談不到封建主义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了。資產階級把它在封建主义統治下发展起来的生产力掌握起来。一切旧的經濟形式、一切与之相适应的市民关系以及作为旧日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現的政治制度都被粉碎了。

这样,为了正确地判断封建的生产,必須把它当做以对抗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来考察。必須指出,财富怎样在这种对抗中間形成,生产力怎样和階級对抗同时发展,这些階級中一个代表着社会上坏的、否定的方面的階級怎样不断地成长,直到它求得解放的物质条件最后成熟。这难道不是說,生产方式、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那些关系并不是永恒的規律,而是同人們及其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的东西,人們生产力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他們的生产关系的变化嗎?由于最重要的是不使文明的果实(已經获得的生产

力)被剝奪,所以必須粉碎生產力在其中產生的那些傳統形式。從此以後,從前的革命階級將成為保守階級。

資產階級開始自己的歷史發展時就有一個本身是封建時期無產階級^①殘存物的無產階級存在。資產階級在其歷史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要發展它的對抗性質,起初這種性質或多或少是掩飾起來的,只是處於隱蔽狀態。隨著資產階級的發展,在它的內部發展着一個新的無產階級,即現代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展開了鬥爭,在雙方尚未感覺、注意、重視、理解、承認並公開宣告以前,這個鬥爭最初僅表現為局部的暫時的衝突,表現為一些破壞行為。另一方面,如果說現代資產階級的全體成員由於組成一個與另一個階級相對立的階級而有共同的利益,那末,由於他們互相對立,他們的利益又是对立的,對抗的。這種利益上的對立是由他們的資產階級生活的經濟條件產生的。資產階級運動在其中進行的那些生產關係的性質絕不是一致的單純的,而是兩重的,在產生財富的那些關係中也產生貧困;在發展生產力的那些關係中也發展一種產生壓迫的力量;只有在不斷消滅資產階級個別成員的財富和形成不斷壯大的無產階級的條件下,這些關係才能產生**資產者的財富**,即資產階級的財富;這一切都一天比一天明顯了。

這種對抗性質表現得越明顯,經濟學家們,這些資產階級生產的學術代表就越和他們自己的理論發生分歧,於是形成了各種學派。

宿命論的經濟學家,在理論上對他們所謂的資產階級生產的否定方面採取漠不關心的態度,正如資產者在實踐中對他們賴以取得財富的無產者的疾苦漠不關心一樣。這個宿命論學派有古典派和浪漫派兩種。古典派如亞當·斯密和李嘉圖,他們代表着一

① 在馬克思送給娜·吳亭娜的那一本上此處是“勞動階級”。——編者注

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力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残污、扩大生产力、使工商业具有新的规模的资产阶级。从他们的观点看来，参加这一斗争并专心致力于这一狂热活动的无产阶级只是经受着暂时的偶然的苦难，并且它自己也把这些苦难当做暂时的。亚当·斯密和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是当代的历史学家，他们的使命只是表明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只是将这些关系表述为范畴和规律并证明这些规律和范畴比封建社会的规律和范畴更便于进行财富的生产。在他们看来，贫困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病痛，正如自然界中新生出东西来和工业上新东西出现时的情况一样。

浪漫派属于我们这个时代，这时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处于直接对立状态，贫困像财富那样大量产生。这时，经济学家便以饱食的宿命论者的姿态出现，他们自命高尚、蔑视那些用劳动创造财富的活人机器。他们的一言一语都仿照他们的前辈，可是，前辈们的漠不关心只是出于天真，而他们的漠不关心却已成为卖弄风情了。

其次是人道学派，这个学派对现时生产关系的坏的方面倒是放在心上的。为了不受良心的责备，这个学派想尽量缓和现有的对比；他们对无产者的苦难以及资产者之间的剧烈竞争表示真诚的痛心；他们劝工人安分守己，好好工作，少生孩子；他们建议资产阶级节制一下生产热情。这个学派的全部理论建立在理论和实践、原理和结果、观念和应用、内容和形式、本质和现实、法和事实、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之间无限的区别上面。

博爱学派是完善的人道学派。他们否认对抗的必然性；他们愿意把一切人都变成资产者；他们愿意实现理论，因为这种理论与实践不同而且本身不会包含对抗。毫无疑问，在理论上把现实中每一步都要遇到的矛盾撇开不管并不困难。那样一来，这种理论就会变成理想化的现实。因此，博爱论者愿意保存那些表现资产

階級关系的范疇，而不要那种构成这些范疇的实质并且同这些范疇分不开的对抗。博爱論者以为，他們是在严肃地反对资产者的实践，其实，他們自己比任何人都更像资产者。

正如經濟学家是资产階級的学术代表一样，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无产者階級的理論家。在无产階級尚未发展到足以确立为一个階級，因而无产階級同资产階級的斗争尚未带政治性以前，在生产力在资产階級本身的怀抱里尚未发展到足以使人看到解放无产階級和建立新社会必备的物质条件以前，这些理論家不过是一些空想主义者，他們为了满足被压迫階級的需求，想出各种各样的体系并且力求探寻一种革新的科学。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以及无产階級斗争的日益明显，他們在自己头脑里找寻科学真理的做法便成为多余的了；他們只要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且有意識地把这些事情表达出来就行了。当他們还在探寻科学和只是創立体系的时候，当他們的斗争才开始的时候，他們认为貧困不过是貧困，他們看不出它能够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但是一旦看到这一面，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論，而是革命的科学了。

现在再来談談蒲魯东先生。

每一种經濟关系都有其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只有在这一点上蒲魯东先生沒有背叛自己。他认为好的方面由經濟学家来揭示，坏的方面由社会主义者来揭发。他从經濟学家那里借用了永恒經濟关系的必然性这一看法；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借用了使他們在貧困中只看到貧困的那种幻想。他对两者都表示贊成，企图拿科学权威当靠山。而科学在他的观念里已成为某种微不足道的科学公式了；他无休止地追逐公式。正因为如此，蒲魯东先生自以为他既批判了政治經濟学，也批判了共产主义；其实他远在这两者之下。說他在經濟学家之下，因为他作为一个哲学家，自以为有了神

秘的公式就用不着深入純經濟的細節；說他在社會主義者之下，因為他既缺乏勇氣，也沒有遠見，不能超出（哪怕是思辨地也好）資產者的眼界。

他希望成為一種合題，結果只不過是一種總合的錯誤。

他希望充當科學泰斗，凌駕於資產者和無產者之上，結果只是一個小資產者，經常在資本和勞動、政治經濟學和共產主義之間搖來擺去。

第二節 分工和機器

照蒲魯東先生的說法，一系列的經濟進化是由分工揭開的。

分工的好的方面 { “就實質而論，分工是實現條件上和智能上的平等的方法。”（第一卷第 93 頁）

分工的坏的方面 { “對我們說來，分工變成了貧困的源泉。”（第一卷第 94 頁）

另一種說法

“勞動按照它所特有的、構成其有效性的首要條件的規律進行劃分，結果就會否定自己的目的，毀滅自己。”（第一卷第 94 頁）

應當解決的任務 { 找尋“一種新的結合，以便消除分工的有害方面而保存其有益的作用”。（第一卷第 97 頁）

在蒲魯東先生看來，分工是一種永恆的規律，是一種單純而抽象的範疇。所以，抽象、觀念、文字等就足以使他說明各個不同歷史時代的分工。種姓、行會、工場手工業、大工業必須用一個分字來解釋。如果你們首先將“分”字的含義好好加以研究，將來你們就不必再研究每個時代中賦予分工以某種特定性質的無數影響了。

当然，把事物归结为蒲鲁东先生的范畴，那未免把它们看得太简单了。历史的进程并不像范畴那样死板绝对。德国为了建立城乡分离这第一次大分工，整整用了三个世纪。城乡关系的面貌一改变，整个社会的面貌也跟着改变。即使只拿分工的这一方面来说，情况也各不相同；这里是古代的共和国，那里则是基督教的封建制度；这里是古老的英国和它的贵族，那里则是现代的英国和它的棉纱大王 (cotton lords)。14、15 世纪中殖民地尚未出现，对欧洲说来美洲还不存在，同亚洲的交往只有通过君士坦丁堡一个地方，贸易活动以地中海为中心，那时候分工的形式和性质，与 17 世纪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已在世界各处拥有殖民地时的分工完全不同。市场的大小和它的面貌所赋予各个不同时代的分工的面貌和性质，单从一个“分”字，从观念、范畴中是很难推论出来的。

蒲鲁东先生说：“从亚当·斯密以来，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指出过分工的规律的有益方面和有害方面，但是他们常常更多地强调前者，因为这样做更适合他们的乐观主义；同时没有一个经济学家反问过自己：一个规律的有害方面是什么…… 一个始终一贯的原理怎么会产生截然相反的结果呢？无论在亚当·斯密以前或在他以后，甚至没有一个经济学家看出，这里有一个需要阐明的问题。萨伊承认，在分工中产生善的原因同样也产生恶。”

亚当·斯密比蒲鲁东先生所想像的要看得远些。他很清楚地看到：“个人之间天赋才能的差异，实际上远没有我们所设想的那么大；这些十分不同的、看来是使从事各种职业的成年人彼此有所区别的才赋，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²⁷ 搬运夫和哲学家之间的原始差别要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他们之间的鸿沟是分工掘成的。虽然这样，但蒲鲁东先生仍在另一处说：亚当·斯密甚至一点也没有想到分工还有有害的一面，而且还说，似乎让·巴·萨伊第一个承认“在分工中产生善的原因同

样也产生恶。”

但是，让我们听听勒蒙特吧；suum cuique [让人人各得其所]。

“让·巴·萨伊先生在他的一篇卓越的政治经济学论著中采纳了我在论分工的道德影响这一拙作中提出的原理，这使我感到荣幸。他没有提到我的名字，毫无疑问是由于我那本书²⁸的标题欠妥。我只能以此来解释作家的沉默。这位作家由于自己的根底深厚，因此可以否认这种小小的剽窃。”（“勒蒙特全集”1840年巴黎版第一卷第245页）

让我们给勒蒙特一个公正的评价吧：他机智地描绘了今天所实行的这种分工的有害的结果，蒲鲁东先生对这一点未能作任何补充。既然由于蒲鲁东先生的过错我们已卷入谁在先的争论，那末不妨再顺便说一下，在勒蒙特之前很久，而且在亚当·斯密以前17年，斯密的老师亚·弗格森在专门论分工的一章中就已清楚地阐述了这一点。

“甚至可以怀疑一个民族的一般能力的增长是否同技术进步成正比例。在若干门机械技艺中……没有任何智慧和情感的参与完全可以达到目的，并且正如无知是迷信之母一样，它也是工业之母。思索和想像会产生错误，但是手或脚的习惯动作既靠思索，也不靠想像。所以可以说，在工场手工业方面，其最完善之处在于不用脑力参与，因此，不费任何思索就可以把作坊看做一部由人构成的机器……一位将军可能是十分精通军事的人，而士兵的全部义务却只是完成一些手脚的动作。前者之所得可能就是后者之所失……在这所有的功能彼此分离的时期，思维的技艺本身可以自成一个独立的行业。”（亚·弗格森“市民社会史试论”1783年巴黎版²⁹）

在结束这一场文献的涉猎的同时，让我们指出一点：我们明确地否认所谓“所有的经济学家常常更多地强调分工的有益方面”。只须举出西斯蒙第就可以了。

因此，一说到分工的有益方面，蒲鲁东先生就只有把众所周知

的一般詞句多少加以夸大，重說一番。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在蒲魯東先生那里，从分工这种被看做普遍規律、范疇和观念中怎样引伸出同它有关的有害方面。这个范疇、这个規律怎么会包含一种損害蒲魯東先生的平均主义体系的不平等的分工呢？

“在这分工的庄严时刻，狂風开始襲击人类。进步并不对一切人都是平等划一的…… 它首先只及于少数的特权者…… 这是进步对一部分人的偏私，它使人长期相信在地位上有自然的和天意的不平等，并且它产生了种姓，建立了一切社会的等級制度。”（蒲魯東，第一卷第 94 頁）

分工产生了种姓。种姓就是分工的有害方面；因此，有害方面是由分工产生的。Quod erat demonstrandum [这正是需要证明的]。如果我們想进一步問問，什么使得分工产生种姓、等級制度和特权呢？蒲魯東先生会回答我們說：是进步。但是又是什么引起进步呢？界限。界限，这就是蒲魯東先生所謂的进步对一部分人的偏私。

哲学之后接着就是历史。这已不是叙述的历史，也不是辯证的历史，而是比較的历史。蒲魯東先生将現代的和中世紀的印刷工人，将克列索工厂的工人和乡村的铁匠，将現代的作家和中世紀的作家加以对比；他使天平的一端傾向于那些多少代表在中世紀形成或由中世紀承接下来的分工的人們。他把一个历史时代的分工和另一历史时代的分工对立起来。这就是蒲魯東先生应当证明的嗎？不是。他应当向我們表明一般分工，即作为范疇的分工的有害方面。不过，既然在后面不远我們就会看到蒲魯東先生自己正式收回了这一切假造的論据，我們又何必老是停留在他的著作的这一部分上面呢？

蒲魯東先生繼續写道：“自灵魂被損害以来，劳动被分散的第一个結果就是延长工作日，使工作日同腦力消耗的总量成反比例增长…… 但是，工作

日的长度不可能超过 16—18 小时，所以，自从脑力消耗的减少不能靠增加劳动时间来补偿时起，补偿就要靠劳动价格，于是工资就要降低…… 有一点是不容怀疑而且我们必须在这里指出的，这就是**普遍的良心**并不会把工头的劳动和小工的工作等同看待。因此，工作日的价格必然降低。这样一来，一个劳动者除了由于执行屈辱自身的职能而使灵魂受尽摧残以外，还免不了要忍受由于报酬微薄所产生的肉体上的痛苦。”

我們不打算談这种三段論法的邏輯价值，康德会把它叫做害人的謬論。

它的实质就是：

分工使工人去从事屈辱自身的职能；被损害的灵魂与这种屈辱自身的职能相适应，而工资的不断急降又与灵魂的被损害相适应。要证实降低了的工资完全与被损害的灵魂相适应，蒲魯东先生为了不受良心責备，便肯定地說，普遍良心的意志就是这样。請問，这种普遍良心包括不包括蒲魯东先生的灵魂呢？

在蒲魯东先生看来，**机器**是“分工的邏輯反題”，他为了证明自己的辯证法，便从机器变成工厂开始。

为了从分工中推論出貧困，蒲魯东先生假設了現代工厂；接着他又假設由分工产生的貧困，以便得出工厂并且可以把工厂看做这种貧困的辯证的否定。蒲魯东先生在精神上用屈辱身份的职能、在肉体上用工資微薄的办法懲罰了劳动者，使工人附屬於**工头**，并把他的劳动降低到小工劳动的水平；随后他又把罪过推卸到工厂和机器的身上，說它們通过“使劳动者从屬於他的主人”的办法屈辱他的身份，而且，为了彻底貶低劳动者，又使他“从手艺人的地位下降到小工的地位”。真是絕妙的辯证法！如果他到此为止倒也罢了。可是不然。他还需要分工的新的历史，不过这一次已不是为了从中引导出矛盾，而是为了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改造工厂。为此目的，他必須忘記他剛才关于分工所讲的一切。

劳动的組成和划分視其所拥有的工具而各有不同。手工磨所决定的分工不同于蒸汽磨所决定的分工。因此，先从一般的分工开始，以便随后从分工得出一种特殊的生产工具——机器，这简直是对历史的侮辱。

机器正像拖犁的牛一样，并不是一个經濟范疇。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現代工厂才是生产上的社会关系，才是經濟范疇。

现在且来看看蒲魯东先生卓越的想像中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

“社会上日新月異的机器的不断出現，就是分工的反題，即反公式，这是工业天才对被分散的和杀人的劳动的抗議。其实什么是机器呢？这就是把分工后彼此分开的劳动的不同部分联結起来的一种特殊方式。每一台机器都可以看做若干操作的結合…… 因此，通过机器会使劳动者复原…… 在政治經濟学中同分工相对立的机器，在人脑中則是同分析相对立的合題…… 分工只不过使劳动的不同部分彼此分开，让每一个人都从事他最合心意的专业，工厂按照每个部分对整体的关系来組合劳动者…… 它把权力原理带入劳动領域…… 但是，还不止于此，机器或工厂通过使劳动者从属于他的主人的办法屈辱他的身份，并彻底贬低他，使他从手艺人的地位下降到小工的地位…… 我們現在所处的时期即机器时期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是在分工和交換之后出現的。”

我們提醒蒲魯东先生一点。把劳动分为不同的部分，让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从事他最合心意的专业，——蒲魯东先生以为这种現象早在世界存在的初期就已开始，其实，它仅仅是在竞争居于統治地位的現代工业中才存在。

其次，蒲魯东先生为了表明分工怎样产生工厂，工厂又怎样产生雇佣劳动，他給我們拿出了一份非常“有趣的家譜”。

(1)他假設一个人，这个人“注意到，把生产分为不同的部分并让单个的工人来从事其中的每一部分”，这样就可以扩大生

产力。

(2)这个人“抓住这个思想纜索向自己說，只要把那些为了实现他给自己提出的特殊目的而选拔出来的劳动者組成一个經常性的集团，他就会得到比較持久的生产等等”。

(3)这个人向別人提出建議，要求他們領会他的思想，抓住这个思想纜索。

(4)在工业剛开始的时候，这个人和自己的同伴們，即后来变成他的工人的那些人的关系是彼此平等的。

(5)“当然，可想而知，由于主人的有利地位和雇工工人的从屬性，这种原始的平等势必迅速消失。”

这就是蒲魯东先生的**历史的叙述的方法**的又一标本。

現在讓我們用历史的和經濟的观点来考察一下，**权力原理由工厂和机器带入社会是否真是在分工之后**；当工人还从屬於他人权势之下的时候，他的权利是否已恢复；最后，机器是不是被分割的劳动的复合，是不是这种劳动的**合題**——它同劳动的分析相对立。

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和工厂的内部結構有共同的特点，这就是社会也有它的分工。如果我們以現代工厂中的分工为典型，以便随后把它运用于整个社会，那末我們就会看到，为了生产財富而組織得最完善的社会，毫無疑問只应当有一个主要的企业主按照預先制定的条規将工作分配給社会集体的各个成員。可是，实际上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当現代工厂中的分工無論巨細全由企业主的权力进行調度的时候，现代社会要进行劳动分配，除了自由竞争之外沒有别的規則、别的权力可言。

在宗法制度、种姓制度、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下，整个社会的分工都是按照一定的規則进行的。这些規則是由哪个立法者确定的嗎？不是。它們最初来自物质生产条件，过了很久以后才上升

为法律。分工的这些不同形式正是这样才成为不同的社会組織形式的基础。至于作坊内部的分工，它在上述一切社会形态中是很不发达的。

甚至下面一点也可以訂为普遍的規則：社会内部的分工愈不受权力的支配，作坊内部的分工就愈发展，愈会从屬於一人的权力。因此，在分工方面，作坊里的权力和社会上的权力是互成反比的。

現在我們要来看看，作业被截然划分，每个工人的劳动只是极其简单的操作，各种工作都由权力即資本来安排部署的工厂是一种什么东西。这种工厂是怎么产生的呢？要回答达个问题，我們应当考察一下，工場手工业究竟是怎样发展起来的。我指的是尚未变成拥有机器的現代工业，但已不是中世紀的手工业或家庭工业的那种工业。我們不想讲得太詳細，只想指出几个要点來說明，在历史科学中，专靠一些公式是办不了什么事的。

形成工場手工业的最必要的条件之一，就是由于美洲的发现和美洲貴金屬的輸入而促成的資本积累。

交換手段扩大的結果一方面是工資和地租跌价，另一方面是工业利潤增多，这一点已毫无疑义。換句話說，土地所有者階級和劳动者階級，即封建主和人民衰落了，資本家階級，資產階級則相应地上升了。

同时，繞道好望角到达东印度的航道开辟后流通中商品量的增加，殖民体系，以及海上貿易的发展等也促进了工場手工业的发展。

在工場手工业的历史上还没有获得足够重視的另一个情况，就是封建主遣散了无数的侍从，这些被遣散的下屬在未进入作坊之前都变成了流浪汉。在手工作坊建立以前，15、16世紀中流浪現象是极为普遍的。此外，作坊还找到了大量的农民这个强有力

的支柱,數百年來,由於耕地變成了牧場以及農業進步減少了耕作所需要的人手,大批農民不斷被趕出鄉村而流入城市。

市場的擴大、資本的積累、各階級的社会地位的改变、被剝奪了收入來源的大批人口的出現,這就是工場手工业形成的历史条件。把人們聚集到作坊里去的并不是蒲魯东先生所說的那種平等者之間的友好協定。工場手工业并不發生在古老的行会內部。主持現代作坊的是商人而不是從前的師傅。工場手工业和手工业之間几乎到处都進行着殘酷的斗争。

生产工具和勞動者的積累与積聚,發生在作坊內部分工發展以前。工場手工业的特点不是將勞動分解為各个部門并使有特殊技能的工人去從事很簡單的操作,而是將許多勞動者和許多種手藝集合在一起,在一所房子里面,受一个資本的支配。

手工作坊的益處并不在於真正的分工,而是在於可以進行較大規模的生产,可以減少許多雜費開支等等。16世紀末17世紀初荷蘭的工場手工业几乎还不知道分工。

勞動者集合在一个作坊是分工發展的前提。無論在16世紀或是17世紀,我們都找不出一個例子足以說明,同一手藝的彼此分開的各部門已發展到完全可以集合在一个場所,形成一個完全現成的手工作坊的地步。但是只要生產者和生產工具被集合到一個場所,行会制度下曾經有過的那種分工就必然會再度出現并在作坊內部反映出來。

如果說蒲魯东先生能看見事物的話,他是把它們顛倒過來看的。在他看來,亞當·斯密認為分工在手工作坊之前,可是實際上這種作坊却是分工存在的条件。

真正的机器只是在18世紀末才出現。把机器看做分工的反題,看做使被分散了的勞動重歸統一的合題,真是荒謬之極。

机器是勞動工具的結合,但決不是工人本身的各种操作的

組合。

“当每一种特殊的操作已被分工简化为对一种简单工具的使用时，由一个发动机开动的所有这种工具的结合就构成机器。”(拜比吉“論机器……的經濟性质”1833年巴黎版³⁰)

简单的工具，工具的积累，复合的工具；由一个发动机即人手开动复合工具，由自然力开动这些工具；机器；有一个发动机的机器体系；有自动发动机的机器体系——这就是机器发展的进程。

生产工具的积聚和分工是彼此不可分割的，正如政治领域内国家权力的集中和私人利益的差别不能分离一样。英国在土地这种农业劳动工具积聚的时候，也有农业分工，并且还使用机器耕地。而在法国，农业劳动工具既很分散，又存在着小块土地制度，一般說来，这里既沒有农业分工，也沒有机器在农业上的应用。

在蒲魯东先生看来，劳动工具的积聚就是分工的否定。而实际上我們看到的又是相反的情况。工具积聚发展了，分工也随之发展，并且 *vice versa* [反过来也一样]。正因为这样，机械方面的每一次重大发明都使分工加剧，而每一次分工的加剧也同样引起机械方面的新发明。

在英国，机器发明之后分工才有了巨大进步，这一点无須再来提醒。例如，过去的織布工人和紡紗工人多半是至今我們还可以在落后国家里看到的那些农民。机器的发明完成了工場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前結合在一个家庭里的織布工人和紡紗工人被机器分开了。由于有了机器，現在紡紗工人可以住在英国，而織布工人却住在东印度。在机器发明以前，一个国家的工业主要是用本地原料来加工。例如：英国加工的是羊毛，德国加工的是麻，法国加工的是絲和麻，东印度和列万特^①加工的則是棉花等等。由

① 地中海东岸諸国的旧称。——譯者注

于机器和蒸气的应用,分工的規模已使大工业脱离了本国基地,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場、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总之,机器对分工起着极大的影响,只要一种物品的生产中有可能用机械制造它的某一部分,生产就立即分成两个彼此独立的部門。

蒲魯东先生在机器的发明和原始应用中发现的慈善的和天命的目的还用得着說嗎?

当貿易在英国已发展到手工劳动不再能满足市場需求的时候,人們就感到需要机器。于是人們便想到应用 18 世紀时即已充分发展的机械学。

工厂一出現就表现出一些迥非慈善的行为。儿童在皮鞭下面工作;他們成了买卖的对象,有人为弄到儿童同孤儿院訂立了合同。所有关于徒工制度的法律一概廢除,因为,用蒲魯东先生的話來說,再也用不着綜合的工人了。最后,自 1825 年起,一切新发明几乎都是工人同千方百計地力求貶低工人特长的企业主进行冲突的結果。在每一次多少有一点重要性的新罢工之后,总要出現一种新机器。而工人則很少在机器的应用中看到他們的权利的恢复,或如蒲魯东先生所說,他們的复原。因此,在 18 世紀中,工人曾經长期地反抗过正在确立的自动装置的統治。

尤尔博士說道:“在阿克萊以前很久,淮亚特发明了紡紗机械(一系列沟槽罗拉)……主要的困难并不在于自动装置的发明……困难主要在于培养必要的紀律,使人們拋棄毫无次序的工作习惯,帮助他們和自动的大机器的始終如一的規律性运轉融为一体。但是要发明一个适合机器体系的需要和速度的工厂紀律法典并付诸实施,是一件非常吃力的事情,这是阿克萊的高貴成就。”

总之,机器的采用加剧了社会內部的分工,簡化了作坊內部工人的职能,扩大了資本积累,使人进一步被分割。

当蒲魯东先生願意当一个經濟学家而暂时放棄“理性中的一

定系列的发展”时，他就从亚当·斯密在工厂刚刚产生的时期所写的著作中汲取大量的学識。其实，亚当·斯密那时的分工和现代工厂里我們所见的分工之間有很大的差别。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个差别，只須从尤尔博士的“工厂哲学”中引证几段就够了。

“当亚当·斯密写他那本关于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不朽著作的时候，机器工业体系还几乎不为人所熟悉。他认为分工就是使工場手工业渐臻完善的偉大原理，那是很自然的。他以別針的生产为例，說明工人由于完成同一操作而日益熟练，因此工作得更快而且工价也更便宜。他看到，根据这个原理，在工場手工业的每一部門中，如将銅絲切成等长部分等一些操作就大为減輕，而其余如針头的成形和装置却仍較困难；由此他得出結論說，这样很自然就会让一个工人去适应其中一项操作，这个工人的工資将和他的技艺相适应。这种适应也就构成分工的本质。不过，在亚当·斯密博士时代可以当做好例子的东西，今天就只能使大家对工厂工业的实际原理产生誤解。事实上，工作的划分，或者說得更确切一些，使工作适应各人不同的才能这一点，工厂的工作中几乎不加考虑；与此相反，在每一个要求高度灵敏性和精确性的操作过程中，熟练的但是往往容易做出各种不規則动作的工人的手，就被某种專門的机械取而代之，因为机械的自动工作极有規則，只須由小孩看管就行了。

“因此，工厂制度的原理就在于机器劳动排挤手工劳动，以及操作分解为各个組成部分以代替手工业者間的分工。在手工劳动制度下，人的劳动通常是任何一件产品最宝贵的因素；而在机器劳动制度下，手工业者的技艺就日益为看管机器的简单动作所代替。

“人类天赋的弱点就是如此：工人愈是熟练，他就愈是有主見，愈是难于駕馭，因而对机械体系說来也就愈不适用，因为他的任意妄动会给机械体系的整个动作带来莫大的损失。因此，现代工厂主的最大目标，就是通过科学和資本的結合，将工人的作用降低到仅仅使用他們的注意力和灵敏性，而这两种能力，如果人們在青年时期就把它們集中在同一个对象上面，是很容易达到完善地步的。

“在实行順次劳动的制度下，要使眼和手的技艺达到可以完成一些特別困难的机械操作，必須經過多年的訓練；而在各种操作分解为由自动机器来完成的各个組成部分的制度下，这些基本組成部分的操作可以委托給一个平平常常經過短期訓練的工人；必要的时候企业主甚至还可以任意調配他，把

他从这一台机器调到另一台机器。这种变换显然是违背老规矩的，按照老规矩的分工，一个人固定做针头，另一个人固定磨针尖，这种千篇一律、枯燥无味的工作，使得工人逐渐愚钝……但在平均化原则即工厂制度下，工人的能力只是进行协调的操练”等等。“……由于他的业务只限于看管正常动作的机器，所以他可以在很短的时期内学会这种业务；而当他从这一台机器调去看管另一台机器时，他的工作内容丰富了，并且由于他要考虑自己和同伴们的劳动成果的共同配合，因而眼界也扩大了。因此，工作平均分配制度在通常的情况下不可能使工人的能力受抑制、眼界不开阔以及身体的发育受阻；把这些情况归咎于分工，倒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实际上，机器技术方面一切改进的不变目的和趋势，都是为了完全取消人类的劳动或以女工和童工的劳动代替男工的劳动，以未经训练的工人的劳动代替熟练手艺工人的劳动等办法来贬低工人劳动的价格。这种只用眼灵手快的儿童而不用经验丰富的熟练工人的趋向，证明按照工人技艺的各种不同水平而分工的刻板教条，终于为我们开通的厂主们抛弃了。”（安得鲁·尤尔“工厂哲学，或工业经济学”第一卷第一章³¹）

现代社会内部分工的特点，在于它产生了特长和专业，同时也产生职业的痴呆。

勒蒙特说：“我们十分惊异，在古代，一个人既是杰出的哲学家，同时又是诗人、演说家、历史学家、牧师、执政者和战略家。这样多方面的活动使我们吃惊。现在每一个人都在为自己筑起一道藩篱，把自己束缚在里面。我不知道这样分割之后集体的活动面是否会扩大，但是我却清楚地知道，这样一来，人是缩小了。”

工厂中分工的特点，是劳动在这里已完全丧失专业的性质。但是，当一切专门发展一旦停止，个人对普遍性的要求以及全面发展的趋势就开始显露出来。工厂消除着专业和职业的痴呆。

蒲鲁东先生连工厂的这唯一革命的一面也不懂得，竟倒退一步，建议工人不要只做别针的十二部分中的一部，而要顺次做完它的所有十二部分。据说，这样工人就可得到做别针的从头到尾的全部知识。这就是蒲鲁东先生的综合劳动。进一步退一步也构成

一种综合运动,这一点誰也不会表示異議。

总括起来說,蒲魯东先生沒有超出小资产者的理想。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除了讓我們回到中世紀的帮工或者至多中世紀的手工业者师傅的地位以外,沒有想出更好的办法。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曾經談到:人生在世,只要有一部杰作,有一次感觉到自己是人也就足够了。無論就形式或实质来說,这难道不正是中世紀的手工业行会所要求的一部杰作嗎?

第三节 竞争和壟断

- | | | |
|---------|---|--|
| 竞争的好的方面 | } | “对劳动来說,竞争和分工具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要使平等到来,必需有竞争。” |
| 竞争的坏的方面 | | “它的原理是自我否定。它的必然后果是把受它吸引的人消灭。” |
| 一般的想法 | } | “竞争的有害的结果同它带来的益处…… 必然都是由它的原理产生的。” |
| 应当解决的任务 | | “找出一个調和的原理,这一原理必須来自超乎自由本身的規律。”
另一种說法:
“因此,問題根本不在于消除竞争,消除竞争和消除自由同样是不可能的;全部問題在于为它找到一种均衡,我看就是警察。” |

蒲魯东先生一开始就维护竞争的永恒必然性,反对那些想以竞赛代替竞争的人們^①。

“无目的的竞赛”是不存在的。“每一热中的对象都必然和热情本身相适

^① 傅立叶主义者。——弗·恩·(恩格斯在1885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应：妇女是求爱者热中的对象，政权是野心家热中的对象，黄金是守财奴热中的对象，月桂冠是诗人热中的对象；同样，**利潤**也必然是工业竞赛的对象。竞赛也就是竞争本身。”

竞争就是追逐利潤的竞赛。工业竞赛一定要是追逐利潤的竞赛即竞争吗？蒲魯东先生用肯定来证明这一点。我們已經看到，蒲魯东先生认为，肯定就是证明，正如假定就是否定一样。

如果說求爱者热中的直接对象是妇女，那末，工业竞赛的直接对象就会是生产品，而不是利潤。

竞争不是工业竞赛而是商业竞赛。在我們这个时代，工业竞赛只是为了商业而存在。在現代各民族的經濟生活中，甚至还有一些时候，大家都患了一种不事生产专謀利潤的狂热病。这种周期性的投机狂热，暴露出竞争竭力逃避工业竞赛的必然性的真正性质。

如果你們对 14 世紀的手工业者說：工业上的全部封建組織和特权即将廢除，这一切将由工业竞赛即所謂竞争来代替，那末他一定会回答你們說：各种同业公会、行会和商会的特权就是有組織的竞争。蒲魯东先生說的“竞赛也就是竞争本身”也正是这个意思。

“假如頒布一道法令，說从 1847 年 1 月 1 日起人人的劳动和工資都有保障，那末工业上的极端紧张状态立即就会轉变为严重的停滞。”

現在我們看到的不是假定，不是肯定，也不是否定，而是蒲魯东先生为了证明竞争的必然性、它的永恒性是一些范疇等等而专门頒布的一道法令。

如果我們以为只須頒布几道法令就可以摆脱竞争，那末我們就永远摆脱不了竞争。如果我們更进一步建議廢除竞争而保留工資，那就等于建議用王室法令来做一些毫无意义的事。但是各民族并不是按照王室法令来发展的。各民族在求助于这些法令之前，至少必須彻底改变他們在工业上和政治上的一切生存条件，也

就是要彻底改变他們的整个生活方式。

蒲魯东先生会心平气和地用自信的口吻回答我們說：这是一个关于“史无前例地改变我們的本性”的假設，并且他有权“把我們排斥于辯論之外”，我們不知道他根据的又是哪一道法令。

蒲魯东先生不知道，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

“讓我們根据事实来談吧。法国革命既为了爭取工业自由，也为了爭取政治自由；我們要直截了当地說，虽然法国在 1789 年未曾認識到它要求实现的原理的全部后果，可是它的願望和期待都沒有落空。誰想否认这一点，我认为他就丧失了任何批評的权利：我决不同一个承认 2500 万人的自发性錯誤的論敌进行辯論…… 假如竞争不是社会經濟的原理、命运的法規、人类灵魂的要求，那末，为什么人們宁願将同业公会、行会和商会廢除，却不肯考虑將它們加以修正呢？”

这样說来，既然 18 世紀的法国人廢除了同业公会、行会和商会而不是將它們改头換面，那末 19 世紀的法国人就应该把竞争改头換面而不是將它廢除。既然竞争在 18 世紀的法国是作为某些历史需要的結果而形成的，那末它在 19 世紀的法国就不該由于另一些历史需要而被消除。蒲魯东先生不懂得，竞争的形成同 18 世紀人們的现实发展有联系，他把竞争变成 *in partibus infidelium* [在真正现实以外的]① 人类灵魂的某种必然要求。他会把那位对 17 世紀說来是偉大的柯尔培尔变成什么呢？

革命以后就出現了目前这种局面。蒲魯东先生就从这里猎取一些事实，來說明竞争的永恒性。他证明，像农业等这样一些生产部門，由于竞争这一范疇尚未充分发展，目前仍处于落后和衰敗状态。

① 原意是：“不信教国家中的”。这是对非基督教国家中徒有其名的天主教主教这一头衔的称呼。——編者注

說什么某些生产部門尙未发展到竞争的高度，而另外一些又还没有达到资产阶级的生产水平，这简直是痴人说梦，丝毫不能证明竞争的永恒性。

蒲魯东先生的全部邏輯总括起来就是：竞争是一种社会关系，現在我們正在这种关系下面发展我們的生产力。对于这个真理，他并没有在邏輯上加以发展，而往往只是进行过多的表述：竞争是工业竞赛，是自由的最时髦的方式，是劳动中的义务，是价值的构成，是平等到来的条件，是社会經濟的原理，是命运的法規，是人类灵魂的必然要求，是永恒公平的启示，是划分中的自由，是自由中的划分，是一个經濟范疇。

“竞争和联合是相互依存的。它們不仅不互相排斥，甚至彼此間也没有分歧。竞争必然以共同目标为前提。可見，竞争并不是利己主义，而社会主义的最可悲的錯誤，正是在于它把竞争看成社会的傾复。”

竞争以共同目标为前提，而这就证明：一方面，竞争是联合，另一方面，竞争不是利己主义。难道利己主义就不是以共同目标为前提的么？任何利己主义都是在社会中靠社会来进行活动的。可見，它是以社会为前提，即以共同的目标、共同的需要、共同的生产资料等等为前提的。因此，在社会主义者所說的竞争和联合之間甚至没有一点分歧，这难道是偶然的嗎？

社会主义者很清楚，現代社会是建立在竞争之上的。既然他們自己就打算推翻現代社会，他們怎能責备竞争要推翻現代社会呢？既然他們认为未来的社会将要推翻竞争本身，他們又怎能反而指責竞争要推翻未来的社会呢？

往后，蒲魯东先生又說，竞争是壟断的对立物，因此，竞争不可能同联合对立。

封建主义一开始就同宗法式的君主制对立；可見它并不同当时还不存在的竞争对立。难道由此就可以得出結論，說竞争同封

建主义并不对立嗎？

其实，**社会、联合**这样的字眼是可以用于一切社会的名称，既可以用于封建社会，也可以用于资产阶级社会——建筑在竞争上的联合。认为用**联合**这个词就可以驳倒竞争的社会主义者怎么能站得住脚呢？蒲鲁东先生本人又怎能设想，仅仅把竞争理解为**联合**就可以维护竞争而反对社会主义呢？

刚才我们所讲的一切就是蒲鲁东先生所理解的竞争的好的一面。现在我们来谈谈竞争的坏的即否定的一面，谈谈它的有害的结果，它的破坏性的、毁灭性的、有害的属性。

蒲鲁东先生为我们描绘的那种情景是非常阴暗的。

竞争产生贫困，它酿成内战，“改变地带的自然条件”，混淆民族，制造家庭纠纷，败坏公德，“歪曲公平、正义的概念”和道德的概念，不仅如此，它还破坏诚实而自由的贸易，甚至也不拿**综合价值、固定而诚实的价格**来代替。竞争使得人人失望，经济学家们也不例外。它把事情弄到自我破坏的地步。

从蒲鲁东先生所说的竞争的这一切坏处看来，竞争岂不成了资产阶级社会关系及其原理和幻想的最具有分裂性和破坏性的因素嗎？

我们要注意，竞争对资产阶级关系所起的影响，将随着新生产力即新社会的物质条件在它的刺激下急剧地形成而日益具有破坏性。至少在这一点上竞争的坏的一面也会有它的某些好处。

“从竞争的起源来考察，作为一种经济状态或一个经济阶段的竞争，是……主张减低一般生产费用的理论的必然结果。”

在蒲鲁东先生看来，血液循环应当是哈维的理论的结果。

“垄断是竞争的必然结局，竞争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产生出垄断。垄断的这种起源就证明垄断的正当……垄断是竞争的天然对立而……可是，既

然竞争不可避免，那末它本身就含有垄断的思想，因为垄断好像是每一个竞争的个体的屏障。”

我們和蒲魯东先生一同感到高兴的是，他总算有一次把他的正題和反題的公式运用成功了。誰都知道，現代的垄断就是由竞争产生的。

一牵涉到內容，蒲魯东先生就得依靠詩意的形象。竞争曾經把“劳动的每一細小部分”变成“一个好像是独立自主的領域，在这里每个人都表現了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独立性”。垄断是“每一个竞争的个体的屏障”。“独立自主的領域”至少和“屏障”同样好听。

蒲魯东先生所讲的只是由竞争产生的現代垄断。但是，大家知道，竞争是由封建垄断产生的。可見，原来竞争是垄断的对立面，并非垄断是竞争的对立面。因此，現代垄断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反題，相反地，它是一个真正的合題。

正題：竞争前的封建垄断。

反題：竞争。

合題：現代垄断；它既然以竞争的統治为前提，所以它就是封建垄断的否定，同时，它既然是垄断，所以就否定竞争。

因此，現代垄断，资产阶级的垄断就是綜合的垄断，是否定的否定，是对立面的統一。它是純粹的、正当的、合理的垄断。蒲魯东先生把资产阶级的垄断当做粗野的、簡陋的、矛盾的、痙攣状态的垄断，这样他就陷入了和他的哲学自相矛盾的境地。蒲魯东先生在垄断問題上不止一次提到过的罗西先生，大概对资产阶级垄断的綜合性质理解得要深一些。他在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教程”³²中举出人为的和自然的垄断之間的区别。他說：封建的垄断是人为的，即专橫的；资产阶级的垄断則是自然的，即合理的。

蒲魯东先生推論說：垄断是一件好事，因为它是一个經濟范畴，是从“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中散发出来的东西。竞争也是一

件好事，因为它也是一个经济范畴。不过，不好的就是垄断的实际和竞争的实际。更坏的是垄断和竞争的互相蚕食。怎么办呢？设法找到这两个永恒思想的合题，把它从太古以来所寄居的神的怀抱中拉出来。

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不仅可以找到竞争、垄断和它们的对抗，而且可以找到它们的合题，这个合题并不是公式，而是运动。垄断产生着竞争，竞争产生着垄断。垄断资本家彼此竞争着，竞争者逐渐变成垄断资本家。如果垄断资本家用局部的联合来限制彼此间的竞争，工人之间的竞争就要加剧；对某个国家的垄断资本家来说，无产者群众愈增加，各国垄断资本家间的竞争就愈疯狂。合题就是：垄断只有不断投入竞争的斗争才能维持自己。

为了辩证地引导出随垄断而来的捐税，蒲鲁东先生向我们讲述社会天才的故事。这位天才勇敢地在他那条曲折的道路上行进，

“……他步伐坚定，不后悔也不躊躇；走到垄断的拐角，他用忧郁的目光回头一望，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便对一切生产品课以赋税，并建立起一套行政机构，以便把全部职务交给无产阶级并由垄断资本家付给报酬”。

关于这位饿着肚子在曲折的道路上散步的天才有什么可说的呢？这种散步除了用捐税使资产者们毁灭以外没有别的目的，而实际上捐税正是资产阶级保持统治阶级地位的手段；关于这种散步，又有什么可说的呢？

为使读者约略地了解蒲鲁东先生对待经济细节的方法，只须说明一点就够了：他认为消费税的规定是为了平等和救济无产阶级。

消费税只是随着资产阶级统治的确立才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产业资本是一种靠直接剥削劳动来维持、再生产和不断扩大自己的持重而节俭的财富。在它手中消费税是对那些只知消费的封建

貴族們的輕浮、逸乐和揮霍的財富进行剝削的一种手段。詹姆斯·斯图亚特在亚当·斯密的著作問世以前十年所发表的“政治經濟学原理研究”一书，对消費稅的这种原始目的有很好的描写。

他說：“在君主专制下，君主对財富的增长似乎有些妒忌，所以就向发财致富的人征收捐稅，即向生产征稅。而在立宪制度下，捐稅主要落在日益貧困的人身上，即落在消費身上。因此，君主們向工业征稅…… 比如人头稅和平民財產稅是根据納稅人的假定財富按比例征收的。每人按照假定的收益相应地納稅。在立宪制度下，一般是向消費課稅。每人按照他支出的多少相应地納稅。”³³

至于捐稅、貿易差額和信用（在蒲魯东先生理性中）出現的邏輯順序，我們只要看到这一点就够了：英国資產階級在奧倫治公爵威廉三世时确立了自己的政治制度之后，一到它可能自由发展自己的生存条件时，立即建立了新的捐稅制度、国家信用和保护关税制度。

对于蒲魯东先生在警察或捐稅，在貿易差額、信用、共产主义和人口等問題上所做的深謀远慮的推論，这些短短的說明已經足以使讀者获得一个正确的观念了。可以保证：任何評論，甚至是最寬容的評論也不会对专讲这些問題的各章进行认真的研究了。

第四节 土地所有权或地租

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着。因此，給資產階級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資產階級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

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疇、一种抽象的和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

虽然蒲魯东先生表面上似乎讲的是一般的所有权，其实他所

談論的不过是**土地所有权,地租**而已。

“地租和所有权一样,其起源可以說是不在經濟範圍之內;它根源于同財富生产极少关系的心理上和道德上的考虑。”(第二卷第 269 頁)

这样,蒲魯东先生就是承认自己在了解地租和所有权产生的經濟原因上是无能的。他承认这种无能使他不得不求助于心理上 and 道德上的考虑;这些考虑的确同財富生产极少关系,但是同他那狹隘的历史眼光却大有关系。蒲魯东先生断言,所有权的起源包含有某种神秘的和玄妙的因素。但是,硬使所有权的起源神秘化也就是使生产本身和生产工具的分配之間的关系神秘化,用蒲魯东先生的話來說,这不是放棄对經濟科学的一切要求了嗎?

蒲魯东先生

“只是提醒:在經濟进化的第七个时代(即信用时代)①,现实曾为虛构所排挤,人的活动有在空虛里消失的危險,因此有必要把人更紧地束縛于自然,而地租就是这种新契約的代价。”(第二卷第 265 頁)

有四十个埃巨的人②大概預感到后来会出现一个蒲魯东先生,因而說:“造物主先生,您怎么說都行。每个人都是自己世界的主人,可是您絕不能使我相信我們生活的这个世界是用玻璃做成的。”³⁴ 在您的世界里,信用是使人消失于空虛的手段,因此,要把人束縛于自然,土地所有权也許有必要。但是在现实生产的世界里,土地所有权始終走在信用的前面,所以蒲魯东先生的 horror vacui [惧怕空虛]是不可能存在的。

不管地租的起源怎样,只要它存在,它就是土地經營者和土地所有者之間激烈爭执的对象。这种爭执的最終結果是什么呢? 或

① 括弧里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② 伏尔泰同名小說的主人公,他是一个溫順、勤勞的农民,每年收入 40 个埃巨。埃巨(écu)是法國 18 世紀以前的币名,价值三金鎊。——譯者注

者，換句話說，地租的平均額怎樣呢？請看蒲魯東先生是怎麼說的：

“李嘉图的理論回答了這個問題。在社会生活之初，人剛來到地球上，只見大片的森林，土地廣漠無垠，而工業僅僅萌芽，在這個時候，地租當然等於零。未經勞動開墾過的土地是使用對象，並不是交換價值，它是公共的，但不是社會的。由於家族繁衍和農業進步，土地逐漸開始具有價格。勞動使土地具有價值，由此產生了地租。在付出等量勞動的情況下，收成愈多的土地，價格也就愈高；因此，所有者總是力求把除去土地經營者的工資即除去生產費用以外的全部土地產品攬為己有。於是所有權就緊跟在勞動之後，以便從勞動那里奪取超過實際生產費用的全部產品。當所有者執行神秘的義務，以社會集體的代表的身份對待耕者的時候，土地經營者却命定只是負有義務的勞動者，他有義務把超過他應得工資的全部所得向社會交代…… 因此，從本質和使命來說，地租是一種可分配的公平的工具，是經濟天才用來達到平等的無數手段之一。這是所有者和土地經營者（在不能秘密串通的情況下）為了更高的目的而從相反的角度編成的一份巨大的土地清冊，其最終結果將是土地使用者和產業家平均占有土地…… 必須具備所有權的全部魔力，才能從耕者那里奪去他不能不視為己有的產品的餘額，因為他認為自己是產品的唯一創造者。地租，或者更恰當地說，土地所有權，摧毀了農業上的自私，產生了任何力量任何土地的分割所不能產生的團結…… 現在，所有權已經獲得道義上的成果，剩下的就只是分配地租了。”

所有這些響亮的詞句首先可以歸結如下：李嘉圖說，農產品價格超過它們的生產費用（包括資本的普通利息和利潤在內）的餘額，就是地租的標準。蒲魯東先生則更為高明，他使化裝成 *deus ex machina* [從機器里出來的神]^① 的所有者出面干預，以便從耕者那里奪去超過生產費用的全部產品餘額。他利用所有者的干預來說明所有權，利用收租者的干預來說明地租。他回答問題的方法就是重復應予說明的范疇，並在後面加上一個音節^②。

① 在古代的戲院里，扮演神的演員由特殊的機械裝置送上舞台；這句話的轉義就是指那種突然出現以挽救危局的人。——編者注

② 用所有者(*propriétaire*)的干預來說明所有權(*propriété*)，用收租者(*rentier*)的干預來說明地租(*rente*)。——編者注

我們還要注意一點，蒲魯東先生用土壤肥沃程度來決定地租，使地租又有了一个新的起源，因為他認為土地在按照肥沃程度來估價之前，“不是交換價值，而是公共的”。使行將消失於無限空虛里的人回到土地上的必要性，產生了地租；蒲魯東關於地租的這種虛構現在又到哪裡去了呢？

李嘉圖的學說被蒲魯東先生用天命的、譬喻的和神秘的語句煞費苦心地理扎起來了，現在我們來把它解開。

李嘉圖所說的地租就是資產階級狀態的土地所有權，也就是從屬於資產階級生產條件的封建所有權。

我們看到，根據李嘉圖的學說，一切物品的價格歸根到底取決於生產費用，其中包括經營利潤；換句話說，價格取決於所用勞動時間的多少。在工業生產中，使用勞動量最少的產品的價格決定著其餘的同類產品的價格，因為最便宜而效率又最高的生產工具可以無限增加，而自由競爭必然產生市場價格，就是說，產生一種一切同類產品的共同價格。

與此相反，在農業生產中一切同類產品的價格取決於生產中使用勞動量最多的產品的價格。首先，這裡不能像工業生產中那樣隨意增加效率相同的生產工具的数量，即肥沃程度相同的土地数量。其次，由於人口逐漸增加，人們就開始經營劣等地，或者在原有土地進行新的投資，這新的投資的收益比原始投資的收益就相應地減少。在這兩種情況下都是用較多的勞動獲得較少的產品。勞動必須增加是由人口的需要造成的，因此用高價耕種的土地的產品就一定和用低價耕種的土地的產品同樣有銷路。但由於競爭使市場價格平均化，所以優等地的產品就要同劣等地的產品等價銷售。優等地的產品價格中超過生產費用的這一餘額就構成地租。假如人們可以隨時得到肥沃程度相同的土地，假如農業也和工業一樣隨時可以使用花費較少而效率較高的機器，或者假如

后来的土地投资和最初的投资获得的效果相同，那末，农产品的价格就会像我們所見的工业产品价格一样，取决于最好的生产工具所生产的商品的成本。但是，这样地租就会消失。

要使李嘉图的理論普遍正确，必須^①使資本能够自由运用于各生产部門；資本家間高度发展的竞争必須使利潤达到同一水平；必須使土地經營者变成普通的資本主义企业家，他要从他投入劣等地^②的資本中取得相当于他投资于任何工业部門时所能取得的利潤；必須使土地的耕作按照大生产制度进行；最后，还必须使土地所有者本人只想得到貨幣收入。

可能发生像爱尔兰那样的情况：土地租佃已高度发展，但是还没有地租。因为地租不仅是扣除工資以后，而且还是扣除經營利潤以后的余額，所以，如果土地占有者的收入只是来自克扣工資，地租就不可能存在。

这样看来，地租不仅不把土地使用者、土地經營者变成简单的劳动者，不仅不“从耕者那里夺取他不能不視為已有的产品的余額”，而且它使土地所有者面对的已不是奴隶、农奴、代役租的农民或雇农，而是資本主义企业家。自从土地所有权构成地租来源以来，土地占有者所得的就只是超过生产費用（不仅由工資而且也由經營利潤决定）的余額。可見，地租正是从土地占有者那里夺去的一部分收入^③。在封建租佃者被資本主义企业家排挤以前，还經過一个很长的时期。例如，在德国这种变化直到 18 世紀的最后三四

① 在馬克思送給娜·吳亭娜的那一本上面，这一句話的开头改为：“要使李嘉图的理論(只要肯定它的前提)普遍正确，还必须”。——編者注

② 在送給娜·吳亭娜的那一本上面：“投入劣等地”改为“投入土地”。——編者注

③ 在 1885 年的德文版中，沒有最后的两句，而在前面的“資本主义企业家”数字之后做了如下的补充：“他用雇佣工人来經營土地，他只是把超出包括資本的利潤在內的生产費用的余額作为租金付給土地占有者。”——編者注

十年間才开始。只有在英国，资本主义企业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間的这种关系才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当蒲魯东先生的耕者孑然独存的时候，还没有出現地租。可是，一出現了地租，耕者就不再是土地經營者而是工人，即土地經營者的耕者。劳动者淪为普通工、短工、替资本主义企业家作工的雇农；像經營任何一个工厂一样地經營土地的资本主义企业家出現了；土地所有者由一个小皇帝变成一个普通的高利貸者；这就是地租所表現的各种不同的关系。

李嘉图所說的地租就是把宗法式的农业变成商业性的企业，把經營資本投入土地，使城市資產階級移到乡村。地租并不把人束縛于自然，它只是把土地的經營同竞争联在一起。土地所有权一旦构成了地租的来源，它本身就成为竞争的結果，因为从这时起土地所有权就依附于农产品的市場价值。作为地租，土地所有权丧失了不动产的性质，变成一种交易品。只有在城市工业的发展和由此产生的社会組織迫使土地所有者只去追求商业利潤，只去追求农产品給他带来的貨幣收入，教他把自己的土地所有权看成仅仅是一架为他鑄造貨幣的机器以后，才可能有地租。地租使土地所有者脫离土地，脫离自然，他甚至可以完全不了解自己的領地，正像在英国那样。至于土地經營者、资本主义企业家和农业工人，他們不束縛在他們取得收入的土地上，正如厂主和工厂工人不束縛在他們加工的棉花或羊毛上一样。他們感到切身有关的只是他們的产品价格和貨幣收入。因此反动势力便发出悲叹，祈求回到封建主义，回到美好的宗法式生活里，恢复我們祖先的淳朴的風尚和偉大的德行。土地也服从于支配任何其他实业的那些規律，这就是而且也永远是私利衰悼的对象。因此，可以說，地租是将田园生活卷入历史运动的动力。

尽管李嘉图已經假定資產階級的生产是地租存在的必要条

件，但是他仍然把他的地租概念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国家的土地所有权。这就是把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当作永恒范畴的一切经济学家的通病。

蒲鲁东先生曾赋予地租以天命的目的——把耕者变成负有义务的劳动者，现在他从这里转向地租的平均分配。

刚才我们已经看到，地租是由于肥沃程度不等的土地的产品具有同等的价格造成的。所以假定一公石谷物在劣等地上的生产费用是 20 个法郎，那末，原值 10 个法郎的一公石谷物就可以卖到 20 个法郎。

只要消费者由于需要而不得不购买市场上的全部农产品，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就由最昂贵的产品的生产费用来决定。正是这种由竞争产生而绝不是由土壤肥沃程度不等产生的价格均等化，使上等地的所有者能够从他的土地经营者所卖出的每一公石中取得 10 个法郎的地租。

我们暂且假定谷物的价格决定于生产所必需的劳动时间；那末，上等地生产的每一公石谷物将按 10 个法郎的价格出售，而劣等地生产的每一公石谷物就值 20 个法郎。如果这个假定成立，那末，平均市场价格就是 15 个法郎，但是按照竞争的规律，平均市场价格应为 20 个法郎。假如平均价格等于 15 个法郎，那末地租要进行均等的或者别的什么方式分配都不可能，因为地租本身就不存在。只有在生产者用 10 个法郎生产的一公石谷物能卖 20 个法郎时，地租才能存在。蒲鲁东先生假定生产费用不等而市场价格相等，那是为了把不等的产品进行均等的分配。

穆勒、舍尔比利埃、希尔迪奇等一些经济学家之所以要求地租由国家掌握以代替捐税，我们是可以理解的。这不过是产业资本家仇视土地所有者的一种公开表现而已，因为在他们的眼里，土地所有者只是整个资产阶级生产进程中一个无用的累赘。

但是，首先一公石谷物要按 20 个法郎支付，然后再把取自消费者的多余的那 10 个法郎普遍进行分配，这的确足以使社会天才在他那条曲折的道路上行进时闷闷不乐，并且走到第一个拐角就碰破了自己的脑袋。

地租在蒲鲁东先生的笔下变成了

“所有者和土地经营者……为了更高的目的而从相反的角度编成的一份巨大的土地清册，其最终结果将是土地使用者和产业家平均占有土地。”

只有在现代社会里，地租所造成的某种土地清册才可能有实际意义。

但是，我们已经指出：土地经营者向土地所有者缴纳的租金只是在工商业最发达的国家里才多少正确地表现了地租。而且这租金里面往往也还包含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利息。土地的位置、靠近城市和其他许多情况都影响着租金的多少和地租的种类。这些不可驳斥的论据足以证明，建筑在地租上面的土地清册是不精确的。

另一方面，地租不能作为表明一块土地肥沃程度的固定指标，因为现代化学的应用不断改变着土质，而地质科学目前又在开始推翻过去对相对肥沃的估价。英国东部各郡的广大土地直到大约二十年前才着手开垦，在这以前，由于人们对腐植质和下层土的构成之间的相互关系了解不够，这些土地没有开垦。

可见，在地租方面，历史不仅不给我们现成的土地清册，反而经常把现有的一切土地清册加以改变或全部推翻。

最后，肥沃绝不像所想的那样是土壤的一种天然素质，它和现代社会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一块土地，用来种粮食可能很肥沃，但是市场价格可以驱使耕者把它改成人工牧场因而变得不肥沃。

蒲鲁东先生发明的他那种甚至并不具备普通土地清册所具有的意义土地清册，纯粹是为了用来体现地租的天命的和平等的目的。

蒲魯东先生繼續說：“地租就是付給永存不灭的資本即土地的利息。但是由于这种資本不能在物质成分上有所扩大，只能在使用方法上不断改进，所以，虽然貸款（mutuum）的利息或利潤由于資本充斥而有不断下降的趋势，但地租将由于生产更加完善和耕作的改进而有不断上升的趋势……这就是地租的实质。”（第二卷第 265 頁）

这一次蒲魯东先生在地租里面看到了利息的一切标志，所不同的只是，地租是特种資本的利息。这种資本就是土地，它是永恒的資本，“它不能在物质成分上有所扩大，只能在使用方法上不断改进”。在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利息有不断下降的趋势，而地租却有不断上升的趋势。利息由于資本充斥而下降，地租由于生产更加完善、土地使用方法日益改进而上升。

这就是蒲魯东先生的看法的实质。

首先我們看看所謂地租是資本的利息这一說法有多少正确的成分。

对土地所有者本人來說，地租是他买进土地时所付出的或卖出土地时所能收回的資本的利息。但是在买卖土地时他买进或卖出的只是地租。土地所有者为了取得地租而付出的代价是以一般利率而定，与地租的本质无关。投入土地的資本的利息通常是低于投入工商业的資本的利息。因此，如果不把土地給它的所有者带来的利息同地租本身区分开来，那末似乎土地資本的利息比其他資本的利息还要低些。但是，問題不在地租的买价或卖价，不在它的市場价值，不在資本化的地租，而在地租本身。

租金不仅包含真正地租，而且还可能包含投入土地的資本的利息。在这种情况下，土地所有者不是以土地所有者的身份而是以資本家的身份获得这一部分租金。不过，这并不是我們所要讲的真正的地租。

只要土地不被用作生产資料，它就不是資本。正如所有其他

生产工具一样，土地資本是可以增多的。我們不能在它的物质成分上（用蒲魯东先生的說法）添加任何东西，但是我們可以增加作为生产工具的土地。人們只要对已經变成生产資料的土地进行新的投資，也就是在不增加土地的物质即土地面积的情况下增加土地資本。蒲魯东先生所理解的土地的物质，就是有空間界限的土地。至于他所說的土地的永恒性，我們并不反对土地作为一种物质具有这种性质。但是土地資本也同其他任何資本一样不是永恒的。

产生利息的黃金和白銀，也和土地一样是經久而永恒的。如果說金价、銀价下跌而地价却上漲，那末，这絕不是由于土地的本性多少是永恒的緣故。

土地資本是固定資本，但是固定資本同流动資本一样也有損耗。土地方面已有的种种改良要求人們把它們保持下来并进一步改良。这些改良只有在一定时期內才有效用，这和所有别的用来使物质变成生产資料的改良是一样的。假如土地資本是永恒的，那末，有些地方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面貌，羅馬近郊平原、西西里島和巴勒斯坦就会仍然放出昔日繁盛的全部光輝。

甚至有时有这样的情况：对土地实行的改良还保存着，而土地資本却已消失。

首先，这种情况每一次都是在真正的地租由于有新的更肥沃的土地的競争而被消灭的时候发生；其次，改良在一定时期內是可貴的，但自农艺学的发展使其普及以后，就不足貴了。

土地資本的代表不是土地所有者而是土地經營者。作为資本的土地带来的收入不是地租而是利息和經營利潤。有些土地产生这种利息和这种利潤，但不产生地租。

总之，土地只要产生利息，就是土地資本，但是，它既是土地資本，也就不能提供地租，就不能形成土地所有权。地租是实行土地

經營時那種社會關係的結果。它不可能是土地所具有的多少是經久的持續的本性的結果。地租來自社會，而不是來自土壤。

在蒲魯東先生看來，“耕作的改進”（“生產更加完善”的後果）是地租不斷上升的原因。其實恰恰相反，這種改進迫使地租周期限地下降。

一般說來，農業上或工業上的一切改良是怎麼回事呢？就是用同樣多的勞動生產出更多的產品，就是用更少的勞動生產出同樣多或者更多的產品。由於這些改良，土地經營者可以避免用更多的勞動獲得比較少的產品。這時，他已沒有必要去耕種劣等地，他在同一塊土地上繼續進行投資可以取得相同的收穫。因此，這些改良不但不能像蒲魯東先生所說的提高地租，它們反而成為地租上升的暫時障礙。

17世紀英國的土地占有者們非常明白這個真理，他們唯恐自己的收入減少，就反對農業上的成就。（參看查理二世時期英國經濟學家配第的著作³⁵）

第五節 罷工和工人同盟

“任何旨在提高工資的運動除了使糧食、酒等等漲價即引起貧困的加劇以外，不可能產生別的結果。要知道，什麼是工資？工資就是糧食……的成本，就是一切物品的全部價格。再進一步說，工資就是組成財富和工人群眾每日為再生產而消費的各種要素的比例性。因此，將工資提高一倍……就等於把超過生產者產品的部分發給每一個生產者，這當然是矛盾的。如果只是在少數生產部門內提高，就會使交換普遍混亂，總之，會引起貧困的加劇……我可以斷言：導致提高工資的罷工不能不引起價格的普遍上漲，這同二加二等於四一樣確實。”（蒲魯東，第一卷第110、111頁）

除了二加二等於四以外，我們否定上述一切論點。

首先，不可能有價格的普遍上漲。如果一切物品的價格都和

工資同時增加一倍，價格並不會因此發生任何變化，起變化的只是說法而已。

其次，普遍提高工資絕不會引起商品或多或少的普遍騰貴：實際上，假如一切生產部門都按照固定資本或所用勞動工具的比例使用等量的工人，那末，普遍提高工資就會使利潤普遍降低，而商品的市場價格卻不會有任何變化。

但是，由於各生產部門中手工勞動對固定資本的比例並不一樣，所以凡固定資本較多而工人較少的部門遲早總不得不降低自己的商品價格。反之，如果它們的商品價格不降低，它們的利潤就一定會超過利潤的一般水平。要知道，機器是不要工資的。因此，普遍提高工資對於那些使用機器較多而工人較少的生產部門，影響就比較小。但是，由於競爭不斷使利潤平均化，某些利潤超過一般水平的現象只能是暫時的。可見，如果除去某些波動情況，普遍提高工資的結果就不是蒲魯東先生所說的价格普遍上漲，而是價格的局部下跌，主要是用機器製造的商品的市場價格的下跌。

利潤和工資的提高或降低只是表示資本家和工人分享一個工作日的產品的比例，在大多數情況下絕不致影響產品的價格。至於“導致提高工資的罷工引起價格的普遍上漲，甚至引起貧困的加劇”，這種思想只有不可理解的詩人的頭腦里才能出現。

在英國，罷工常常引起某種新機器的發明和應用。機器可以說是資本家用來對付熟練工人反抗的武器。現代工業中一個最重要的發明——self-acting mule [自動驢機]^① 擊潰了進行反抗的紡紗工人。如果說用來反對同盟和罷工的機械發明的加強是同盟和罷工的唯一結果，那末就這一點來說，同盟和罷工對工業的發展也是有巨大影響的。

① 自動紡紗機。——編者注

蒲魯东先生繼續說：“萊昂·福适先生在 1845 年 9 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說：近来英国工人对同盟已不发生兴趣（这是一种进步，我們当然只有向他們表示祝賀），然而工人在精神上的这种改善主要是經濟上开化的結果。在波尔頓的一次集会上一个紡紗工人大声說过：‘工資不是由厂主决定的。在蕭条时期老板們可以說只是充当必然性手中的鞭子，不管他們願意不願意，他們只得鞭打。供求关系是具有調节作用的原理，这一点是老板們无法操纵的’……”蒲魯东先生大叫道：“好啊，这就是馴良的模范工人”…… “英国就是还缺少这种貧困，但願它不要跨过海峡。”（蒲魯东，第一卷第 261、262 頁）

在英国的各城市中，波尔頓的激进主义声势最大。波尔頓的工人是以革命最坚决聞名的。当英国为廢除谷物法而掀起广泛的鼓动宣傳的时候，英国厂主們认为，沒有工人打先鋒，他們就对付不了土地所有者。但是由于工人利益同厂主利益的对立并不亚于厂主利益同土地所有者利益的对立，所以，很自然，厂主們在工人的集会上是注定要失敗的。厂主們干了些什么呢？他們組織了一些有名无实的集会，参加者主要是一些工头、少数忠于他們的工人和道地的生意朋友。后来，真正的工人要参加集会（当时波尔頓和曼彻斯特的情况就是这样），反对这种人工示威，却被拒于大門之外，說这是 ticket-meeting [凭票入場的集会]，只有持入場券的人才能参加。可是墙上的招貼明明写的是公众的大会。每逢举行这种集会的时候，厂主們的报纸总是把会上的发言大登特登。不用說，在会上发言的都是一些工头。倫敦的报纸一字不改地将他們的发言全文轉載。不幸蒲魯东先生竟把工头当成普通工人，而且严禁他們渡过海峡。

1844 年和 1845 年罢工的消息比往年少了，这是因为 1844 年和 1845 年是 1837 年后英国工业繁荣的头两年。尽管这样，那时并沒有一个工联解散。

現在我們来听听波尔頓的工头們的发言。他們說，厂主并沒有权力操纵工資，因为产品价格不决定于厂主，其所以不决定于厂

主，則是因为厂主沒有权力操纵世界市場。于是他們根据这个理由，要工人們了解到，不应当組織同盟来要挾主人增加工資。蒲魯东先生則相反，他禁止組織同盟是唯恐引起工資的提高，因而引起貧困的加剧。不言而喻，工头們和蒲魯东先生在提高工資就等于提高产品价格这一点上是同声相应的。

但是，使蒲魯东先生引为憾事的真正原因是不是唯恐貧困加剧呢？不是。他对波尔頓的工头們恼怒純粹是因为他們用供求关系来确定价值，毫不关心构成价值，即达到构成状态的价值，毫不关心价值的构成，其中包括不断的交換可能性以及其他一切同天命并列的关系的比例性和比例性的关系。

“工人罢工是違法的，不仅刑法典上如此規定，而且經濟体系、現存制度的必然性也說明这一点…… 每一个工人有单独支配自己的人身和双手的自由，这是可以容忍的，但是社会不能容許工人組織同盟来压制壟断。”（第一卷第 334、335 頁）

蒲魯东先生想把法国刑法典的条文說成是資產阶级生产关系的必然的和普遍的結果。

在英国，組織同盟是議会的法令所认可的，而且正是經濟体系迫使議会批准了这种法律。1825 年，在哈斯基森大臣任內，議会必須修改法律才能更加适应自由竞争所造成的环境，在这个时候，議会不得不廢除一切禁止工人組織同盟的法律。現代工业和竞争愈发展，产生同盟和促进其活动的因素也就愈多，而同盟一經成为經濟事实并日益稳定，它們也必然很快地成为合法的事实。

因此，法国刑法典的有关条文至多只能证明，在制宪會議和帝制时期，現代工业和竞争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³⁶。

經濟学家和社会主义者^①在給同盟定罪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① 指当时的社会主义者：在法国是傅立叶主义者，在英国是欧文主义者。——弗·恩·（恩格斯在 1885 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只是动机各不相同而已。

經濟學家向工人說：不要結成同盟。如果你們結成同盟，就會破壞工業的正常工作，妨礙廠主滿足訂戶的要求，擾亂商業和加速採用機器，這樣，你們的一部分勞動就會毫無用處，機器將迫使你們接受更低的工資。同時，你們一定會徒勞無益的。你們的工資總是決定於勞動人手的供求關係；抗拒政治經濟學的永恆規律，不但可笑，而且危險。

社會主義者向工人說：不要結成同盟，這樣做歸根到底你們會得到什麼呢？能提高工資嗎？經濟學家可以非常清楚地向你們證明：即使事情順利，在短期內多拿到幾文錢，但是以後工資要永遠減少下去。熟練的核算家會向你們證明：單是你們組織和維持同盟所必需的一筆經費，就需要經過若干年才能從提高的工資中得到補償。而我們，作為社會主義者則要告訴你們：即使不談錢的問題，你們絕不會因為結成了同盟就不再當工人，而老板將來却照舊當他的老板。所以，不需要任何同盟，不需要任何政治，因為組織同盟不就是搞政治嗎？

經濟學家希望工人在目前已經形成、經濟學家已經在自己的教科書上記載和規定的社會里停滯不前。

社會主義者勸告工人不要觸動舊社會，以便更好地進入他們用非凡的先見之明準備就緒的新社會去。

不管什麼經濟學家 and 社會主義者，不管什麼教科書和烏托邦，同盟片刻不停地隨着現代工業的發展和成長而日益進步和擴大。現在甚至可以說，同盟在一國內的發展程度可以確切地表明該國在世界市場等級中所占的地位。工業最發達的英國就有最大的而且也組織得最好的同盟。

在英國，工人們就不限於組織一些除臨時罷工外別無其他目的並和罷工一起結束的局部性同盟。他們還建立經常性的同

盟——工联，作为工人同企业主进行斗争的堡垒。现在，所有这些地方工联已组成全国职工联合会³⁷，拥有会员 80 000 人，中央委员会设在伦敦。工人在组织这些罢工、同盟、工联的同时也进行政治斗争，现在工人们正在宪章派的名义下形成一个巨大的政党。

工人们最初企图联合时总是采取同盟的形式。

大工业把大批互不相识的人们聚集起来。竞争把他们的利害关系分开。但是维护工资这一对付老板的共同利益，使他们在一个共同的思想(反抗、组织同盟)下联合起来。因此，同盟总是具有双重目的：消灭工人之间的竞争，以便同心协力地同资本家竞争。反抗的最初目的只是为了维护工资，后来，随着资本家为了压制工人而逐渐联合起来，原来孤立的同盟就组成集团，工人们为抵制经常联合的资本而维护自己的联盟，就比维护工资更为必要。下面这个事实就确切地说明了这一点：使英国经济学家异常吃惊的是，工人们献出相当大一部分工资支援经济学家认为是单只为了工资而建立的联盟。在这一斗争(真正的内战)中，未来战斗的一切要素在聚集和发展着。达到这一点，同盟就具有政治性质。

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工人。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本说来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在斗争(我们仅仅谈到它的某些阶段)中，这批人逐渐团结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所维护的利益变成阶级的利益。而阶级同阶级的斗争就是政治斗争。

我们应当把资产阶级的历史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是资产阶级在封建主义和君主专制的统治下形成阶级；第二是形成阶级之后，推翻封建主义和君主制度，把旧社会改造成资产阶级社会。第一个阶段历时较长，花的力量也最多。资产阶级也是从组织反对封建主的局部性同盟开始进行斗争的。

对资产阶级所经历各个历史阶段——从城市自治团体直到构成阶级，已有不少的探讨。

但是，当问题涉及到对罢工、同盟以及无产者在我们眼前实现他们组成为阶级所采用的其他形式给以明确估价的时候，一些人就陷入真正的惶恐，另一些人就显出先验的蔑视。

被压迫阶级的存在就是每一个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的重要条件。因此，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必然意味着新社会的建立。要使被压迫阶级能够解放自己，就必须使既得的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关系不再继续并存。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

这是不是說，旧社会崩溃以后就会出现一个表现为新政权的新阶级的统治呢？不是。

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要消灭一切阶级；正如第三等级即资产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消灭一切等级一样^①。

工人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资产阶级社会；从此再不会有任何原来意义的政权了。因为政权正是资产阶级社会内部阶级对立的正式表现。

在这以前，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对抗仍然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一旦达到最紧张的地步，就成为全面的革命。可见，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的社会最终将成为最大的矛盾、将导致人们的肉搏，这用得着奇怪吗？

不能說社会运动排斥政治运动。从来没有哪一种政治运动不

^① 这里所谓等级是指历史意义上的封建国家的等级，这些等级有一定严格限定的特权。资产阶级革命消灭了等级及其特权。资产阶级社会只有阶级，因此，誰把无产阶级称为“第四等级”，他就完全违背了历史。——弗·恩·（恩格斯在 1885 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同时又是社会运动的。

只有在沒有階級和階級對抗的情況下，**社會進化**將不再是**政治革命**。而在这以前，在每一次社會全盤改造的前夜，社會科學的結論總是：

“不是戰鬥，就是死亡；不是血戰，就是毀滅。問題的提法必然如此。”(喬治·桑)³⁸

附 录

馬克思 致巴·瓦·安年科夫

1846年12月28日,布魯塞爾

如果不是我的書商延至上星期才給我送來蒲魯東先生著的“貧困的哲學”,那您早就會接到我對您11月1日來信的答复了。為了能夠立刻把我的意見告訴您,我用兩天時間把這本書閱覽了一遍。既然我把這本書讀得很倉卒,我也就不能論及細節。我只能談談它給我的一般印象。假如您願意的話,我可以在下一封信里來較詳細地談這本書。

老實說,我認為它一般是本壞書,是本很壞的書。您自己在來信里開玩笑地說到了蒲魯東先生在這本雜亂無章而妄自尊大的著作中所炫耀的“一小塊德國哲學”,但是您認為哲學的毒藥並沒有毒害到他的經濟學研究。我也絲毫不認為蒲魯東先生在經濟學研究方面的錯誤是由他的哲學所引起的。蒲魯東先生所以給我們提供了對於政治經濟學的謬誤批判,並不是因為他擁有一個令人可笑的哲學;他所以給我們奉上了令人可笑的哲學,是因為他沒有理解現代社會制度的聯結(engrènement),——如果用蒲魯東先生像假借其他許多東西一樣從傅立叶那里假借來的這個名詞表示的話。

為什麼蒲魯東先生要談到神,談到普遍的理性,談到無個性的人類理性,認為它永遠不會錯誤,認為它永遠等於自己本身,認為只要對它理解得正確,便可獲得真理呢?為何他引用肤淺領會的黑

格尔主义，来把自己描繪成一个深湛的思想家呢？

他自己給我們提供了一把解答这个哑謎的钥匙。蒲魯东先生认为历史是某一系列的社会进化。他觉得历史是进步的实现。最后，他觉得，人們单独說来并不知道他們作了什么事情，人們錯誤地設想了自身的运动，就是說，初看起来，人們的社会发展仿佛是跟他們的个人发展不同、独立和毫不相干的。他无法解釋这些事实，于是就作出假設，說存在有一种自我表现的普遍理性。在缺乏合理内容时发明出一些神秘原因即空話来，当然是最便当不过的了。

但是，蒲魯东先生既然承认自己完全不理解人类的历史发展，而他确实是在使用所謂普遍理性、所謂神等等响亮字眼时就承认了这一点，——岂不是因而也就必然承认他同样也不能理解經濟发展嗎？

社会——不管其形态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們交互作用的产物。人們是否可以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态呢？决不可以。有一定的人們生产力发展阶段，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費形式。有一定的生产、交换和消費发展阶段，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級或階級組織，一句話說就是有一定的公民社会。有一定的公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公民社会正式表现的一定政治制度。这就是蒲魯东先生永远不能理解的东西，因为他竟以为他从国家訴諸公民社会，即从社会的正式表现訴諸正式社会，就是在完成着一种偉績哩。

这里不必再补充說，人們不能自由选择构成其全部历史基础的自己的生产力，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既得的力量，即以往活动的产物。所以，生产力是人們实践能力的結果，但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們所处的条件，取决于先前已經获得的生产力，取决于在他們以前已經存在的社会形态，取决于不是由这些人創立，而是由先前各代人們創造出来的社会形态。单是由于有这样一事实，即每一

后代的人们所找到的都是先前各代人们已经取得的生产力，而这种生产力则供他们作为原料继续进行生产的，由于有这一事实，便形成人类历史的联系，便形成人类的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从而人们的社会关系愈益发展，这个历史也就愈益成为人类的历史。由此便必然得出一个结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不过是他们个体发展的历史，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点。他们的物质关系乃是他们一切关系的基础。这种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由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

蒲鲁东先生混淆了思想和事物。人们始终不抛弃他们既经获得的东西，但这并不是说，他们不会抛弃他们所由以获得了一定生产力的那个社会形式。恰恰相反。为了不致丧失已经达到的成就，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其交往 (commerce) 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一切承受下来的社会形式。——这里我使用 «commerce» 一词是指其最广泛的意义而言，也如在德文上使用 «Verkehr» 一词那样。例如：各种特权，行会和公会体制，全部中世纪规则，曾是唯一适合于既得生产力，并且适合于这些制度所由以产生的早先社会状况的社会关系。在公会制度及其规则保护下逐渐积累了资本，发展了航海贸易，建立了殖民地，但是如果人们想把这些果实所由以成熟起来的那些形式保存下去，他们就要丧失这一切果实了。所以便爆发了两次霹靂式的震动，即 1640 年和 1688 年的革命。一切旧的经济形式，一切跟它们相适应的社会关系，全部曾是旧公民社会正式表现的政治制度，——所有这一切当时在英国都被破坏了。可见，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乃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当时一定生产方式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

这是蒲魯东先生所沒有理解，尤其沒有证明的。蒲魯东先生既探溯不出历史的实在进程，便給我們奉上一套怪論，奉上一套妄图充当辯证怪論的怪論。他觉得沒有必要談到 17、18 和 19 世紀，因为他的历史是在想像的云霄中发生，并且高高超越于時間和空間範圍的，一句話，这是黑格尔式的廢物，这不是平常的历史——人們的历史，而是神圣的历史——观念的历史。在他看来，人不过是观念或永恒理性为了自身发展而使用的工具。蒲魯东先生所說的**进化**，是在絕对观念的神秘境域中所发生的进化。如果揭去这种神秘辞句所蒙上的遮幕，那末就可看到，蒲魯东先生所描写的是各个經濟范疇在他头脑中的排列次序。不用化多大力量，就能证明这是个很混乱头脑中的次序。

蒲魯东先生所著一书开头就是談論**价值**，談論他这个拿手好戏。我这次不来分析他书中的这一部分。

永恒理性的一系列經濟进化开始就是**分工**。在蒲魯东先生看来，分工是个十分簡單的东西。但是，难道等級制度不是某种分工嗎？难道行会制度不是另一种分工嗎？难道手工工場时期的分工，在英国开始于 17 世紀中叶而結束于 18 世紀末叶时期的分工，不是跟現代大工业中的分工截然不同嗎？

蒲魯东先生竟是如此不懂得問題本质，甚至忽略了普通經濟学者也不会忘却的东西。他談到分工时，完全沒有感觉得必須談到世界市場。但是，难道 14 和 15 世紀的分工，在这还没有过殖民地，美洲对于欧洲說来还不存在，而跟东亚細亚来往仅仅通过君士坦丁堡实现的那个时代的分工，不是一定要跟已有充分发达殖民地存在的 17 世紀时的分工根本不同嗎？

但还不止于此。难道各族人民的整个內部組織，他們的一切国际关系不都是某种分工的表現嗎？难道这一切不是一定要随着分工改变而改变嗎？

蒲魯东先生竟是如此不懂得分工問題，甚至沒有提到例如在德国是于 9 世紀至 12 世紀时期发生的城乡間的分立。在蒲魯东先生看来，这种分立是永恒的、始終不变的規律，因为他既不知道这种分立的来源，也不知道这种分立的发展。他在他的整本书內都是推論得这样，仿佛这个一定生产方式的产物一直会存在到世界末日哩。蒲魯东先生关于分工所說的一切，最多不过是对斯密和其他許多人在他以前說过的东西的归納，并且是个很表面而不完备的归納。

永恒理性的第二个进化就是**机器**。在蒲魯东先生那里，分工和机器間的联系是很神秘的。每种分工制都有其特殊的生产工具。譬如，自 17 世紀中叶至 18 世紀中叶，人們不是一切工作都用双手进行的。当时他們已有工具，甚至是很复杂的工具，如車床、帆船、杠杆等等。

由此可見，把机器的产生看作是一般分工的結果，原是十分荒謬的。

我順便还指出一点，即蒲魯东先生很少懂得机器发展的历史，正像他很少懂得机器产生的历史一样。可以說，在 1825 年——第一次总危机时期——以前，消費的需求一般地比生产增长得快，而机器的发展曾是市場需求的必然后果。自 1825 年起，机器的发明和运用只是企业主和工人相互激烈斗争的結果。但是，这点只有对英国說来才是正确的；至于欧洲各国，那末迫使它們运用机器的，是英国在各該国自己內部市場以及在国际市場上的竞争。最后，在北美，采用机器是由于跟其他国家进行竞争，并且是由于人手不够，即由于北美境内工业需求和人口不相称。您根据这些事实就可断定，蒲魯东先生把竞争这个怪影召来当作第三个进化，当作机器的反題，該是表現得多么明达啊！

末了，把机器說成是一种跟分工、竞争、信貨等等并列的經濟

范疇，根本就是很荒謬的。

機器不是一種經濟范疇，也像拖犁的犍牛不是一種經濟范疇一樣。現代運用機器一事是我們現代經濟制度的關係之一，但對於機器的利用方式，並不是機器本身。火藥不管是用來傷害一個人也好，或是用來給這個人醫治創傷也好，它終究是火藥。

蒲魯東先生真是自己超越了自己，因為他恰好是按我現在列舉的次序來在自己的頭腦中創造出競爭、壟斷、稅收或警察、貿易平衡、信貸和所有制哩。幾乎一切信貸機關在英國是早在 18 世紀初，即還在機器發明以前，就已有了發展的。國家信貸不過是一種增加稅收和滿足由資產階級掌握政權所造成的種種新需要的新方式。末了，所有制在蒲魯東先生的體系中算是最後一個范疇。在現實世界中，情形恰恰相反：分工以及蒲魯東先生的其他一切范疇，就是總合起來構成現在所謂所有制的社會關係；在這些關係範圍外，資產階級所有制無非是形而上學和法學的幻想。另一時代的所有制——封建主義的所有制，是在完全不同的社會關係下面發展起來的。蒲魯東先生將所有制肯定為獨立關係，就是作出一種比方法學上的錯誤更壞的錯誤：他暴露自己不懂得資產階級生產所有各種形式由以結合起來的聯繫；他暴露自己不懂得一定時代生產所有種種形式的歷史的和暫時的性質。蒲魯東先生既然看不到現代種種社會體制是歷史發展過程的產物，既然不懂得它們的來源和它們的發展，所以他就只能對它們作教條式的批判。

為了說明發展，蒲魯東先生不得不採用虛構。他臆想着，分工、信貸、機器等等都是為了服務於他那固執觀念——平等觀念——而發明出來的哩。他的說明是極其天真的。所有這些東西都是為了平等而想出來的，但是可惜它們掉轉過來反對平等了。他的全部論斷就在於此，換句話說，他作出一種任意的假設，但是因為實際發展進程隨時都跟他的虛構相矛盾，他便由此得出結論說

有矛盾存在。同时，他却隐瞒了一点，即所谓矛盾只是存在于他那些固执观念和现实运动之间哩。

这样，蒲鲁东先生首先是由于缺乏历史知识而没有理解到：人们在发展其生产力时，即在生活中，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的性质是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造和发展而改变的。他没有理解到：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并且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限度上才是真确的。这样，他就犯了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常犯的错误，这些经济学者竟把这些经济范畴看作是永恒的法则，而不是看作历史性的法则——只有对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才是实际有效的法则，只有对于一定生产力发展阶段才是实际有效的法则。所以，蒲鲁东先生不去把政治经济学范畴看作现实、暂时、历史社会关系的抽象，而却神秘地歪曲问题，竟把现实关系看作只是这些抽象的体现。这些抽象本身竟是自从世界创造时起就已在神父心怀里成熟起来的公式哩。

在这里，我们慈善的蒲鲁东先生就开始拚命用起脑子来挣扎了。既然这一切经济范畴都是从神心里分泌出来的东西，既然它们是人们的隐蔽而永恒的生命，那末试问为什么：第一，存在有发展；第二，蒲鲁东先生不是一个保守分子呢？他认为这些显然的矛盾是由于有整整一串对抗状态。

我们举个例子来阐明这一连串对抗状态吧。

垄断是个好东西，因为它是一个经济范畴，因而是从神心里分泌出来的东西。竞争是个好东西，因为它也是个经济范畴。但是不好是垄断的现实和竞争的现实。更不好是垄断和竞争在相互吞并。怎么办呢？既然神的这两个永恒思想是相互矛盾的，那末蒲鲁东先生以为神的心怀里想必同样有两个思想的综合，在这种综合中，垄断的祸害由竞争来抵消，反之亦然。两个观念彼此斗争所引起的后果，是只有它们的良好方面才会表露出来。应该从

神那里取得这个秘密思想，然后加以运用，于是就百事大吉了。需要找到这个深藏在人类无人身理性里面的综合公式。而蒲鲁东先生就毫不躊躇地以一个发现这一秘密的人物的身份出现了。

但是，請稍看一下现实的生活吧。在现代经济生活中，不仅可以看见竞争和垄断，并且可以看见它们的综合，这个综合并不是公式，而是运动。垄断产生着竞争，竞争产生着垄断。但是，这个方程式，并不如像资产阶级经济学者设想的那样能消除现代状况的困难，而是结果会造成更困难和更混乱的状况。因此，若是改变现代经济关系赖以存在的基础，消灭现代的生产方式，那就不仅会消灭竞争、垄断以及它们的对抗，而且还会消灭它们的统一，消灭它们的综合，即消灭那表示着竞争和垄断相互真正均衡的运动。

现在我给您举出一个表明蒲鲁东先生玩弄辩证法的例子。

自由和奴隶制形成一种对抗状态。我根本没有什么必要谈到自由的好处或坏处。至于奴隶制，那末关于它的坏处就不必去说了。唯一需要说明的，是奴隶制的好处。这里所指的，不是间接的奴隶制，不是无产者所受的奴役。这里所说的，是直接的奴隶制，即在苏利南、巴西和北美南部各州对黑人的奴隶制。

直接的奴隶制也像机器、信贷等一样，是我们现代工业的基础。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就没有现代工业。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了价值，殖民地造成了世界贸易，而世界贸易则是大机器工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在买卖黑奴贸易尚未建立之前，殖民地给予旧大陆的产品很少，没有较为显著地改变过世界的面貌。可见，奴隶制是个有很大意义的经济范畴。没有奴隶制，北美——最进步的国度——就会变成了宗法式的国度。只要从世界地图上勾销北美，结果就会看到紊乱状态，就会看到贸易和现代文明的彻底衰落。但是，消灭奴隶制，那也就等于从世界地图上把美洲抹去。这样，正由于奴隶制是经济范畴，所以奴隶制从创世时起

就在各国人民中都可遇到。现代各民族善于只是在自己本国把奴隶制掩饰起来，而在新大陆中则公开地实行它。经过这一番

其实，他所作的是一切慈善的资产者都在作的事情。这些资产者都向大家说，竞争、垄断等等在原则上，即如果把它们看作抽象的概念，乃是生活的唯一基础，不过它们实践上还得大加改善。他们都希望有竞争而没有竞争的悲惨后果。他们都希望有一种不可能的事情，即希望有资产阶级生活的条件而没有这些条件的必然后果。他们都不了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是种历史的和暂时的形式，也像封建形式曾是暂时的形式一样。其所以发生这个错误，是由于资产者在他们看来是一切社会的唯一基础，是由于他们不能想像会有一种在那里人不再是资产者的社会制度。

所以，蒲鲁东先生必然是个空论家。在现代世界上进行变革的历史运动，在他看来是归结于要发现两个资产阶级思想间的正确均衡或综合。于是，这个灵活的小伙子就来借用诡计来发现神的隐秘思想，来发现两个孤独思想的统一——而这两个思想所以是孤独的，仅仅是因为蒲鲁东先生把它们跟实际生活分开了，把它们跟现代生产，跟作为这两个思想所表现的种种现实事物的结合物的现代生产分开了。蒲鲁东先生用自己头脑中奇妙的运动，代替了由于人们既得的生产力跟他们不再与此种生产力相合的社会关系相互冲突而发生的伟大历史运动，代替了一个民族内各个阶级间以及各个民族彼此间准备着的可怕的战争，代替了唯一能解决这种冲突的群众实践革命活动——代替了这一广阔的、长久的和复杂的运动。总之，历史是由学者，即由有本事从神那里窃取隐秘思想的人们创造的。而平凡的人只是应在实践上运用他们所泄露的天机。您现在就可了解为什么蒲鲁东先生十分强烈地敌视一切政治运动了：在他看来，现代各种问题不是解决于社会行动，而是解决于他头脑中发生的辩证的旋转。既然范畴在他看来是动力，那末就不必改变现实生活以改变范畴。完全相反。必须改变范畴，结果就会是现存社会的改变。

蒲魯东先生想要調和矛盾，因而完全避开了一個問題：莫不是必須把這些矛盾的基礎本身推翻呢？他在在都像是一個政治上的空論主義者，想把國王、議會、上議院一併當作永恆的範疇，保存為社會生活的構成部分。他只是尋找着新公式，以求把這些力量均衡起來，實則這些力量的均衡正是表現於其中各個力量時勝時敗的現代運動。例如，在十八世紀，許多頭腦平庸人物都曾努力尋取一個真正公式，以便把各個社會等級、貴族、國王、國會等等均衡起來，而第二天早晨醒來時却發覺無論國王、國會、貴族都沒有了。這一對抗的真正均衡就是推翻那一切作為這些封建體制基礎和作為這些封建體制對抗基因的社会关系。

既然蒲魯东先生把永恆觀念、純粹理性範疇放在這一边，而把人們以及他們那種在他看來是這些範疇的運用實踐生活放在另一边，那末他自始就表現着把生活和觀念相對立、把靈魂和肉體相對立的二元主義觀點——以各種不同形式重複表現着的二元主義觀點。您現在便可看到，這個對抗不過是表明蒲魯东先生不能了解他所神化了的各種範疇的平常歷史和起源罷了。

我的信已經扯得太長了，所以我不能談到蒲魯东先生用以攻擊共產主義的種種可笑責難。暫且我希望您同意我說的一點，就是這個人既沒有了解社會現有狀況，也就更不會了解力求破壞這個社會的運動以及這個革命運動的文獻表現。

只有一點我完全同意蒲魯东先生，這就是他對於社會主義溫情的厭惡。在他以前，我譏諷那種癡愚的，溫情的，空想的社會主義而招致了許多敵視。但是，蒲魯东先生本人以其小資產者的温情——我所指的是他關於家庭、關於夫妻愛情的浮誇及其一切庸俗議論——跟社會主義的温情（而這種温情在譬如傅立叶那里要比我們慈善的蒲魯东先生大言不慚的庸俗議論高深得多哩）相對立時，豈不是給自己造成一些奇怪的幻想。他本人如此感到自己

論据空空洞洞,如此感到完全无力談論这一切东西,以致突然忘形地恼怒起来,表示高尚的憤激,嚎叫,发疯发狂,肆口謾罵,指天画日,賭咒发誓,捶胸拍案,滿口吹嘘說他毫沒沾染社会主义的齷齪!他沒有对社会主义的温情或他所視為温情的东西加以批評。他像一个仙人,像一个教皇,无情惩戒一般可怜的罪人,而竭力頌揚小資產階級以及那种小气的爱情的和宗法的家庭幻想。这并不是偶然的。蒲魯东先生彻头彻尾是个小資產階級的哲学家和經濟学者。小資產者在已經发展了的社会中,由于本身所处的地位,必然是一方面成为社会主义者,另一方面又成为經濟学者;換句話說,他既迷恋于大資產階級的豪華,又同情人民的苦难。他同时既是資產者,又是人民。他在自己的心弦深处引以为傲的,是他不偏不倚,是他找到了一个冒充为不同于中庸办法的真正均衡。这样的小資產者把矛盾予以神化,因为矛盾是他自身本性的基础。他自己无非是社会矛盾的体现。他应当在理論中表现出他在實踐中的本来面目,而蒲魯东先生的功績就在于他作了法国小資產階級的科学解釋者;这真正是一种功績,因为小資產階級将是一切未来社会革命的一个組成部分。

我本想有可能这次随信把我那本关于政治經濟学的书寄給您;但是直到現在,我既未能出版这本书,也未能出版我曾在布魯塞尔向您說过的那篇对于德国哲学家和社会主义者的批判。您很难以想像,出版这种书在德国是要遇到怎样的阻难:第一,是来自警察方面的阻难;第二,是来自那些作为一切受我所抨击的流派的有关代表者的出版人方面的阻难。至于我們自己的党,那末它不仅很貧困,并且除此而外,德国共产党內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党员由于我反对了他們的空想和浮夸,而生我的气……

馬克思

关于自由貿易的演說

1848年1月9日发表于布魯塞尔
民主协会的公众大会上³⁹

先生們！

英国谷物法的廢除是19世紀自由貿易所取得的最偉大的胜利。凡是厂主們談到自由貿易的地方，主要都是指自由买卖谷物和一切原料而言。“对国外谷物的进口实行保护关税，这是卑劣的行为，这是利用人民的飢餓进行投机。”

廉价的粮食，高额的工資 (Cheap food, high wages)，这就是英国的自由貿易派不惜耗費巨万力求达到的唯一目的，他們以自己的热情感染了他們在大陆上的同伙。总的說来，人們要求自由貿易，那只是为了改善劳动階級的处境而已。

可是，奇怪得很！想尽办法让人民得到廉价的粮食，而人民却毫不領情。現在英国的廉价粮食，如同法国的廉价政府一样，都信譽扫地。人民把那些充滿自我牺牲精神的人們，把包林，布萊特一类人及其同伙当做自己最大的敌人和最无耻的伪君子。

誰都知道：在英国，自由派和民主派之間的斗爭被称为自由貿易派和宪章派之間的斗爭。

現在我們来看看英国的自由貿易派是如何向人民证明促使他們起来行动的那种高尚意图的。

他們向工厂工人这样說：

谷物稅是你們向大地主，向這些中世紀的貴族代表交納的工資稅；你們貧困的原因是在於日用必需品價格的昂貴。

工人反過來問廠主們：在最近三十年中，我們的工業發展到最高的水平，而我們的工資的下降率大大超過了糧價的上漲率，這種情況又怎麼解釋呢？

照你們所說的，我們交納給地主的稅，對每一個工人來說，每周約計 3 辨士；可是，在 1815 年到 1843 年這一時期內，手工織工的工資從每周 28 先令降到 5 先令，而在 1823 年到 1843 年這一時期內，機器織工的工資從每周 20 先令降到 8 先令。

在這整個時期內，我們交納給地主們的稅從未超過 3 辨士。而在 1834 年，糧食價廉，在市面上出現一片欣欣向榮的氣象的時候，你們對我們說過什麼話呢？——“你們是不幸的，因為你們生育的孩子太多了，原來你們的婚姻比你們的手藝還要多產”。

這就是當時你們向我們所說的千真萬確的話，同時你們還制訂了新的濟貧法，設立了習藝所這種無產者的巴士底獄。

廠主對此回答說：

工人先生們，你們說的對，規定工資水平的不僅是糧食的價格，而且還有工人為尋找職業而發生的競爭。

但注意一下這個情況吧：我們的土地都是由岩石和砂礫構成的。也許你們還想在花盆里種植谷物呢！要是我們不把自己的資本和勞動用來耕種不毛之地，撇掉農業，專門來搞工業，那末，整個歐洲就得把工廠都关掉，那時英國也就成了一個大的工廠城市，而歐洲的其他部分就都變成英國的農業區了。

可是廠主和工人們的談話被一個小商人打斷了。他也要求答復這樣一個問題：

如果我們廢除了谷物法，那末，即使我們荒廢了本國的農業，我們也不會因此而迫使其他國家關閉它們的工廠，來向我們的工

厂定货。

结果将怎样呢？我将失去现在农村的主顾，而国内贸易也会丧失市场。

厂主抛开工人转过身来回答小铺主说：那末，就让我们随便怎么做好了。一旦废除了谷物税，我们就会从国外得到更廉价的粮食。那时，我们就会降低工资，同时在那些供给我们谷物的国家里，工资却会因此而提高。

因此，除了目前我们已有的那些优越条件之外，又加上更低廉的工资，有了这一切优势，我们就能使大陆购买我们的商品。

可是，现在农场主和农业工人也插进来争论了。

他们叫道：可是我们到底又将如何呢？

难道我们应该把养育我们的农业宣判死刑吗？难道我们能够任人拆我们的台，而一言不发吗？

反谷物法同盟却不作回答，而一味满足于给三部论述废除谷物法对英国农业的好处的优秀著作颁发奖金。

获得这种奖金的是霍普、摩尔斯和格莱格三位先生，他们的著作成千上万册地散布在农业区域。

其中第一位获奖者企图证明，自由输入外国谷物既不会使农场主吃亏，也不会使农业工人吃亏，吃亏的只是地主。他大声疾呼地说，英国农场主不应该害怕谷物法的废除，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像英国那样生产如此价廉物美的粮食。

因此，他断言说，即使粮价下跌，这也不会使你们遭致任何损失，因为粮价下跌只能引起地租的缩减，但绝对不会伤及企业主利润和工资，它们依然会保持在过去的水平上。

第二位获奖者是摩尔斯先生。他相反地断定，废除谷物法的结果必然是粮价上涨。他挖空心思力图证明，保护关税从来都没有能使粮食保有足够有利的价格。

他引用事实来证实自己的論点說，在英国，每当輸入外国粮食的时候，粮价总要大大上漲，而当进口减少的时候，粮价便急剧下跌。他忘却了不是粮食进口引起粮价上漲，而是粮价上漲才刺激了粮食进口。

他的見解同他的获奖的同僚迥然不同，他断言說，每次粮价上漲总是有利于农場主和工人，而不利地主。

第三位获奖者是大厂主格莱格先生，他的著作是为大农場主写的，他不能滿足于重复类似的濫調，他的話是比較科学的。

他承认谷物法之所以促进地租的上漲，只是因为谷物法引起了粮食价格的上漲，而谷物法所引起的这种上漲，正是由于谷物法迫使資本投于劣等地，这是很容易說明的。

随着人口的增长，如果没有国外谷物的輸入，就不得不去开垦次等地，耕种这种土地需要較大的耗費，因而它的产品也就較貴。

既然谷物的銷路有充分保证，那末谷物的价格必然要受耗費最大的地区的产品价格的調节。这一价格和优等地的生产費用間的差額便构成地租。

因此，如果因廢除谷物法而降低了粮食价格，从而也降低了地租的話，那末，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因为不再在次等地上耕作的緣故。由此可見，地租的降低必然要引起一部分农場主的破产。

为了理解格莱格先生的話，作这几点說明是必要的。

他断定說，那些不能再繼續經營农业的小农場主，可以去工业中謀生。至于那些大农場主，則仍然会占得优势。土地所有者却只好或者把自己的土地以极低廉的价格卖給他們，或者和他們訂立期限极长的租約。这就有可能使这些农場主把巨額資本投向土地，更大規模地采用机器，从而也就节省了手工劳动，但手工劳动也将由于工資的普遍下降（这是廢除谷物法的直接結果）而更加低廉。

包林博士对所有这些论证都予以宗教上的承认。他在一个公开的大会上大嚷：“耶稣基督是自由贸易，自由贸易是耶稣基督！”

显然，这种假仁假义是根本不能减轻粮食跌价给工人带来的痛苦的。

其次，对于厂主那种单凭一时心血来潮而发的慈悲，工人又怎么能够相信呢？要知道对于将工厂工人的工作日从12小时减到10小时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⁴⁰反对最力的，正是这些厂主们！

为使你们对厂主的慈悲得到一个概念，先生们，我提醒你们注意一下所有工厂都采用的厂规。

任何厂主为他个人的日常生活所需，都有一套规程，其中规定对一切有意无意的过失都处以罚金；例如，假使工人不幸在椅上坐了一下，偶而私语或谈笑，迟到了几分钟，损坏了机器的某一部件，或者制品的质量不合规格等等，他就得挨罚。事实上罚款往往超过工人实际所造成的损失。为了设法使工人容易挨罚，工厂的钟点拨快了，发给工人劣等的原料而要他制出好的成品。工头要是没有足够的花招来增加类似的犯规数字，便被辞退。

先生们，你们看，这种私人立法的建立是为了制造过失，而过失却成为生财之道。因此，厂主不择手段，竭力减低名义工资，甚至还要从这些并非由于工人的过失而造成的事故中得到好处。

这些厂主就正是那些力图使工人相信他们只要为了改善工人的处境，他们是能够不惜任何破费的慈善家。

这样一来，厂主一方面靠自己的厂规处心积虑地克扣工人的工资，另一方面又冒着最大的牺牲借反谷物法同盟来提高工资。

他们不惜巨大的开销来建筑宫殿，反谷物法同盟在宫殿里也大体上设立了自己的官邸，他们派遣整批传道大军到英国各地宣传自由贸易的宗教。他们刊印成千上万的小册子四处赠送，让工人认识到自己的利益。他们不惜破费拉拢报刊。为了领导自由贸

易运动，他們組織龐大的管理机构，而且在公众集会上施展自己全部雄辯之才。在一次这样的群众大会上，一个工人大声喊道：

“要是地主出卖我們的骸骨，那末，你們这些厂主就会首先买去放到蒸汽磨中去磨成面粉！”

英国工人是非常懂得地主和厂主之間斗争的意义的。他們很了解，厂主希望降低粮食价格就是为了降低工資，同时也知道，地租下降多少，資本的利潤也就上升多少。

英国自由貿易派的傳道者，本世紀最杰出的經濟学家李嘉图的观点在这一点上是和工人們的意見完全一致的。

他在自己的政治經濟学名著中說：

“要是我們不在自己本土耕作而找寻新的市場以便获得更廉价的粮食的話，那末，工資就要降低，利潤就会增加。农产品的跌价不仅降低了农业工人的工資，而且也降低了所有产业工人和商业工人的工資。”⁴¹

先生們，不要以为工人在粮价較賤时仅仅收入 4 法郎还是像过去一样收入 5 法郎这件事是无所謂的。

难道說，工人的工資和利潤比較起来不是愈来愈低嗎？工人的社会地位和資本家的地位比較起来是每况愈下，难道这还不清楚嗎？不但如此，工人实际上还遭受直接的損失：

当粮价和工資都同样处于較高的水平时，工人能节省少許粮食就足以滿足其他的需要。但是一旦粮价大大下跌，因而工資也大大下降的时候，工人便几乎根本不能節約粮食来购买其他的東西了。

英国工人已經向自由貿易派表明，他們是不願做自由貿易派那种幻想和欺騙的牺牲品的；他們所以联合自由貿易派来跟地主斗争，那只是为了消灭最后的封建殘余和孤立敌人罢了。工人并没有估計錯，为了向自由貿易派进行报复，地主和工人一起贊助了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工人們三十年来求之不得的法案，在廢除谷物

法后，就立即实现了。

在经济学家会议^①上，包林博士从口袋里取出一份长长的统计表，他想论证，为了满足（照他的说法）工人的需要，英国输入了多少牛肉、火腿、脂油、鸡雏等等。可是遗憾的是，他却忘记了就在这个时候，由于危机的来临，曼彻斯特和其他一些工业城市的工人却被抛到街头。

在政治经济学中，任何时候都绝不能仅仅根据一年的统计材料就得出一般规律。常常需要引证六、七年来的平均数字，也就是说，需要引证在现代工业经过各个阶段（繁荣、生产过剩、停滞、危机）而完成它必然的周期这一段时期内的一些平均数字。

显而易见，当一切商品跌价时（这种跌价是自由贸易的必然结果），我用一个法郎买的东西要比过去多得多。而工人的法郎和其他任何别的法郎一样，具有同等价值。看来，自由贸易对工人是非常有利的。但是这里只产生了一个小小的不方便，也就是说，工人在以自己的法郎交换别的商品以前，必须先以自己的劳动去交换资本。要是当他进行这种交换的时候，仍然能以同量的劳动换得上述数量的法郎而其他一切商品又在跌价的话，那末他在这种交易中始终都会是有利的。困难并不在于证明当一切商品跌价的时候，用同样的钱可以买到更多的商品。

经济学家总是在用劳动换成其他商品的时候去观察劳动价格。可是他们对于用劳动换成资本这一环节却完全置之度外。

当开动生产商品的机器需要较少的费用时，则保养被称为工人的这种机器所必需的东西，同样也得跌价。如果一切商品都低廉了，那末，同是商品的这种劳动的价格也同样降低了。而且，正如我们在下面将看到的，劳动这种商品的价格的下跌较其他的商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四卷第276—281和285—296页。——译者注

品要大得多。那时候，仍然继续相信那些经济学家的论据的工人将发现自己口袋里的法郎已经融化，剩下的已不到五苏^①了。

经济学家们会反对我们这一点说：好吧，我们同意说工人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在自由贸易的统治下恐怕也不会减少）很快会使工资和更低廉的商品价格互相一致起来。但是，另一方面，商品价格的下落会导致需求的增加；需求的增加就得加紧生产，而生产又引起了对劳动力的需求的增加；劳动力需求增加的结果将是工资的提高。

全部论据可以归结如下：自由贸易扩大了生产力。如果工业发展，如果财富、生产力、总而言之，生产资本增加了对劳动的需求，那末，劳动价格便提高了，因而工资也就提高了。资本的增殖是对工人最有利不过的事。这一点必需同意。要是资本停滞不动，工业却不会停止不动而是会垮台的，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工业垮台的第一个牺牲品的便是工人。工人将先于资本家而死亡。假使在资本增殖时，也就像上面所说的，在对工人最有利的情况下，工人的命运又将如何呢？他还是一样会死亡的。生产资本的增殖也就意味着资本的积累和积聚。资本集中的结果是分工的扩大和机器的更广泛的使用。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使工人的手艺化为乌有，从前需要用手艺的地方，现在任何人都能做得到，从而工人之间的竞争也就加剧了。

这种竞争之所以更趋激烈，是因为分工使一个工人可以完成三个人的工作。机器的采用也引起了同样的结果，而且规模还更大得多。生产资本的增殖促使工业资本家不断增加生产资料，从而使一些小企业主破产，把他们抛入无产阶级队伍。其次，因为利息率随着资本的积累而下降，小食利者不能再依靠自己的利息过

^① 法国旧铜币名，等于 $\frac{1}{20}$ 法郎。——译者注

活，只好到企业中去工作，从而扩大无产者的人数。

最后，生产资本愈增殖，它就必然更加盲目地为市场生产，生产愈益超过了消费，供应愈益力图扩大需求，由于这一切，危机的发生也就愈益频繁而且愈益猛烈。另一方面，每一次危机又加速了资本的集中，扩大了无产阶级的队伍。

这样，随着生产资本的增殖，工人之间的竞争便在更大的程度上加剧起来。大家的劳动报酬都减少了，而一些人的劳动强度也增加了。

1829年在曼彻斯特36个工厂中有1088个纺纱工人。到1841年纺纱工人总共才只有448人，可是他们所照管的纱锭却比1829年的1088个工人所照管的还要多53353个。假定采用手工劳动的数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相应增长的话，则工人的数量应达1848人；也就是说，技术设备的改进使1100个工人失了业。

经济学家们的答复，我们是可想而知的。他们一定会说，失业的人会找到别的职业。在经济学家会议上，包林博士没有忘却引用这个论据，同时也沒有忘却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1835年包林博士在下院以5万伦敦织布工人为题发表了演说，这些工人长期以来徒劳无益地寻求自由贸易派用以安慰他们的新职业而处于饥饿潦倒之中。

让我们从包林博士的演说中引用一些最堪注意的地方吧。

他说：“手工织工所处的贫困是所有从事这类劳动的人的必然遭遇，因为这种劳动易于学习，而且随时都可能被较便宜的工具所代替。由于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所以只要需求略微减少，就会引起危机。手工织工好像处于人生的边缘。再走一步，他们就不能生存下去。只消一点轻微的振荡，就足以致他们于死命。技术设备的进步使手工劳动愈来愈被排挤，因此在过渡时期必然要引起许多暂时的苦难。民族的繁荣只有以某些个人的不幸作代价才能取得。工业的发展总是靠牺牲落后来完成的；在所有的发明中间，只有用蒸汽发动的织布机对手工织工的命运影响最大。在许多

本来是用手制做的制品的生产中，现在手工織工已經完全被排挤了，而在这个尚用手制做的許多其他制品的生产中，手工織工的命运也是危在旦夕。”

他接下去說：“我这里有印度总督跟东印度公司的往来信件，其中論及达卡地区的織布工人。总督在他的信件中說：几年以前，东印度公司购入 600 万到 800 万匹当地手机織成的棉布。后来需求逐渐下降，大約縮減到 100 万匹。

“现在，需求几乎降到零了。此外，1800 年北美从印度得到的棉布約为 80 万匹。1830 年印度所輸出的棉布还不到 4 000 匹。而在 1800 年运入葡萄牙的棉布，还有 100 万匹。到 1830 年葡萄牙所得到的不过 2 万匹。

“印度織工的苦难情景給我們留下了可怕的印象。但是这些苦难的原因何在呢？

“在于英国产品在市場上的出現，在于用蒸汽发动的織布机来进行生产。大量的織工死于饥餓，其余的人多半在农业中找到其他的职业。不能改行的人則活該餓死。现在英国的棉布和棉紗充斥达卡地区。以耐久和美观見称于世的达卡細棉布，也由于英国机器的竞争而完全絕迹了。像东印度居民的所有的貧苦階級所受的那种苦难，恐怕在全部貿易史上都很难找到第二个例子。”

包林博士在演說中所引用的事实是真实的，所以他的演說就更其出色。但是他力图掩盖这些事实，其措詞和自由貿易的信徒們的其他說教一样，是偽善的。他把工人描写成有待以更廉价的生產資料来代替的生產資料。他故弄玄虛，把所說到的这种劳动部門看作完全特殊的劳动部門，而把排斥手工織工的机器看作完全特殊的机器。他忘記了，任何一个手工劳动部門都总有一天要經受手工織布业的命运。

“实际上任何技术設備的改进，其固定不移的目的和意图就是要完全排除人的劳动，或者用女工、童工的劳动代替男工的劳动，用非熟练工人的劳动代替熟练手艺工人的劳动，以求降低劳动的价格。在大多数机器紡紗厂中（英文叫 *throstle-mills*），紡紗的尽是些 16 岁及 16 岁以下的小姑娘。由于用自动紡紗机代替了簡單的驛机，大部分成年工人被解雇，留下的仅是些少年儿童。”

自由貿易的最狂熱的信徒尤爾博士的這些話⁴²，是對包林先生自白的很好的補充。包林先生談到一些個別的人所遭到的不幸，同時又告訴我們，這些個別的人的不幸必然要置所有一切貧苦階級于死命；他談到了“過渡時期”“暫時的苦難”，而且並不諱言，這些具有過渡性質的苦難，對大多數人說來，是從生產到死亡的轉變，而對其他的人說來，是從他們過去的處境到更壞的處境的轉變。如果他進一步說，這些工人的不幸是和工業的進步不可分割地聯繫着的，而且是國家的繁榮所必要的，那末，他也就等於承認工人階級的苦難的處境就是資產階級繁榮的必要條件。

包林先生慷慨地所給予奄奄待斃的工人的一切安慰，以及自由貿易派所創立的全部補償理論可歸結如下：

成千上萬的奄奄待斃的工人們，你們不應灰心失望。你們可以非常安靜地死去。你們的階級是不會絕種的。它將永遠保有足夠數量的人聽任資本去宰割而不致死絕。如果資本不力求取得供其不斷地剝削的材料（工人），資本又怎能使自己得到有效的運用呢？

那末，為什麼還要把關於實現自由貿易對工人階級狀況的影響作為未解決的問題來談呢？從魁奈到李嘉圖的經濟學家們所表述的一切規律是建立在這樣的假定上的：迄今妨礙自由貿易的羈絆已不再存在。這些規律的作用隨着自由貿易的實現而加強。其中第一條規律是說，競爭把每一種商品的价格都降低到該商品的最低生產費用。因此，最低工資是勞動的自然價格。什麼是最低工資呢？這就是說，要維持工人使他勉強養活自己並在某種程度上延續自己的子嗣，就需要一些物品，生產這些工人生活必需品時的最低限度的支出恰好就是最低工資。

不要由此得出結論說，工人的所得不可能多於最低工資，也千萬不要認為他所得到的總是最低工資。

不是的，在这一規律的作用下，工人階級有时也有較幸运的时候。有时他的所得也会多于这种最低工資，但这种多余部分不过是补充了他在工业停滞时期所得低于最低工資的不足部分而已。这就是說，工业接連地經過繁荣、生产过剩、停滞、危机諸阶段而形成一种反复循环的周期，在一定的周期內，如果把工人階級高于必需的全部所得和低于必需的全部所得合計起来，那末它所得的总額不多不少，恰好是这个最低額；換言之，尽管工人階級忍受了一切苦难和貧困，尽管工人階級在工业战场上抛下了許多尸体，但是工人階級依旧作为一个階級而保持了它的完整性。这会有什么意义呢？这說明工人階級还是繼續存在下去，而且它的数量还在增长。

但是还不止此。由于工业的发展，出現了更廉价的生活資料。于是，伏特加代替了啤酒，棉織品代替了毛織品和亞麻織品，馬鈴薯代替了面包。

因而，由于不断地找到以更廉价更低劣的营养品来維持工人生活的新方法，最低工資也就不斷降低。如果說，起初这种工資迫使人为了活下去而去劳动，那末，到最后就把人变成机器人了。工人的存在的全部价值只不过在于他是一种生产力而已；資本家就是这样来对待工人的。

随着自由貿易(經濟学家們的基本前提)的逐漸实现和成为生活现实，劳动商品的这一規律，即最低工資的規律也就愈益明显地显现出来。因此，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全部否定以自由貿易的假定作基础的政治經濟学，或者就同意說在自由貿易的情况下工人一定要經受經濟規律的全部灾难。

讓我們来作个总结：在現代的社会条件下，到底什么是自由貿易呢？这就是資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碍着資本前进的民族障碍，只不过是让資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动罢了。不管一种商品交

換另一種商品的條件如何有利，只要僱傭勞動和資本的關係繼續存在，就永遠會有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存在。那些自由貿易的信徒認為，只要更有效地運用資本，就可以消除工業資本家和僱傭工人之間的對抗，他們這種自信狂，真是令人莫解。恰恰相反，這只能使這兩個階級的對立更形顯著。

假定一旦不再有穀物法，不再有海關，不再有城市進口稅，一句話，假使工人迄今認為是使自己處於貧困境遇的那些偶然情況都全部消失，那時，一向掩蓋着他的真正敵人的一切帷幕就被揭開了。

他將看到擺脫羈絆的資本對他的奴役並不亞於受關稅束縛的資本對他的奴役。

先生們，不要用自由這個抽象字眼來欺騙自己吧！這是誰的自由呢？這不是每個人在對待別人的關係上的自由。這是資本榨取工人最後脂膏的自由。

當這種自由不過是自由競爭基礎上的必然產物時，怎麼還能把自由競爭奉為自由的觀念呢？

我們已經指出，在同一個國家里，自由貿易在不同的階級之間會產生怎樣一種友愛。即使自由貿易在世界各國之間建立起友愛關係，這種友愛關係也未必更具有友愛的特色。把世界範圍的剝削美其名曰普遍的友愛，這種觀念只有資產階級才想得出來。在任何個別國家內的自由競爭所引起的一切破壞現象，都會在世界市場上以更大的規模再現出來。再沒有必要停留在自由貿易的信徒對這個問題所散布的詭辯上，這些詭辯完全值得我們的三位獲獎者霍普、摩爾斯和格萊格先生去論證。

例如，有人對我們說，自由貿易會引起國際分工，並根據每個國家優越的自然條件規定出生產種類。

先生們，你們也許認為生產咖啡和砂糖是西印度的自然秉

賦吧。

二百年以前，跟貿易毫無關係的自然界在那里連一棵咖啡樹、一株甘蔗也沒有生長出來。

也許不出五十年，那里連一點咖啡、一點砂糖也找不到了，因為東印度正以其更廉價的生產得心應手地跟西印度虛假的自然秉賦作競爭。而這個自然秉賦異常富庶的西印度，對英國人說來，正如有史以來就有手工織布天賦的達卡地區的織工一樣，已是同樣沉重的負擔。

同時不應忽視另一種情況：既然一切都成了壟斷性的，那末即使在現時，也會有些工業部門去支配所有其他部門，並且保證那些主要從事於這些行業的民族來統治世界市場。例如，在國際交換中，棉花在貿易中比其他一切成衣原料具有更大的意義。自由貿易的信徒從每一個工業部門找出兩三個特殊品種的生產，把它們跟工業最發達的國家中一般消費品的最廉價的生產等量齊觀，這真是太可笑了。

怪不得自由貿易的信徒弄不懂一國如何犧牲別國而致富；要知道這些先生們更不想懂得，在每一個國家內，一個階級是如何犧牲另一階級而致富的。

但是，先生們，不要以為我們所以批判自由貿易是打算維護保護關稅制度。

一個人宣稱自己是立憲制的敵人，並不見得自己就是舊制度的擁護者。

但是，保護關稅制度不過是為了在某個國家建立大工業的手段，也就是使這個國家依賴於世界市場，但自從對世界市場有了依賴性以來，對自由貿易也就有了或多或少的依賴性。此外，保護關稅制度也促進了國內自由競爭的發展。因此，我們看到，在資產階級開始以一個階級自居的那些國家里（例如在德國），資產階級便

竭力爭取保护关税。保护关税成了它反对封建主义和专制政权的武器，是它聚集自己的力量和实现国内自由貿易的手段。

但总的說来，保护关税制度在現今是保守的，而自由貿易制度却起着破坏的作用。自由貿易引起过去民族的瓦解，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間的对立达到了頂点。总而言之，自由貿易制度加速了社会革命。先生們，也只有在这种革命意义上我才贊成自由貿易。

1848年2月初以小册子

发行于布魯塞尔

署名：卡尔·馬克思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1848年版譯的

馬克思

政治經濟學批判(摘錄)

柏林, 1859 年

主張勞動時間是直接的貨幣尺度單位的學說, 是在約翰·格雷^①的手上, 第一次得到系統的發揮。他主張由國家中央銀行通過支行來測定在各種商品的生产上所用的勞動時間。生产者交出商品時換回一張正式的价值憑證, 也就是依照他的商品所含勞動時間量取得一張收據^②; 而這種代表一個勞動周、一個勞動日或一個勞動小時等等的銀行券, 同時對於存放在銀行倉庫的其他一切商品中的一個等價物, 起着領用憑證的作用^③。這就是格雷的基本

① 約翰·格雷: “社會制度。關於交換原理的論文”, 1831 年愛丁堡版, 並參考同一著者的“論貨幣本質及其用途”, 1848 年愛丁堡版。在二月革命以後, 格雷送給法國臨時政府一個備忘錄, 其中教訓說, 法國所需要的不是一個 “organisation of labour” (勞動的組織), 而是一個 “organisation of exchange” (交換的組織), 這個組織的方案, 在他所發明的貨幣制度中已經完全具備了。老實的格雷想不到在他的 “Social System” (社會制度) 出現了十六年之後, 同樣的一個發明的專利權給富於發明的蒲魯東拿去了。

② 格雷: “社會制度……” 第 63 頁中說: “貨幣應該僅僅是一張收據, 證明這收據的持有者曾經對國家財富的庫存貢獻了一定的價值, 或者曾經從貢獻這份價值的人取得對於這份價值的支配權。”

③ “對生产物事先估定一個價值, 让它存入銀行, 何時需用, 何時提取, 只要大家同意規定, 將任何種類的財產存入國家銀行的人, 可以從銀行取出同等價值的任何物品, 提取的物品不必和他所存入的相同。” (見前引書, 第 68 (67) 頁)

原則，他把它研究得很細致，并处处适合于英国現行制度。按这种方式，格雷說：“为取得货币而銷售，时时和現在用货币来购买同样容易；生产将成为需求之均匀而不竭的源泉”。^① 貴金屬将失去它們对其它商品的“特权”，它們“将在市場上与牛油、鸡蛋、棉布、花布并列，取得应份的地位，它們的价值，不会比金鋼石的价值使我們更关心”。^②“我們應該維持我們空想出来的价值尺度——金，从而束縛一国的生产力呢，还是應該改用自然的价值尺度——劳动，从而解放一国的生产力呢？”^③

既然劳动時間是价值的內在尺度，为什么在劳动時間之外又另外有一种外在的尺度呢？为什么交换价值发展成为价格呢？为什么一切商品都用一种特別提出于众商品之外的商品来計算自己的价值，因而使这唯一的商品变成交换价值的适当存在，变成货币呢？这是格雷應該予以解决的問題。他不去解决問題，倒去空想商品能够当作社会劳动生产物而直接地相互发生关系。但是它們是什么，它們就只能以什么的資格来相互发生关系。商品直接是孤立的、各不相屬的私人劳动的生产物，这种私人劳动，必須在私人交换过程中通过轉移来证明是一般社会劳动；換句話說，在商品生产基础上的劳动，只有通过私人劳动的全面轉移才变成社会劳动。但是，格雷既然把商品中所含劳动時間假定为直接就是社会劳动時間，他就是把这种劳动時間假定为共同的劳动時間，或者說直接联合起来的人們的劳动時間。这样一来，实际上，一种特殊的商品，如金銀，就不会当作一般劳动的化身来同其它商品对立了，交换价值就不会变成价格了，但是，使用价值也就不会变成交换价值了，生产物也就不会变成商品了，因而資本主义生产的基础本身也

① 格雷：“社会制度……”，第16頁。

② 格雷：“論货币本质及其用途”，第182（188）頁。

③ 前引书，第169頁。

就消灭了。但是，这一点决不是格雷的本意。生产物要当作商品来生产，却不当作商品来交换。格雷将这个虔诚的愿望之实现付托给一个国家银行。一方面，社会以银行为代表使个人不依赖私人交换的条件，另一方面，社会让个人在私人交换的基础上继续生产。因此，事物的内在逻辑逼住格雷一个又一个地废弃资本主义生产诸条件，虽然他只想把产生于商品交换的货币“改良”一下。例如，他把资本变成国民资本^①，把土地所有权变成国家的所有权^②，要是仔细把他所建议的银行一看，它也不只是一手收进商品一手发出劳动的缴纳凭证，并且它也调节着生产本身。格雷在“论货币……”这最后一本著作中，他越是急于想表明他的劳动货币纯粹是资本主义的改良，他就越是陷入尖锐的矛盾之中。

每种商品直接就是货币。这是格雷从他的不完全的、因而是错误的商品分析中所得出的理论。“劳动货币”、“国家银行”与“商品堆栈”的“有机”结构，不过是把这种教条装扮成支配着世界的法则的空中楼阁罢了。商品直接就是货币，或商品中的私人特殊劳动直接就是社会劳动——这种教条，当然不会因为有一个银行相信它、照它经营，就会变成真实的东西。宁可说，在这种情形下，破产会来表演实际批评家的角色。格雷的著作中所隐藏着，特别连他自己都未察觉的，就是劳动货币是一种天真的愿望在经济上的高调，这个愿望就是废除货币，同货币一起废除交换价值、同交换价值一起废除商品、同商品一起废除生产的资本主义方式。这个愿望，英国的一些社会主义者，有些在格雷之前，有些在格雷之后，直截了当地讲出来了。^③但是，把贬黜货币与颂扬商品当作社

① “各国实业应该借国家资本来经营”(格雷：“社会制度”，第171页)。

② “土地将变为国家所有权”(前引书，第298页)。

③ 例如汤普逊(W. Thompson)：“财富分配原则……”，1824年伦敦版。布雷(Bray)：“劳动的弊害及其消除方法”，1839年里子版。

会主义的核心而认真宣传，从而使社会主义变成了对商品与货币间必然关系的根本无知^①，这是要等蒲鲁东先生和他的学派来完成的。

^① 阿弗萊·达利蒙(Alfred Darimont)：“銀行改革”，1855年巴黎版，可以当作这种滑稽的货币理论之集大成。

馬克思 論蒲魯東

(給施韋澤爾的信)

1865年1月24日,倫敦

敬愛的先生!

我昨天接到您的信,要我对蒲魯東作个詳尽的評价。因時間不够,不能滿足您的願望。何況我手頭沒有他的**任何一部**著作。但是为了证明我願意實現您的願望,我匆忙草就了一篇短評。以后您可对它加以充实、补充、删节,总之,您可隨便处置。

蒲魯東的初期試笔作品,我已經記不起来了。他那部論“**世界語言**”的幼稚著作,表明他多么輕率地探討了那些他由于缺少最起碼知識不能解決的問題。

他的第一部著作“**什么是财产?**”,無疑是他最好的著作。这部著作若不是由于內容的新穎,至少是由于新鮮大胆讲述旧東西的風格而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在他所知道的法国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著作中,“**财产**”显然不仅受到了各方面的批判,而且也空想地“**被廢除了**”。蒲魯東在这本书中对圣西門和傅立叶的关系上所處的地位,大概是如費尔巴哈对黑格尔的关系上所處的地位一样。与黑格尔比較起来,費尔巴哈显得极为貧弱。但是他在黑格尔以后創造了一个时代,因为他把不合基督教意識趣味而对于保证批判成功却很重要的一些被黑格尔留置在神秘阴暗状态中的論点提到**首要地位**了。

在蒲魯东的这部著作中，文体的結实筋肉——如果可以这样說的話——还占优势。而且我认为这种文体是其主要优点。可見，甚至在蒲魯东仅仅重复旧东西的地方，对他說来都是一种独立的发现；他所說的东西，对他說来是新东西，并且是被他当作新东西来看待的。他用以抨击政治經济学“最高神圣”的挑战勇气，他用以嘲笑庸俗资产阶級理性的詼諧怪論，一針見血的批評，刻薄的諷刺，往往透露出来的那种痛恨現世齷齪的深刻坦白情感，革命的信心——“什么是财产？”一书就是以这种性质激动了讀者并在初次問世时留下了强烈印象的。在政治經济学的严格科学历史中，这本书未必值得一提。但是，这类聳人听聞的著作在科学方面，也像在美文学方面，总是起着一定的作用。譬如拿馬尔薩斯所著“人口論”一书来作例子。在初版时，这不过是“聳人听聞的諷刺文章”，并且彻头彻尾都是剽窃。虽然如此，这篇**貶毀人类**的文章終究留下了极强烈的印象！

假如我手头有蒲魯东的这本书，那就很容易用几个例子來說明他**最初的**写作手法。在他自己认为是最重要的各节里，他模仿着**康德**——这是他当时从翻譯中知道的唯一的德国哲学家——來解釋**二律背反**，并造成一个明确的印象：对于他也像对于康德一样，解决二律背反是人类理性“**范濶外**”的事情，即对他自身理性始終是莫明其妙的事情。

尽管有怎样表面上的超革命性，但在“什么是财产？”一书中已暴露出一个矛盾：一方面蒲魯东通过法国占有小块土地的农民的观点（后来通过**小资产者**的观点）来批判社会，另一方面他却对社会使用他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借来的尺度。

标题本身就已表明这本书的缺点。問題提得竟是如此不正确，甚至根本不可能給予它一个正确的答复。**古代的财产关系**为封建的财产关系所消灭，而封建的财产关系則为**资产阶級**的财产关系

所消灭。这样，历史本身就批判了过去的财产关系。实质上蒲鲁东那里所谈到的是现存的现代资产阶级财产。这是种什么财产？——对这个问题只能以批判地分析政治经济学来给予答复，因为政治经济学不是把这种财产关系就其法权表现作为意志关系总和包括起来，而是就其现实形态即作为生产关系总和包括起来的。但是，蒲鲁东既把这种经济关系的总和与“财产”（«la propriété»）这个一般法权观念連結起来，也就不能超越布里索早在一七八九年以前就用同样的话在类似的著作中给过的答复：“财产就是盗窃”。

从这里最多也不过是得出这样的定论，即关于“盗窃”的资产阶级法权观念亦适用于资产者本人的“诚实的”收入。另一方面，由于“盗窃”作为暴力侵害财产的行为，要以财产的存在为前提，所以蒲鲁东就纠缠在关于真正资产阶级财产的各种连他自己也模模糊糊的妙想里面。

我于1844年间在巴黎逗留的时候，亲自和蒲鲁东来往过。我之所以提起这件事，是因为对于他的“诡辩议论”（«sophistication»，英国人这样称呼伪造商品），我在某种程度上也应负一部分责任。在进行长久的、常是继续通宵的争论时，我使他感染了黑格尔主义，这对他是有很大的害处，因为他由于不懂德文，未能认真地研究黑格尔主义。我被逐出巴黎之后，卡尔·格龙先生继续了我已开始过的工作。他作为德国哲学的教师，比我还多一个优点，即他自己一点也不懂德国哲学。

蒲鲁东第二本大作品“贫困的哲学及其他”问世以前不久，他自己就在一封很详细的信中把这本书介绍给我了，信中附有如下的一句话：“希望您严格批评”。确实，这种批评不久就落到了他的头上（在我著的“哲学的贫困及其他”一书中，1847年巴黎版），其形式的激烈竟使我们的友谊永远结束了。

从这里所說的情况中你們可以看到，在蒲魯东著的“貧困的哲学或經濟矛盾的体系”这本书里，事实上他第一次对“什么是财产？”这个问题作了答复。的确，蒲魯东只是在自己第一本书問世后，才开始进行經濟学上的研究；这时他发现，不是用冒罵的方法，而只有用分析現代政治經濟学的方法才能回答他所提出的問題。同时他还企图用辯证方式說明經濟范畴的体系。代替康德那些不能解决的“二律背反”的，此时已应当出現黑格尔的“矛盾”作为發揮問題的手段了。

在我反駁他的著作中，你們可以看到对他两卷厚厚的作品的批判。我在那里就已指出，蒲魯东既然不是把經濟范畴看作历史的、符合于物质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的生产关系的理論表現，而却荒謬地把它看成久已存在的永恒思想体系，也就是暴露自己多么不懂得科学辯证法的秘密，同时又是多么同意思辨哲学的錯觉，并且是如何轉弯抹角地重又回到資產階級經濟学的观点上去^①。

其次我还指出，他对他所进行批判的那个政治經濟学是認識得多么不足，有时簡直是很幼稚，并且他是如何和烏托邦主义者一起追求所謂“科学”，以为借助这个科学就可以 a priori^② 发明一个“解决社会問題”的公式，却不是把对历史运动的批判認識当作科学的源泉，而这个运动本身就創造着解放的物质条件哩。那里特別指出，蒲魯东关于构成全部問題基础即关于交换价值的观念仍然是多么模糊、不正确和不彻底，况且，他把李嘉图价值理論的空想主义的解釋看作是新科学的基础。我把我关于他的一般观点

① “經濟学家所以說現存的关系(資產階級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說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規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時間影响的自然規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規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現在再也沒有历史了。”(見我那本书第 113 頁)(这是馬克思加的附注。)見本书第 94—95 頁。——編者注

② 意即“預先”，“先驗”。——編者注

的論断概括叙述如下：

“每一种經濟关系都有其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只有在这一点上蒲魯东先生沒有背叛自己。他认为好的方面由經濟学家来揭示，坏的方面由社会主义者来揭发。他从經濟学家那里借用了永恒經濟关系的必然性这一看法；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借用了使他們在貧困中只看到貧困的那种幻想（却不是在貧困中看見有定会把旧社会推翻的革命的破坏性方面）。他对两者都表示贊成，企图拿科学权威当靠山。而科学在他的观念里已成为某种微不足道的科学公式了；他无休止地追逐公式。正因为如此，蒲魯东先生自以为他既批判了政治經濟学，也批判了共产主义；其实他远在这两者之下。說他在經濟学家之下，因为他作为一个哲学家，自以为有了神秘的公式就用不着深入純經濟的細节；說他在社会主义者之下，因为他既缺乏勇气，也沒有远見，不能超出（哪怕是思辨地也好）资产者的眼界。

他希望成为一种合題，結果只不过是一种总合的錯誤。

他希望充当科学泰斗，駕凌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結果只是一个小资产者，經常在資本和劳动、政治經濟学和共产主义之間搖来摆去”①。

这个判决书尽管很严厉，但我直到現在还担保每个字都是正确的。然而同时不应忘記，当我宣称蒲魯东的这本书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总汇并在理論上证明了这点时，經濟学者和社会主义者都把蒲魯东作为超革命者加以詛咒。这也就是我在以后从未跟那些叫囂說他“叛变”革命的人一起随声附和的原因。如果他一开始就既被別人誤解，也被自己本人誤解，而沒能证实非分希望的話，那末这就不是他的过錯了。

① 見我那本书第119頁，第120頁。（这是馬克思加的附注。）見本书第98—99頁。——編者注

与“什么是财产？”相反，在“**貧困的哲学**”中，蒲魯东論述手法的一切缺点都是极不利于他地非常显眼了。文体經常都是如法国人所說的那样 ampoulé(浮夸的)。凡是丧失高卢人敏銳智慧的場合，冒充德国哲学風格的夸張的思辨的胡言乱語就表露出来。自夸的論調，集市般的喧嚷，大吹大擂的口气，特別对假“科学”的自夸言詞，关于这“科学”的无聊胡扯，真是刺耳至极。充滿他第一部著作的那种真誠的温情，这里在一定的地方都已被系統地偷換成虛浮的狂烈激情了。并且这是自学者炫耀自己學問的一种軟弱无力而討厌的伎倆，这自学者生来就以自己的思維仿佛具有独特性和独立性而自豪的心理已受到摧折；他作为一个想在科学方面出風头的角色，竟以为他应当以他所沒有的本事自炫，应当以他完全沒有的东西自炫。此外，这还是一种小資产者的心理，这小資产者对卡貝这样一个在法国无产階級运动中起有作用而受到尊敬的人物，施行一种不体面、粗暴、不机智、不深刻和簡直是不正确的攻击。而对于例如杜諾瓦耶却表示殷勤备至（須知杜諾瓦耶总是个“国家顧問”呵！），虽則此人的全部意义只表現于他在三部厚厚和无聊不堪的书里用一种滑稽的严肃神情鼓吹了严格主义，这个严格主义曾被黑尔維萃描述为“**要求不幸者也得尽善尽美**”一語。

二月革命对蒲魯东說来真是完全不合时宜，因为他正是仅仅在这次革命前两个星期还不容爭辯地证明說，“**革命的紀元**”已經永远过去了。他在国民議会的演說，虽然表明他对当时一切事变都很少了解，終究是值得极力称赞的。在六月起义以后，这是个有高度勇气的行动。此外，他的演說还有这样一个好效果，即梯也尔先生在发表反对蒲魯东提案的讲話(后来刊印成了单行小册子)中曾向全欧洲证明說，法国資产階級的这个精神台柱所用作基石的是多么可怜而幼稚的教义呵。与梯也尔先生比較起来，蒲魯东确

实显得好像是洪水氾濫前的龐然巨物了。

发明“无息信贷”和以此为基础的“人民銀行”，要算是蒲魯东先生的最后經濟“功績”。在我所著“政治經濟学批判”一书 1859 年柏林出版的第一編（第 59 至 64 頁）^① 中已证明說，他那种观点的理論基础是由于不知道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学的基本元素，即不知道商品和貨幣的关系，而其实际上层建筑則不过是更旧的和制定得較好得多的那些方案的翻版。至于信贷——例如在英国 18 世紀初而后来又于 19 世紀初有过的那样——促进了财产从一个階級手中轉移到另一个階級手中，并且在一定的經濟和政治条件下可以促进无产階級的解放，这是毫无疑問和不言自明的。但是若把生息資本当作資本的主要形式，试图将特殊应用信贷即将幻想廢除利息弄成社会改造的基础，那就是彻头彻尾的市儈梦想了。的确，我們看到，这种梦想是已由 17 世紀英国小資產階級的經濟思想家詳細發揮了的。蒲魯东跟巴师夏关于生息資本問題作的論爭（1850 年），比“貧困的哲学”一书更差得多。他弄得甚至連巴师夏也能打倒他，而每当敌手給他以打击时，他就滑稽地发起狂来。

几年以前，蒲魯东参加仿佛是由洛桑政府举办的悬賞征文，写了一篇論“稅收”的文章。这里連天才的最后痕迹都消失了，只剩下赤裸裸的小資產者。

至于蒲魯东的政治和哲学著作，那末也像經濟学作品一样，里面都表現着同样矛盾的双重的性质。而且它們有純地方性的意义，即只局限于法国。但是在法国的条件下，当法国社会主义者把信教看作是自己比 18 世紀資產階級伏尔泰主义和 19 世紀德国无神主义优越的标志时，他对宗教、教会等的攻击，是个很大的功績。

^① 見本书第 166 頁至第 169 頁。——編者注

如果說彼得大帝以野蛮攻克了俄国的野蛮，那末蒲魯东就是作了他所能作的一切来用辞藻战胜法国人的辞令了。

他那本論“政变”的书不仅应当简单地看作是坏作品，而且应当看作是真正的卑鄙齷齪，但这种卑鄙齷齪是完全相当于他的小资产阶级观点的；在这里他向路易·波拿巴献媚，并竭力想把他弄成为法国工人可以接受的人物；他最后那篇反对波兰的著作也是这样，其中他为迎合沙皇而表现出白癡般的公然无耻性。

人們常把蒲魯东与卢梭作比較。这种比較是異常錯誤的。他倒更像尼·林格，不过后者所写的“民法理論”一书要算是一部天才的著作。

蒲魯东按其本性是倾向于辯证法的。但是因为他从来也不理解真正科学的辯证法，所以越不出詭辯主义的界限。实际上这是和他的小资产阶级观点有关的。小资产阶级也像历史家**劳麦**一样，是由“一方面”和“另一方面”所构成。他在自己的經濟利益上是如此，因而在自己的政治上，在自己的宗教观点、科学观点和艺术观点上也是如此。他在自己的道德上也是如此，他在一切方面都是如此。他是个集中体现的矛盾。而既然他同时还像蒲魯东一样是个有机智的人，所以他就很快地习惯于玩弄自己本身的矛盾說法，根据情况把这种說法变成一些意外的、鮮艳夺目的、时而是出丑的、时而是輝煌的怪論。科学中的江湖騙术和政治上的随机应变是与这种观点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在这类人那里，只剩下有一个动机——他們的虛荣心；就像一切爱虛荣的人一样，他們关心的仅仅是获得短暫的成功，即聳人听闻。同时就不免要失掉简单的道德品性，这种品性是一直防止例如卢梭对現存政权采取任何——哪怕仅仅是表面上——妥协态度的。

也許后人評論法国历史中这个不久前的时期时会說，路易·波拿巴是它的拿破侖，而蒲魯东則是它的卢梭兼伏尔泰哩。

現在呢,既然您在此人死后不久就硬要我来为他盖棺論定,那
我就要您对此負完全責任了。

尊敬您的 卡尔·馬克思

1865年2月1、3、5日在
“社会民主主义者”上发表

按照依1885年版本校对过的报纸
本文刊印。原本系德文

注 釋

- 1 “哲学的貧困。答蒲魯东先生的‘貧困的哲学’”是馬克思主义的极重要的理論著作之一，是卡·馬克思反对小資产階級思想家比·約·蒲魯东的主要作品。1846年12月底，馬克思在讀了出版不久的蒲魯东所著“經濟矛盾的体系，或貧困的哲学”一书以后，就决定批判严重地阻碍在工人中間傳播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蒲魯东观点，同时从科学唯物主义的立場来闡明无产階級革命运动中的許多理論和策略問題。馬克思在1846年12月28日給俄国文学家巴·瓦·安年科夫的信中表明了許多极重要的思想，这些思想后来成为馬克思为反駁蒲魯东而写的这部著作的基础。从恩格斯在1847年1月15日給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1847年1月馬克思就已經着手回答蒲魯东。至1847年4月初，馬克思的这部著作已基本完成并已付印（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四卷第42頁）。1847年6月15日，馬克思为該书写了一篇簡短的序言。

馬克思的这部著作于1847年7月初在布魯塞爾和巴黎出版。該书在馬克思生前沒有再版。該书德文版第一版于1885年出版，譯文曾經恩格斯校訂，他专门为德文版写了一篇序言并加了許多注釋。恩格斯在校訂德文版过程中，参考了馬克思在1876年1月1日送給娜塔丽雅·吳亭娜（第一国际俄国支部委員尼·伊·吳亭的妻子）的一本1847年法文版上的修正。1886年俄国馬克思主义小組“劳动解放社”出版了維·查苏利奇翻譯的“哲学的貧困”俄文版第一版。該书的德文版第二版于1892年出版。恩格斯写了一篇簡短的序言，糾正原文中某些不準確的地方（見本书注12）。恩格斯逝世以后，馬克思的女儿劳拉·拉法格整理的法文版第二版于1896年出版，該版也根据馬克思送給娜·吳亭娜的一本上的修正作了更正。——第17頁。

- 2 馬克思引自西蒙·德·西斯蒙第“政治經濟学概論”1837—1838年布魯塞爾版第1—2卷(Simonde de Sismondi. «Études sur l'économie politique». T. I—II, Bruxelles, 1837—1838)。——第27頁。
- 3 Lauderdale. «Recherches sur la nature et l'origine de la richesse publique». Traduit de l'anglais, par E. Lagentle de Lavaisse. Paris, 1808, p. 33. ——第27頁。
- 4 大·李嘉图“政治經濟学和租稅的原理”，弗·索·孔斯坦西奧譯自英文，附有让·巴·薩伊的解釋性和批判性的注。1835年巴黎版第2卷第65頁(D. Ricardo. «Des principes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et de l'impôt». Traduit de l'anglais par F.-S. Constanco, avec des notes explicatives et critiques par J.-B. Say T. II, Paris, 1835, p. 65)。——第27頁。
- 5 指亞·安德森的著作“商業史”(A. Anderson. «An Historical and Chronological Deduction of the Origin of Commerce from the Earliest Accounts to the Present Time»)。第1版于1764年在倫敦出版。——第29頁。
- 6 安·施托爾希“政治經濟学教程，或論決定人民幸福的原理”1823年巴黎版第1—4卷(H. Storch. «Cours d'économie politique, ou Exposition des principes qui déterminent la prospérité des nations». T. I—IV, Paris, 1823)。馬克思引用的是第1卷。——第30頁。
- 7 指1815年拿破侖戰爭結束和波旁王朝在法國復辟以後的時期。——第34頁。
- 8 亞當·斯密“原富”(A.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第1版于1776年在倫敦出版。——第35頁。
- 9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596—625頁和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卷第269—587頁。——第39頁。
- 10 布阿吉爾貝爾的文章，引自歐仁·德爾編的“18世紀的財政經濟学

家”，1843年巴黎版，文集附有編者所加的作者史略和評注(«Économistes-financiers du XVIII siècle». Précédés de notices historiques sur chaque auteur, et accompagnés de commentaires et de notes explicatives, par Eugène Daire. Paris, 1843)。——第52頁。

- 11 W. Atkinson.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1840. ——第52頁。
- 12 托·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經濟学”1827年倫敦版(Th Hodgskin «Popular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1827)。

原文誤作霍普金斯(Hopkins)。奧地利資產階級法學家門格爾曾經利用這一點，說馬克思的這段引文毫無根據。在1892年的“哲學的貧困”德文版第二版中，恩格斯改正了這一錯誤。他寫了如下的序言，

“要說的，只是法文本中寫錯了的名字霍普金斯，已經改正為霍吉斯金，同處，威廉·湯普遜的著作的年份已經改正為1824，借以告慰于安東·門格爾教授先生對書目的忠心。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2年3月29日於倫敦”——第54頁。

- 13 W. Thompson. «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Most Conducive to Human Happiness». London, 1824.

T. R. Edmonds. «Practical Moral and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1828. ——第54頁。

- 14 J. F. Bray. «Labour's Wrongs and Labour's Remedy». Leeds, 1839. ——第54頁。

- 15 1847年6月8日英國議會通過了只適用於童工和女工的十小時工作日法案。但是實際上許多廠主並沒有遵守這項法律。——第60頁。

- 16 馬克思引自伏爾泰所著的“議會史”(«Histoire du parlement»)一書中的一章，該章題目是“攝政時期的財政和約翰·羅的制度”。——第65頁。

- 17 指薩伊為李嘉圖著作的法文版所做的注(見本書注4)，第2卷第

206—207 頁。——第 68 頁。

18 N. W. Senior. «Political Economy». In: «Encyclopaedia Metropolitana, or Universal Dictionary of Knowledge». Vol. VI, London, 1836. ——第 70 頁。

19 J. St. Mill. «Essays on Some Unsettled Questions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1844.

托·图克“价格史和 1793 年到 1837 年的流通状况” 1838 年倫敦版第 1—2 卷(Th. Tooke. «A History of Prices, and of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 from 1793 to 1837». Vol I—II, London, 1838)。——第 70 頁。

20 Th. Cooper. «Lectures on the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 該书第 1 版于 1826 年在哥伦比亚出版；第 2 版增訂版于 1831 年在倫敦出版。——第 71 頁。

21 M. Th. Sadler. «The Law of Population». Vol. I, London, 1830, p. 83, 84. ——第 71 頁。

22 指魁奈的两部主要經濟著作：“經濟表” 1758 年版 («Tableau économique» 1758) 和“經濟表的分析” 1766 年版 («Analyse du Tableau économique» 1766)。——第 80 頁。

23 馬克思指魁奈的同时代人尼·勃多于 1770 年发表的著作“經濟表說明” («Explication du Tableau économique»)。——第 81 頁。

24 乔·威·弗·黑格尔“邏輯学”第 3 卷；全集 1841 年柏林第二版第 5 卷第 320 頁 (G. W. F. Hegel. «Wissenschaft der Logik», Bd. III, Werke, 2-te Aufl., Bd. V, Berlin, 1841, S. 320)。——第 83 頁。

25 这几个字馬克思引自卢克莱茨的詩篇“事物的本性”(第 3 册第 869 首)中的一句：“不死的死夺去了有死的生” («mortalem vitam mors immortalis ademit»)。——第 85 頁。

26 A. de Villeneuve-Bargemont. «Histoir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該书第一版于 1839 年在布魯塞爾出版。——第 94 頁。

- 27 馬克思引用的是亞當·斯密的“原富”的法文本。《Recherches sur la nature et les causes de la richesse des nations》T. I, Paris, 1802, p. 33—34. ——第100頁。
- 28 勒蒙特指他自己的著作：“理智和愚蠢各抒己見（供年長智低者閱讀的簡明倫理教程）”1801年巴黎版（《Raison, folie, Chacun son mot; petit cours de morale mis à la portée des vieux enfants》, Paris, 1801）。
- 馬克思引證的是勒蒙特的作品：“分工的道德影響”《Influence morale de la division du travail》，勒蒙特在這一著作里引了上一著作。——第101頁。
- 29 A. Ferguson. 《Essai sur l'histoire de la société civile》. T. II, Paris, 1783, p. 108—110. ——第101頁。
- 30 查·拜比吉“論機器和工廠的經濟性質”1833年巴黎版第230頁（Ch. Babbage. 《Traité sur l'économie des machines et des manufactures》. Paris, 1833, p. 230）。——第108頁。
- 31 A. Ure. 《Philosophie des manufactures, ou Économie industrielle》. Bruxelles, 1836, t. I, première partie, chapitre I. ——第111頁。
- 32 P. Rossi. 《Cours d'économie politique》. T. I—II, Paris, 1840—1841. ——第117頁。
- 33 J. Steuart. 《Recherche des principes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T. II, Paris, 1789, 190—191. 該書英文第一版於1767年在倫敦出版。——第119頁。
- 34 伏爾泰“有四十個埃巨的人”（《L'homme aux quarante ecus》）。——第120頁。
- 35 威·配第“政治算術”（W. Petty. 《Political arithmetick》），見他所著“政治算術論文集”一書，1699年倫敦版（《Several essays in political arithmetick》. London, 1699）。——第129頁。
- 36 當時在法國實行的法律，如1791年資產階級革命時期中制憲會議通過

- 的所謂列沙白里哀法案和拿破侖帝制时期制訂的刑法典，禁止工人建立工人联合会和組織罢工，違者受到严厉的惩处。在法国，对职工会的禁令到1884年才撤消。——第132頁。
- 37 全国职工联合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ted Trades*)是工联的組織，1845年在英国成立。联合会的活动限于爭取出賣劳动力的优惠条件和改善工厂立法的經濟斗争。联合会一直存在到60年代初，但是1851年以后它在工会运动中沒有起多大作用。——第134頁。
- 38 乔治·桑的历史小說“揚·瑞日卡”的序。——第136頁。
- 39 馬克思“关于自由貿易的演說”是1848年2月初在布魯塞尔用法文发表的，就在同年，由馬克思与恩格斯的朋友和学生魏德迈譯成德文在德国出版。1885年根据恩格斯的意見，作为“哲学的貧困”的德文第一版的附录刊印，自此以后，就作为該版的一个組成部分而不止一次地再版过。“关于自由貿易的演說”的俄譯文，于1885年“劳动解放社”在日內瓦以单行本首次发表，譯者为普列汉諾夫。1889年在波士頓出版了美国的单行本，上面有恩格斯的序言，这篇序言早先在1888年7月，以“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貿易”为題，用德文单独刊載于“新时代”(«Die Neue Zeit»)杂志。——第151頁。
- 40 “十小时工作日法案”，見本书注15。——第155頁。
- 41 馬克思引証了李嘉图著作的法文版：«Des principes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et de l'impôt». Traduit de l'anglais par F.-S. Constantio, avec des notes explicatives et critiques par J.-B. Say. T. I. Paris, 1835. p. 178—179. ——第156頁。
- 42 A. Ure. «Philosophie des manufactures, ou Économie industrielle». T. I, Bruxelles, 1836, p. 34. ——第161頁。